

94
K250.6
2
2-26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六輯

(總第126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
中國文史出版社



C

016863

责任编辑：杨玉文

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

(总126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京上装订厂装订

1993年3月第一版·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5 字数：192千字

印数：1—7000册

ISBN7-5034-0187-7/K·377

定价：4.10元

目 录

邓演达遗札.....邓演达(1)

· 嘉年自述 ·

感慨话当年.....陈 强(68)

我的家庭——第一次演出——上学——走上
抗日之路——苦练基本功——“老生泰斗”
——“九路军”开赴延安——第一次交女朋
友——到敌后去——斯氏体系的学习——我
的“小抽屉主义”——《把眼光放远一点》
——角色的创作——返回延安——演歌剧
《白毛女》——第一部故事片的创作

转蓬的一生.....丁 璇(98)

三项专业——为什么年过七十还称“小丁”？
——受张光宇的影响大于父亲——漫画也要
有“师傅”——走上社会——“八·一三”
使我的生活改观——港岛风云——转赴内
地——业余的“专业”——吹笛子——上海的
民主运动——在等待祖国召唤的日子里——
简单的结束语

· 抗战史料 ·

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李默庵(111)

南岳第一次军事会议——创设南岳游击干部
训练班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回忆参加研密日本究

电码的前前后后……………王维物(116)

密电检译所的成立——顺利地破译了日本外
交密码——扩大规模，自行设台——七七抗
战和南京撤退——在武汉，集中力量侦收日
本军用密电——和中共取得联系——在桂林
相继破译了日本海、陆、空军密码——由桂林
迁到昆明，继迁重庆——军统的野心——将
译出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成立军事委
员会技术研究室——温毓庆的引退和军统的
侵吞——“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毛庆祥
来接替温的情况——秘密通缉和通缉令的撤
销——监视、盯梢和“不得离开重庆”——怎
样和中共失去联系的——毛来就职和带来的
上方宝剑——破译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密
电——改变研究方向的企图未能实现——我
的辞退

关于救国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李 庚(149)

· 政治史料 ·

记盛世才在新疆最后一次的大逮捕及其前因

后果 金绍先(161)

翻云覆雨的刽子手——一股暗流——阴云密布——暴风雨——制造假案的三部曲——自食其果——所谓军法审判——众矢之的——
结束语

· 保险业史话 ·

美商美亚代理保险公司记略 林豹岑 王新厚(174)

解放前外商在津的保险事业 许良瀛 戴学熹(180)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掠夺的机构——
保险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
——保险事业的种类——天津保险
业概况——外商在天津经营保险事
业的内幕——解放前天津外商保险
业中的典型人物——外商在津经营
保险事业的优越手法——许良瀛从
事保险事业的经历——结束语

英商“保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曹韵清(201)

帝国主义掠夺的又一方式——记英商四

海人寿保险公司 刘锡珍 口述(212)

安崇峻 整理

· 清朝八旗军回忆 ·

西安八旗小史 李级仁(219)

邓演达遗札

邓演达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重要的反蒋派别的领导人。这里发表的是邓先生在大革命失败后侨居外国期间，与亲朋故旧来往的信函。这些信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氏的政治观点、主张及对人生的看法，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邓演达先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信札系季方之女季明提供，文中〔 〕中内容系整理者所加；（ ）中内容为原信所有。原信缺字处，均以□填充。

[1928]年3月5日于病院

正成[季方]：

接到你第一封信后（由上海来）即复你一函寄沪[此信未见]，你已经收到了么（址系美租界周家扁路）？现接你由港来第一号详函，应再详细复你的信[此是邓复第二信]。立三[严重]的思想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农业社会的反动思想。他配不上说“国家主义者”。因为国家主义是近代工业发达的社会产物——即中古时代的国家观念，亦必须建筑在人民的乐利主义上面。他的思想虽然和“中庸”的朽腐的礼教的孔子学说稍微不同，而结果必趋于反对革命，为反革命的新旧军阀——封建势力所利用。在他的眼中简直不承认有人的欲望，更不晓得有社会的共同需要，所以他现在只便侥幸不作新桂系军阀的附庸走狗，亦只能作“道学会”（辜鸿铭康有为辈的信徒）的和尚，配不上生存在今日的世界，祇合赶

快自杀!!我自从和他结交以来，信仰他，得他助的地方很多，但是早已担[耽]心他那种反动的空幻的哲学。现在他已经是走上了深一层的幽洞里了——这是中国反动势力复活的反映——我们似乎已无法救援他。只好听他自择！正成，我们要决心，并且要认识：必须根本地扑灭中国现在还残留的一切老庄的空幻虚无思想及孔子的中庸苟且愚蒙思想，佛教的否认世界生活思想，耶稣的妥协调和思想，而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执机关炮的态度和行动，把礼教、老师、宿儒、绅士、道学家，一切摧陷廓清，把孔子庙、贞节牌坊、祠堂、庙宇，和中古时代的城郭一般一齐扫灭，而代以新的、“人”的、社会的、乐观的、有希望的人生观社会观，使男女同胞们一齐冲出目前的中国地狱，跑上新鲜活泼的大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可能。而这种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必然要在伟大的平民革命——在中国说是农民革命——以后，在新的生活条件上才可以实现出来的。这个思想上的战线，我们新党的领导者必然要加一番彻底的研究和彻底的认识，才能配做新党的信徒，才能负担改造中国的使命。我们眼中看见戴季陶的变化，已一日一日地到曾国藩、康有为的地步。现在已留有左宗棠和辜鸿铭的长生禄位牌给反动的白崇禧、严立三了。我写到这里，我不但不可惜，我并且喜欢思想上的战线已经分划清楚，新中国已在诞生期中了！

我在武汉期中的工作，因为党中含有反动的多数势力，所以必不能不和CP联合和他们奋斗。我的责任是革命，我的朋友们亦应是革命的朋友们。我在反蒋以前已用电报详细告知立三，只恐怕他未曾接到。即使我不通知他，也不是过错，因为革命党应该在革命的纲领上工作的。

新党的一切主要工作——如成立宣言和纲领、党纲、组织法等等，我一星期内出院后即行开始工作。目前临时工作可参照我前数日寄香港给你们的公函办理。关于政治部人员灰心及浪漫不团结的现象我已用力纠正。我的态度意见已发表以后，他们必然

更有趋向不至纠纷。惟无一人能担任实际工作为可虑耳。

前寄回宣言系9月中起草的，今日已过时，发表时可以反面的记述分记各报各团体——北京顺天时报必能登载。新党成立的消息，或者亦可简略露出意思在各报中发表。宣言印刷事不必在印刷局中去办。我们各同志都应能写能印。油印机已够，何以各人屡屡来信并无办法印刷，可知同志中无人确实负责热心办事。可叹！

最后我应该告诉你：我来此系经陕甘蒙古的大戈壁及苏联的〔此是初到德写的，应为1928年〕。不眠症至今为害，真恼死人！但一星期内必与病相战矣。印刷事俟学会款拨到即应开始。工人以相信的青年同志为佳。步仙已否救出〔侯连瀛于1927年12月4日被捕并被判两个无期徒刑，至1934年10月4日才被救出〕？蕙凡今日来一信说他或者可和你一块工作。这位老先生，也几乎要受立三的“道学”毒的，他能出来又多救一好人的命了！

问你的健康和进步！

（这信如可能时可给立三看）

[1928]年5月

典[季方]兄：

八、九、十号信均已收到。但第六、七号信，至今未到，想沿途有失？前参[立三]复你的两信，我都看过了，这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本来的思想就是“教皇”的，神秘的，反动复古的，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也不过是偶然。现在正好和他的理想上的同事合伙，打算去继承吴佩孚罢！我们自然不能和他在一起的！

蒲仙[即“步仙”，侯连瀛]的小孩[侯瑞桓]现在怎样？他很聪明，我们一定要成全他，而且要接济他。我已去函岳化[丘萼华]设法。请你就近注意。接你九号的信，知凡凡[季方长子季凡]又死，这事真是叫人悲哀！不但你现在的环境必然感着，而且凡

是你的朋友都必然感着。我以为那小孩如果生存，必不让蒲仙的孩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在“将来”的，不要过于着想“过去”。我盼望你的思想上的生活能战胜你现在的困难境遇！

贡献[邓组织刊物]（这个名词已经是投降的名词）的文章已经看过了，在表面上看是对的，并且谁都会说的；但是他的立脚点差了，而且不从中国社会的构成上去分析并不懂得政治的“活力”，所以必然的发生“结论的错误”。突击[邓组织刊物]在国内已难出版，（据学训[邱学训，北伐时曾任邓秘书]信）当在国外办，专文批驳他们的文章，自然可以在那个出版物上发表。

关于学会[断金学会——邓的主要经济来源]事，已详前复函，并已严函岳化办理，大约他已和你接洽了。

沪上情形久未得详报，不知如何？日本攻击事，目前自以设法活动，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合。惟政府必然取妥协投降政策[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蒋果如邓所料，且6月进驻北京、天津，则此信应为1928年5、6月所写。]以图取北京政权，此层民众方面当设法告知，使自择安危也。

宋[宋庆龄]先生已到此同居，一切事商量甚多，日间当络续寄回。

书店[爱的书店]事自以勿对其他人告知为合。并望奋力经营之！余详后函。顺问进步！

请与杰[郭冠杰]兄商量，即买：中日字典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经济的）、又日独字典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经济的）、又日文的明治维新史，及最近政治经济状况小本号各一二本。

[1928]年7月27日

正成：

我由子英处转各兄的信想已收到了。我的决心已是如此，不可变易，兄等谅能了解，并不至因此而灰心。我们要设想中国的工作处处都带着超时代的使命，我们不能太过奢望和急迫呵。琪

翔[黄琪翔]已到法，曾有信来，不日到德来相晤。我因休养身体及利用暑假期间起见，特于7月17日由汉堡乘轮来北极附近旅行，沿途经挪威各海港，所见甚多。现正夏季，故一入北极圈（北纬 $67^{\circ}23'$ ）即半年为昼不复有夜，半夜太阳犹高悬空际正北方。南人到此，真另有天地也！船大14000吨，载客千五百人，全程十八天，收费仅由250马克到600马克，合中国百二十元到三百元，比之中国旅行可谓平极。而食堂及一切设备（如图书馆、舞场、饮冰室……等）皆一律公开享用并无等差，可谓具有资产阶级社会中难得之事。24日到此已为欧洲极北部岛屿，最近北极探险队均由此出发，意大利飞船探险出事亦在此附近。故地虽无人烟而为世所知则甚多也。我们乘船因入港时遇大群浮冰（北极圈内夏季仍多浮冰）碰撞太多，至头部受伤甚重，入水数尺，幸近岸即驶入停泊设法补救，本船人员卒无方法，电俄国之碎冰船克拉辛（此船已救北极探险队人员甚多，声誉满世界，不料我人亦被其救护也）乞援，因彼船有潜水人员可设法代为补救也。克拉辛号昨抵此，整日夜修理乘船伤处。照计划本船尚须北行至北纬八十度处为止，但现伤痕难期速愈且北方浮冰尤多，万难再行，故一俟修竣即须南返矣。在此过三四日之北极圈生活，为趣亦多，盖之周围皆冰山，昼夜皆太阳炳耀，不知黑暗，附近人骨兽骨甚多，盖历次探险队在此附近牺牲者已不少矣。亚洲人来此者恐以弟为始[邓为中国人进入北极圈之第一人]，满船人客对弟甚客气，同行者多教育界职员，女人尤多。每日无线电讯多关中国消息，惜不能与兄等面谈一切也。旅行所得当另函详。专此为北极旅行纪念，并作怀友记录。余到柏林后再函，敬礼敬礼！

[1928年]8月8日于北纬

63°挪威西海岸船上

忠实的正成：

数日前在挪威极北尖岛所发的信谅已收到，前日在哈米尔斯

特接由柏林友人转到你七月一日由上海来信，你所要求的答复，已大概详由子英转的信，不必再述。我的工作，俟回到柏林后当详细告知你，并预料有好结果。你独自工作自然是辛苦枯槁，书店事请设法维持，不必定须慧凡来的。聘三[谭平山]处也已经另有函告知。笠三[即“立三”，严重]在思想上为与吾等极端反对，而在友谊上则为金石不渝。我每每在至失望时念及他，在最有把握时也念及他。我想他也一定时时念及我们的。他真是一个至可怜的人呵！

我们的船在尖岛附近，被浮冰撞坏，已详前信。因此欧洲各处都有恐怖的消息传出，因此船被俄破冰船克拉辛号救出，故更由日常事故而变成政治的事件，因此德国民族党的乘客十二分不满意于船公司。又因乘客百分之八十为教员及机关办事人，百分之二十为商人及学生，因修理时间搁至一星期之久，各人大受损失，故公司不能担负赔偿。今日决定，乘客若在两年内，再作同样旅行，可减价百分之六十，亦可见群众要求之力量也。

奇羊[黄琪翔]已到德，但尚未见面。

船现在挪威中部海面，预料十一日午可回抵汉堡，十三日可到柏林。身体尚好，惟睡觉仍甚少耳。唉，正成！我每念你及笠山[严重]我并不孤！我每念及中国，我实觉责无可卸！盼望不久和你们见面罢！问你及冠杰[郭冠杰]学训等的好！

告知学训，我会写详信给他！

[1928年]11月25日

君达[张君达为季方的化名]兄：

星期日又到了，未曾接到你的信，念念！我前个星期日写给你的研究范围，你已经收到了吗？纲领已经完全完成了，明日可以开始付印，印就即寄回。

给蒲鲜[即步仙，侯连瀛]的信，你可以转给他吗？瑞桓[侯连瀛之子]读书怎样？望你有机会的时候就代我致候蒲鲜！盼望他

能够早日出来罢！横竖也是在监狱里一样，不出也罢了！咳！只望他能够得到书看，能够减少他的烦恼悲哀，减少他的挂念！请你告诉震华[庄明远]，为什么到现在那位四川的罗榷[1929年1月27日邓信才知其牺牲，则此信为1928年写]先生还未有打听出来他到哪里去了！究竟生还是死？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的代价去打听，并探知他家里的情形！

唉！君达！你知道吗？立真[郑立真，邓夫人]现在来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她怎样的悲哀凄惨！我早已决定不再和她共同生活的了。我并且有信告诉过她，我深信中国妇女——她自然免不了——都是在监狱里头，都受着人家所忍受不了的痛苦，我们应该解救她，帮助她。我所以自从结婚到去年出国前止，都是抱着一种救护女子的意思，都反对一切“时髦男子”抛弃旧妻子，去讨“时髦老婆”。所以我曾忍受了好几年的生活平淡的过去。但是现在我的决心是由这样出发的：a. 我现在不能和她同处；b. 我的工作她不能够协同；c. 我不能由她得到一种生活的刺激，使我更加进步奋发。因此我决意和她分离，自然在法律上手续是未曾经过的，在感情上她是十二分难过的。她并且说过，如果我一定不要她，她恐怕是要自杀的。君达兄！你看这事怎办？我望你和冠杰商量一个办法告知我（冠杰请你给封信给他看），我现在暂时不能答复立真的信，因为如果我坚决地说不理会她的请求，那她一定是要绝望或者要自杀的；如果我和她说妥协的话，又违背了我的决心，我不能办的，所以只好约迟一下。

书店[季方曾经手在法租界八仙桥开设过一个规模很小的“爱的书店”，发行《灯塔》、《突击》两种刊物，并作为联络点。]的事怎样了？震华已经见过你了没有？我恐怕他还未有接到我交带他的信。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冠杰和言川[即邱学训]上星期我都有信给他们，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信来？请你质问他们一下子！关于他们的生活我们团体内自然要尽量帮助的。不过有家眷的人负担太重了，怎样办？……

林熙盛现在怎样？请你和他联络一下子！笠参[立三，严重]处有消息吗？他现在一定是打算“到死不变”的！这也是好的。康有为未必无补于世呢？！言川上次有信给我，说他要办书店，究竟他是否和你一块办呢？震华近来如何？蒋煊现在怎样？斯励有消息吗？得空请你都说一下子！上次所问的，我寄你一个大纲详函，已分别收到转去吗？念念！

问你们的好！

[1928年]11月30日

君达兄：

第二十七号信已于前日收到，寄来杂志书籍等件亦均收到，本日由《益世报》知笠参已离汉职赴庐山，未知究竟因果如何？弟意必定系他对时局灰心的结果，他现在已成为反动势力的测验器，他的灰心即表明反动势力的崩溃将近，我们在友谊上及责任上都有叫他回头的必要，所以请你务必设尽一切法子打听他的实在消息，如果可能者设法叫他到上海来，我的意思，他如果真是认为“路走不通”了，或可以有叫他学“科学”——他所谓“洋八股”——的希望，你以为如何呢？请你设法子罢！

前函所谓印物大约一二日后即可办妥，如震华处可靠，或拟由他的信址转来，岳化来信说，港行被抄未知详情如何？甚念，匆匆致上并候。

我很喜欢你现在能用功看中国实在社会史等类的书！

告知岳化叫他来一封详信报知港方消息。并代候冠杰他何以不来信？[似与1928年11月25日信内容相合，但彼不编号，而与1929年11月编号信号序可相接，究竟何年？]

各兄对我前封信的意思要来信说知一下子！

[1928年]12月16日

君达兄：

11月25日的信收到了。同时接到了学训兄及章（章伯钧）兄等的函均对于土地问题有所陈述，这是个很好的景象。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土地问题解决为必须经过的步骤。但是我现在以为未曾到这个可能和必要的机会，我们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援助及目前中国经济条件的允许计，必须对这个问题详细地考虑并能实际地马上应用出去才行。我所主张的政治没收及经济的限制二项实与聘[谭平山，邓回国前他曾负责主持一些工作，邓回国后因主张不一致离开。]兄的提案根本无殊，不过说话方法有差别的样子而已。这一点望你们详加考虑！我的意思，聘兄一定同意于我的提议的，不会生出其他问题来的。

整个详细的宣言和政纲已寄香港三份（由尊华[丘尊华]店转，恐会遗失了！望尊华迅设法查！）又由彭[彭泽民]转二份（想他不日能和你们通信）恐不能收到，故今日又由他处转你们一份（由祥顺里转），望你们妥慎地去取。

收到了，即请比较的大规模的向各人征集意见，最好由聘兄负责征集各人的意见汇起通知我，好作以后的商量，这事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无一致的纲领，决不能有一致的行动的，望你们详细地商量并与聘兄商量。（另有一函致聘兄，想他可以收到！）

书店事如你们的意见很好，但现时因经费关系，恐怕难得大规模地去做，所以至好妥慎进行，勿蹈从前覆辙[“爱的书店”曾被查封]；现在就请你担任监察事务，言川担任编辑事务，尊华担任经理事务，震华担任印刷事务好了！但是各事应由你负责决定一切。明兄副言川，其他的事也照此进行好了！经费宜暂行照原议拨二千元为书店用。支薪最好是正的四十元副的三十元，但各人能有作品则按他例另行报酬，如此则此组织的根基才能支持下去的。请你们办罢！

此外，庆[宋庆龄1929年5月为中山先生葬礼回国，则此信为1928年写。]不日可回国（十分秘密，不必告人），关于书店事及其他事务将来就近当然比较容易进行。目前最要的是团结同志。港

方面应请泽民[彭泽民]担任才好的，此事已告知聘兄，望你们能和他们联络。我每周有长函回国报告事，打算必须做到。数日内将有长文论目前国际情况，请告知言川兄，书店将来需要的“人材”自然要慢慢去找。春潮书局究竟属于何人？林熙盛最近给我一信，知道他们也有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如果事实无妨，正可与他们设法合并共同工作呢，你以为如何？请你们详细商量！你目前的生活费无论如何要由公共支你，请你每月支四十元好么？我要通知尊华的。

问你们好，并设法问蒲仙的好！

（致蒲的信转去了吗？瑞桓怎样？）

[1928年]12月18日

君达兄：

星期日寄信谅先收到了！目前第一大事为纲领的决定，我寄你们的刊物收到后一定要设法召集比较有认识及经验的同志们讨论发表意见，并告知我！

聘兄的意思和我不是原则上的不同，而是策略上的分别，这是大家应该明白认识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对他不要错认了这点，并且要帮助他，谅解他，听从他解决一切目前的问题。

关于宋事[宋庆龄归国事]要十分秘密，不好叫外人知道，至于行事有妨，书店的事已经决定如此做，我已去信通知，尊华请你们积极进行好了！

书报杂志都继续地照数收到，勿念！你现时对于家内所负的经济责任困难到如何程度请告知我！瑞桓现时怎样？立真对我现时仍然是缠绵到万分，我真是无法对付！我盼望她恨我以至于弃我，可以减我的责任和挂念！笠参已回鄂去还是决心出来？请你打听清楚告知我好吗？你现在看书的计划怎样了？印物收到后即刻来信告知我！

[1928年]12月28日

日昇[方日昇，季方的化名]兄：

叠函谅收到。耶稣节这里放假两天，我也曾撇开了日常工作到野外去跑了两天。在大风雪泥泞中行军——只不过走了七十里左右。前日夜又回到工作地——“家里”来。

据岳化来函书店招股事进行很不错，已收到一万五千元以上。我以为愈是招股容易，愈宜小心经营，以免大意失败。我现时在外不能悉心擘划，且此事大半为营业性质，我亦不能多事干预，故请你们大家以小心、节俭、勿铺张三事做去。卓氏出股已多，当然是主要经理人之一，望你召集大家以民主的形式定夺书店各事可也。现时我们团体内可支配之款只存七千元，各项支出日益加多，望你酌量情形，至多照前给岳化信以三千元为限，加入经营也。

笠参据报已脱离鄂政[似应1929年，或1928年也脱离过？因1928年2月—6月蒋桂冯阎曾联合对奉作战。]，现在他实在成为可怜而又最可贵的人，可怜的是他始终找不着出路！可贵的是他终竟能明白所做的是卖身的工作，是为人家造孽的工作，终竟能舍之而去，了无牵挂！我们在友谊上在责任上都應該设法找他并帮助他求出路。我请你无论如何设法和他见面，并把我的短信交给他。

太朴[郑太朴，1929年回国]不日回国，一切事托其全权办理。前寄你各印刷物未知能否收到？念念！

蒲仙的近况望示知！你的家景现在到如何程度？望你大概告诉我一下如何？余不一一，顺候新年进步并祝健康！

[1928年]12月31日

君达兄：

前日寄你函及参兄函，谅收到了！今日新年将到，更不能再写信给你！

你打算对参兄怎样的处置？你能够和他见面么？你有钱使用么？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办法！我想这是参兄目前唯一的解决机会，我们不能叫他错过了。至好你先接来上海一同居住，我再设法往下去做。如果慧（慧凡）兄能够一齐到上海来，那就叫他到书店里打理去，他能打理的事情也是好的！望你就近设法罢！我现在应该请求你告诉我：究竟有和蒲兄联络吗？许久得不着关于他的消息了！[想必不止一次设法营救过侯连瀛。]前半年我告诉你，我那封给当权人的积书，因为旁的缘故未曾寄到，所以未有丝毫的影响。我请你设法代我致他一个新年的敬礼！学校[指组织]里一切的决定由太朴[郑1929年回]代表我回去处置。今晚这里的朋友们通通集合一起了，有一个快活的聚会。同样祝你和一切朋友们的进步健康！

[1929年]1月6日

日昇兄：

12月15日的信收到了，我的住址并未改变，何以你和岳化等来信忽然由他处转来，想系误会了，我寄他们的行李住址的缘故（两月以前我曾给他们一个寄行李的住址，现在衣服已收到，无须那个住址了！）望你通知他们以后来信，还是照一向的住址（F/sufwaua）寄，以免迟滞消息。

瀛哥的本质，在现在的困难时能照常坚决、宁静、勇敢，真是我们朋友中十二分难得的试金石，试过了以后不愁不能负担社会责任的。我也同情于你的见解，叫他现在平安在牢狱住下去，也不能不说“好的”！

印刷物你们应该是已经收到，原则上和聘兄等永远不会分离，但在目前工作的进行上，我的意思应该十分作文化工作的工夫。除此以外，其他是难在最近的将来获得效果的。所以书店事一定是要努力去做。聘兄来信曾反对独立地办书店，他已有意思管理，那应该就听他的意思为是。不过书店中的股本应该十二分

慎重地保管经理，不好任意支销，致后日结果毫无也。

聘兄处已托岳化即日付五百元给他，他还未曾办吗？断金会款已照前函托你及岳化负责，凡对于亲密的各友及急要的事，凡数目不大的，自然你可以酌量支出应用，望你勿介意。

我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并未曾忽略及隔膜，这个分析能否应验，看一年内自然可以应验。中国前程早已不是中国本身力量可以规定，不从国际的情势出发而观察，必然发生局部的错误！

我一向从事的，决心编绎的太平天国史及明治维新史，因国内其他需要更加急迫，故未能完成。但日后必设法编成出版也。

太朴兄月底动身回来，附其带回我最近的思想系统和政治见解一长篇回，或者可以翻印付各友一览也。

立真处已详细决断地复了她一封信，她一定会因此更加伤感，但我无法完成她的希望也。你目前的生活状况，望你来信时附述一是，顺祝敬礼！

[1929年]1月17日

君达兄：

第二十七号函收到。二十六号函寄他处转的，也已转到，于1月6日复知你了。想你可以先后收到。昨日又接自申来电，错字甚多，但主要意思可推知。庆行止，已叠详前函，故不必电复，以省费省事。他大约经西伯利亚先到北平，朴兄同行。本日已经告知聘兄，说明或者可设法在彼处见面商议此后教材取用及教授方法[均暗语，指宣言、纲领、革命方法等]各事。但应如何决定应由聘兄自择也。你们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察都是局部的，都是为中国的情势所限制，故不能真正了解中国问题。你们应该知道中国局势是由外力定的，所以如果不从全世界的局势看去，当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我可以简单地说：中国或者暂时再把分割的局势延长，或者快由美国的领导到迅速发达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去。但是无论如何，结局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我断定如屡次函内所

述的。这种情形你们可以由日后的情势推知的。瀛哥附我的信已收到，我十二分钦佩及感激他的毅力和热诚，像这样的人才真是顶天立地的。立兄的刚强不亚于他，但是太为旧社会所锢蔽而不自知了。现在好了，他毕竟是汉子，择善不后人，嫉恶如仇敌[和1928年12月28日信严重已脱离鄂政相合]，这两句话是可以奉赠他的。我十二分盼望你和他亲见一面。我上次寄给他的信已经转给他了么？我盼望无论如何第一步你把他拉到上海来同住。第二步我再想办法。

瀛兄的信，我另日详复。

书店事，应取营业主义，照正当的股东会议办法，不好过于被人干涉。至于最好的朋友们在店中任事的，自然可以听老大哥的招呼，但是千万注意政治化的恶果，至于店内一切用人行政，我已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再不愿意干涉。请你们自己去办吧！

盼望你忍耐，不因小小的事而灰心失望！

[1929年]1月20日

君达兄：

前日复你的电报和信想你已经收到了。现在复瀛哥一函请你阅读后代转。

笠兄你已经和他见过面或通过信没有？他现在是一个寒林中的苍柏，他需要人们的维护、赏鉴，请你无论如何把他接到上海来同住，好吗？我那封信，他如果读了，他一定是半点头半摇头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所依托的社会的腐朽，无法为力。

学会的款，前托岳化和你共同负责的，已经收到了么？书店的经营，只[至]多能投资三千。因此外用途尚多，不宜过于冒险也。

你和笠兄岳化等生活费，请从会款中支用，请勿介意。朴[郑太朴]兄的父亲据说已经逝世了，他家里很穷，请你们就近送他一百元作治丧费用。余不一一，顺致 敬礼！

印物收到后，各人意见如何？请详告我！

[1929年]1月27日

君达、岳化二兄：

岳兄12月16日自港、君兄除夕日自沪来信都同日收到了。你们的信都照我寄行李的地方寄是不对的，因为耽搁了许多时候。请你们务必把申报及各处的地址改过来，仍然寄到 Bayarichestr.

29.勿误为持！

新店[新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无论如何要待太朴兄回去决定，我已将此意告知聘兄，请勿卤莽从事，致贻失败！来函所转潘[潘振亚]某的意思完全是无赖的揣测，请勿介意。陈某见面问题，你可以私人资格去见他，但你不要具体地去主张发表意见，只可以探他们的意见。

罗榷兄竟被害了！我对于此事应该负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的，因为他是我派去的，而且我无法叫他在反动的势力下退出来！我真是许多同志中的罪人，我知到何时才能把罪赎完！也好，把他和孙炳文兄的事迹先行设法搜集起来罢！我们不要忘记了替他们报仇！请你们设法打听他们的家属情形，好么？

书店的营业何以始终无确实的消息？望你们集中一切精神办这个事，其他都是漂荡的！

我目前一切的工作集中在经济史及理论的研究，七月以前可以完成一个段落。本月底务必把政治理论及史的研究告一段落。中国问题总在明年开始了。一直到现在研究所得的结果虽然很少，但是已经成了一个系统。我已经把这个系统的思想和主张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太朴不能会面，我打算寄回给你们大家参考。

你们读书的结果如何？盼望说一声！应该买一部威尔士的世界史纲（商务馆出）给步仙看。

震华许久未有信来，现在怎样了？聘兄要求的每月款项，你

们有什么办法？自然只好作罢了！我已经答复了他，你们不必想法子答复。问你们及各兄的好！

[1929年]2月3日

君达：

寄来的《饮冰室文集》已收到。但是恐怕要在年底以后才能看到，因为我的研究计划已决定了，如上次信所说的一样。

我由鸣球处知道笠兄的住址，现在告诉你，请你先和他通信，他的倾向似乎已经决定，不能再出来到任何地方去的；但是我们有对他贡献劝告的义务。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活埋在宇宙里，实在是可惜的！慧兄怎样了？你能够和他通讯吗？蒲仙的信谅你已经转给他了。朴兄决定本月十八号由柏动身，大约三月初可到北平。一切问题要等他回去做一个总决定，请你把这个意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辞修[陈诚]有信来，要出来“求学”，我已答复了他，赞成他的话。你读书成绩如何？我有两篇短文，一篇比较重要些，五日内可寄回给大家参考参考。问你和各位的好！

笠兄通信处：九江星子县龙永春转交栖贤寺离尘和尚代收。

[1929年]2月17日

日昇兄：

第二号信已收到。前星期日用挂号寄你们两封长篇论文及信已收到了么？念念！

笠兄的踪迹我已于前信告知你了，想所得的结果是相同的，我看他不会听我们的话就出来的，但是我们且努力去劝他出来罢！我想，他的出来，非等待我们在哲学及政治经济的主张成功了一个很显著的系统以后，他不会折服，他不会出来的；所以我们且十分努力于系统的完成，留待后来和他见面罢！

你们对于起草的文中以为有两个缺点，在第一点——对国家派——是似乎对的，但是第二点——对民权——是绝对的不对。

我相信在目前有政治主张的右派中，未有一派相信“民权应该发展”可以和我相比的，只要看我对于中国现状的分析和政治制度的主张上面已经可以明白了。但是民权在中国发展必不能取自然的形式，一定是由争斗的形式发展，所以我要主张职业化议制就是因为如此可以多多引起争斗；同时在各个争斗团体的会议中有党的代表团可以做有力的公平的仲裁，就可以达到客观的应得的结果。所以我自命我的主张叫做“争斗的和平主义”，也可以说是“争斗的民主主义”，已不同于欧美的德模克拉西，又不同于苏联的强暴独裁。这一点我必然要详细用单行本去说明的。

宣言的公布现在的确尚非其时，我盼望只是同志间的讨论，不必大锣大鼓地吹奏。朴兄约要迟些日子才能回去，夫人[宋庆龄]则因葬事改期更须迟日返来。但一切事可照常办理不必等待也。

你来信关于嘴平的脾气，我的见解和你相同。国内所谓有希望的青年，不是限于环境为煽动的争斗团体吸收盲动盲说，就是保存着农业社会的固执和偏见，无法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道路。我们要负责改正的自然不止他一个人，只要我们还一无生存，那我们用功的方面还是向着补助和改正现时所谓有希望青年这一个道路用力的。至于我们朋友团体的基本要素可以说现时还未曾具备，说不上有什么毛病发生。必然要：第一、中心的思想系统，第二、构成在那系统上的干部。两者具备而后一切才能着手。我近日一切用功方面都是在第一点用力。可惜无机会可以使我的一点悉悉表现在你的面见呵！书店近来情形究竟如何，始终未得信，至念！问你们的好！

陈公博现时出了一本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请你设法寄来看。

[1929年]2月24日

夫兄并转君达兄：

由君达兄转各兄信，想已共同阅过了。书店事许久未接你们

的详细消息，甚为悬念。请将详细股本、组织、事务进行等等告知！一切务宜听聘兄指导为要。

聘兄生活甚难，望即拨五百元交伊应用。言[言川，邱学训]兄许久未有信来，究竟近状如何？

朴兄昨动身回国，不日谅可见面，前函请由团体送其家百元作为其父治丧费，未知已办到了未有？望函知！

君达兄最近寄来杂志一包又收到了。余不一一，顺致敬礼！

[1929年]3月3日

日昇兄：

2月7日来信收到了。杂志各项亦收到。来信所称负责审查的友人名字中有马浚一人，是否在革命评论及双十做文章的马某？他的理论见解大概是不差的，但是他是否真实同情于我们？这点望你详细考察后告诉我！

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还未曾十分了解我的意思。我的原稿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那一段原来是照前时的长信说的，后来经太朴的修改才变了现在的名词。太朴所用的名词我是一半赞成一半反对，所以我只好迁就他的意思叫大家讨论。但是如果叫我投票决议时，我是要保留我原来的意思叫中国革命做平民的民族革命的。平民的意义本来的很混淆，但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本来就不像欧洲过去及现在这样简单的，所以“平民”二字倒还使得。无论如何比“国民”二字好得多。

阶级基础问题只须说明平民的内容就够了。我在分析中国现状的一章内已经非常明显地说出工、农、中小工商业者（华侨在内）及学生为平民，为革命的群众。至于这些成份中哪个是主哪个是宾，这个是纲领的问题和主观的努力问题。在第一点说，我们的纲领自然是代表上述各阶级（学生自然不是一个阶级，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众集团，所以我们不但在策略上工作上要把他当成一个重要对象，而且在纲领内也另

外列成一系。)的利益，但是得利益最多的是谁呢？这个是事实的问题。我以为谁都得到很多的利益，只有将来的利益是工、农最多，所以也可以说工农是革命的基础。在第二点说，主观的努力问题是各阶级群众组织的问题。我们的着手，一定是一方面要有相当的现成力量作群众运动的支撑，他方面却是主要的从事于群众的斗争组织。在最近的将来——特别是内战重新爆发的时候——恐怕农民的组织及学生的组织是一个主要的武器。此外，中小商人在城市中的组织，绝不能因工人运动一时不能到手而被废弃或过量的拉合，使工人群众发生怨恨，但是城市中中下层民众的联合反抗军事独裁的暴力，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为革命前途的一个关键。

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和误会。但是如果朋友们能详细地用功去做一定有好结果的，请大家用力讨论罢！

另外有一封详信给聘兄，或者他会交给你们看。问你们的好！

[1929年]3月 日

正成：

2月28日的信收到了（第四号）。我一直到现在才接到过二天的《申报》。我想一定是中途发生阻碍，所以不能继续收到。

关于党务的事，问题十分重大，目前进行固然困难，但我们也希望立时可以容易进行，因为中国的问题，实在比世界上其他的问题重大得多，不必因困难而灰心，亦不可因容易而狂喜也。

目前最重要问题为可靠同志之集结及生活安顿问题。关于第一项，我们可以继续工作；关于第二项，我们须立即想出办法。我以为一方面可以在灰色地方暗藏，他方面可以在通商大口岸找一位置。

我们的印刷所事十二分希望快成功。但一切办法均须万分秘密。你的名字应完全改过才好，自下次起我将呼你为方日昇。你应该立即设法办以下各事：

1. 将所定津沪港汉粤京各报一律照下住址改寄德国丁策成先生

2. 即设法在沪（由学生会可办到）办一外交部护照并声明赴法、德读书，由沪法、德二领事签字后即寄来给我（相片可用与我相貌差不多相同的人代之）。

3. 对于平山等（原属CP而后退出的）的行动详细告知。

立山的信送到否？结果怎样？我对于他的希望已经消失，不必以他的结果为虑。

你现在稍有工夫，应先看清朝全史，及日本明治维新史，此后我当陆续把心得寄回作你的参考和帮助，问你及各兄的好！

[1929年]3月17日

君达兄：

前星期因未接你的信，所以未单独复你，仅寄了一封信给岳化。你大概也已经阅过了。第四第五信及杂志，另外瀛哥的信都收到了。瀛哥的信我改天详复；朴兄等大约三四日内就可到沪相见，一切可明瞭。惟时局变迁，或者已有若干内容不适于现在。我已经有一封详信给聘兄，详述我目前的意见，我打算明日再给一封信给他，所以今天不多写。

书店事应该从小处着手，并且用灰色手段。照现时情形看，如果你和岳化能用力纠正，或者还可以免去失败的危险。

前途事你不要过于忧心，因为历史的时期在现在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工作尽有别的路向可以发泄。

今天因为他事缠扰，决定明后天写一封长信给你。改天谈罢！问你们的好！

[1929年]3月23日

立三：

待罪的人得到了自称“罪人”的一封信，实在是一方面感着无限的同情，他方面又掀起无边的忧闷。我的同情是：你已经稍稍走上了向社会去要求客观的认识的道路；我的忧闷是：你无论如何只有供中国现时最黑暗反动的势力作牺牲！

立三：我本来要很详细地、理性地答复你那封信，但是一来我恐怕今晚的心情不能作到，二来恐怕你又已经上了战场，不能够在“杀贼”工作中花那些闲工夫去看罪人的自白，所以只得简概要地先说几句：

你如果否认理性，一任你根著最久最深的神秘情感继续增长，那我可以不用说话——但是还是要说，或者说更多更利[厉]害的——如果你要拿理性作基础来讨论，那你应该承认你的“空虚”“简单”或者竟是“浮动”。但是我应该承认你对我的批评，凡是关于我的性情处事的地方都有十分之八九是对的应该改的。但是你忽略了我的认识，忽略了我的主张的根本。你不了解我的世界——现代的世界——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在理智方面接受你的批评，并且要无情地向你反攻。

你的根本错误我已经在由正成转给你的信上已经具体地、大略地说过了。我认为你应该是立脚在“保守主义”上边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保守主义”的系统是一贯的，是圆融的，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它的政策是鲜明的，它有它的政治观——国家及世界——社会观。或者代表保守主义的你和其他——戴季陶似乎想学，但是他学不成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和要求与他的主观矛盾得太利害——人等是反映中国社会旧势力的“空虚”“简单”或者是“浮动”。

空虚怎样说呢？他（你所代表的人物）批评社会和政治，绝不是有历史的根据具体的说明而凭玄学的臆说；等到人家和他辩论历史和哲学的时候，他又拿零碎不关痛痒的事实来搪塞，这应

该叫作“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以叫做“空虚”。

简单是什么呢？中国文化和其价值绝不是《庄子天下篇》一类的文章可以包括和说明的。《汉书》《史记》里面的材料如同《盐铁论》一类的东西自然是史的材料，但是绝不是解释现代中国的材料，尤其是不是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材料。但是可怜中国的“文化”代表者竟除了这些之外丝毫找不出一些根据来！

浮动是什么呢？或者可以叫做“被动”“反动”。一向睡眠着“抽大烟”“生小孩”“拜祠堂”“讲厚道”的大人先生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地主，一向是不大管事，政治更是恶浊的，但是现在都先后地要出台，拿枪杆子或者叫忠实的子弟们亲戚们出头拿枪杆子去杀“杀人放火的人”，这个应该叫做“浮动”（这个并不是指你说的，请你不要误会）。

唉！立三！我并不是借题骂你的，实在我是描写现在的实在情形，不能不连累及你。

我对于历史的估度自然有已经决定了的——绝不能改变的原则。这个原则的主要部分是：历史的——社会的——前进，是由于社会内部力量的对抗，尤其是在主要的时机由于两种互相反对力量的对抗。这两种正相反对的社会力量或用明攻或用暗斗，不绝的努力运行，结果发生了新的创获，新的结果而成了新的社会。自然新旧交替的界线不一定可以明显地认清，然而新旧势力在时代的客观意义及其社会代表，必然在争斗当中十二分地划分清楚。

中国目前的时期是历史往前推动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必然感受剧变的“外缘”和“内蕴”；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站在战线的一面，各自去尽到他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所以浮动并不是坏的名词，也并不是旧势力的专有品，而是在酝酿的社会必然有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你的立脚点看，自然是青年的“浮动”，而在我的立脚点看却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

我现在更明白告诉你，在今日的中国，还不到像欧洲现在分

作三道战线——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分作两道战线：保守主义和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你来信还要引它，这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聊。

你现在重新回到旧的堡垒里去，是你的环境和思想必然的结果。但是我相信你不久必然会灰心，追悔，更或者感觉到你的“空虚”“简单”“浮动”而思有所补救。

在友谊上及规律上我十二分可惜你竟陷入旧势力的深渊里不能拔出，在历史的运行上可并不觉得奇怪。但是无论如何有忠告你并且请求你退出现时战线作补救工作的责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卸脱一切责任，开门见山，对着新的世界忏悔。唉！立三！你知道我害死了无限青年和群众，我只有一死来报我的罪孽！我必然有这一天去尽这个责任！但是你呢？你的责任问题待以后再说，你且先把你的历史的责任认清，把中国和世界，及中国自己，及你自己的“内涵”“外延”弄个清楚再来谈责任（过去的责任）问题好吗？

我的生活自然还是断金学会的援助，绝不会倚靠其他政治上的人物。请你放心！吴三桂的罪名我是可以自承的，但是可怜中国今日还未有可以审问吴三桂的人们。

我和立真的隔绝是应该受你和一般好友的责备的，但是我自问只有如此无法自解。

末了我应该告诉你一句，鸣球去年来信说，你对他谈及，你必然地要把南京“恶头”打毁才算甘心，因为这一来还可以使我有做事的希望。我要实在地告诉你：南京恶头对民众纯然是有罪过的，但是绝不是黑暗的中古时代的蛮子酋长可以讨伐他。目前的争斗我认为是民主和封建的争斗。南京方面无论如何是代表民主势力的，所以这个争斗在你所帮助的是最黑暗的一面。[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蒋桂战争。严重应是又在白崇禧处，他们是保定同学，且北伐时白崇禧以总司令部参谋长]

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严重任二十一师师长。由此看严重很可能投白反蒋。]在历史的工作面说是绝对的反动，在对我个人的友谊上说是增加我的罪过。我十二分地请求你不要在这个动机上面逞你的意气！

立三！觉悟的力量是神圣的。只有逞意气与盲目的争斗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事。你是崇拜理性的人，你应该终究到理性的道路上来受理性的驱使和支配，不要使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更加多许多黑点！祝你安心，康健，静思！

古人说不要下井救人，你现在似乎是投井自尽，因为请愿意救的人本来在井栏上面受着苦难，绝不是在井下。

[1929年]3月31日

君达兄：

第六号信收到了，目前的时局紧张状态大概可以减少了一般朋友们的纷争和成见，但是你在当中我相信是最苦的一个人，总是照常的以大量忍耐处之罢了，文化的刊物十二分的需要，在人材方面说，太朴兄是一个可以担任的人，但是恐怕在中国单独组成，目前尚缺乏助手，与其匆促成立，不如比较待到完全时再说好些，突击的前车我们应该引为鉴戒呵！至于经济方面自然凡是你认为可以办的事情凡是支出不大的你自然可以主持办去，不必多所顾虑。

黄埔生方面应与切实联络，但据来信说，一个人包办一切的行动我们不好轻信他。

立真也有信来，说收到你们拨的三千多元，在团体的关系上说她不应该接收这笔款项，当然不应该再行拨给她，盼望你和她见面时忠告她要俭省，打算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立三现在当然是风云中的人物，可惜竟为最反动的势力所牺牲！我本来有一封长信复给他，但是恐怕交不到他手上，所以只得等待时局的继续变化后再说。我最近对于时局的意见已如前信

所述，不另赘。蒲仙的信谅你已经转去，他能否早日出来，要看将来政治的变动如何而定，陈弧[陈嘉佑]本来有联冯倒蒋的臭味，并且在三代会前很明显，现在据报纸电报又改态度，决心帮蒋铲桂，时局如此，似乎转机的可能性转为减少，因为新的革命势力重行联合，必待蒋完全失败以后始有可能也。

其兄[黄琪翔]已决于一星期内经英返国，因如此走法比较的快得多，我们在国内工作的朋友们切不可拿他做一个宣传的工具，并且应该设法秘密，不然以后进行更难，前来电不甚明显，因错字太多，请将最近有关各部军队详细示知，以后来电办法已详前函，请照办，免浪费，新定电报办法已托黄[黄琪翔]兄带回，以后可照用。问你及各友的好！

言川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十个月未有信来，很值得注意。

[1929年]4月4日

君达兄：

1. 武汉事恐快了结。笠兄及薰凡兄必在流离颠沛状况中。
[1929年4月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李、白退桂。]而且笠兄有更走极端的可能，请你无论如何派人设法和他们联络并设法找他们到上海同住。

2. 请你买陶希圣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国闻社出版的《中国新经济政策》来参观。

3. 陈公博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无多大价值，不过很粗浅地表示出他的唯物史观的立场。

4. 《新生命》近来有多少很好的材料可以作参考用，请你和大家留心。

5. 我现在正用经济学的工夫。七月以后再进入到政治学理的范围里去。

问你和大家的好。

[1929年]4月7日

君达兄：

七八号信收到了。昨日又接到聘[谭平山]朴[郑太朴]萼[丘萼华]共署名来电一通。黄当可以详复，兹不赘。

桂系败后中国必更快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久美国必定有大帮钱借入来。

我们目前的工作应仍以文化工作为根据，书店已有相当基础，以后只当在编绎著述及人材养成方面多用工夫。这个是我们此后的唯一路向。我当然应该在这个方面去找人并用功。在所得时一定陆续告知。

我复你们二十六号信的电谅已收到。你的新住址很模糊不清，请来信时，再写一遍。此外我寄你和朴兄多函到旧地址去，请查收。

立三的倔强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坏处，请你照信上办理罢！我恐怕他要和白将军同上峨眉山了！如何是好？请你查他的消息告知并酌付他生活费。

[1929年]4月21日

正成兄：

十天未接你的信了。你一定在这儿中很忙并且很担心时局的进展。

桂系败后，在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容易，但是目前汪系十二分地拉拢各派军阀。冯、唐、朱（培德）、张（发奎）、陈（嘉佑）等均有和桂系残余联合抬汪出台的计划。汪现正在踌躇中，如果这计划实现，表面时局向左，其实向右倒退。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革命前途是好的。

黄兄[黄琪翔]二十七日可离此返国，请十二分秘密，因他的行动不能令他人知，更不能令人知道他和我们往来也。

蒲仙处不能写信给他，请你设法和他通信，慰问慰问他。签

三兄已有踪迹了吗？担心他要上峨眉或桂林去了！余后详，问你的好！

[1929年]5月5日

日昇兄：

第九号信及刊物、第十号信都先后收到，你第十号信上说的话实在叫我十二分可虑！

日昇兄！请你忍耐时局的转移，认清我们的原则，勿以暂时的阻挠障碍而灰心失望罢！这样的时期正是叫我们内部自己锻炼的时期，我们绝不希望人多势大，我们希望的是有原则有步骤而能事实相应。你目前的工作自然可以随你现时的环境缩小及缓让；但是不能和一切人绝缘而且引避。目前自然不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明白，我的状况及工作路向只有在系统的编述一二部书以后才能叫青年们了解的。我相信不久一定可以把我所需要的系统知识得到。目前还未曾十分成熟，我实在不能负起责任立刻去干。

辛农[陈启修]的复信已经看见，由错误而得到了这个结果自然是十二分叫人安慰，我另信复他，请你千万即转给他。我看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助手，尤其是在学术介绍方面他可以尽很大的力量。我现在暂时托他编绎我们所需要的书籍，编就即可由我们的书店出版了。稿费应该比平常人较优地付给。

蒲[侯连瀛]哥或者可以有出来的希望，我已托人去办。奇[黄琪翔]兄决于明晚和庆[宋庆龄]姊动身回来，先到北平，但望你千万不能告知他人（除聘兄以外）免姊事生事也。

奇兄以后工作系取特殊形式，故绝不能以平常为例，并不能要求过苛。此点望你了解。

笠[严重]兄现时必十二分难过，不知有何法可以叫人送信给他，一来因为战事起了，二来因为话太过人一点，所以不敢寄去。现在再寄上给你看看。请你阅后保存起，不必给他看，只留

待我们三人一齐见面时拿出来作讨论根据罢！朴[郑太朴]兄为人诚实而学有专长，应多与接近。现时朋友不怕少，只怕不真实。杰[郭冠杰]兄大约可和奇兄见面，蒲哥的状况大约无他，来信请谈一谈！我现在正找五六个见解相同的人，预备出一个刊物，但是不知到何时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呵！辛农恐怕是能了解我的一个罢！问你的进步、健康！

[1929年]5月12日

日昇兄：

四月十七日信已收到了（第十一号）。我五月五日寄你附复辛农的思想你能安然地收到。（前信已照新址寄）

读你的来信我一方面固然十二分的失望，却是他方面我还觉得他们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我们还可以谅解谅解。我们现在的学校[指邓拟建的新党——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因为校旨的不同，第二因为教材之缺乏，当然不能希望迅速有所成就！不过，人对人的关系，不能不要求正直和诚恳。我的决心你是知道的，我致辛农的信你看后应该更明瞭一切。我将来一定和辛农一同工作，而且全力的工作。国内的局势似乎是要蒋被冯、汪挤倒后才有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奇兄同宋一齐返国消息已详前函。或者在经济方面他们可有相当的帮助。

笠兄近况如何，来信总未提及，十二分切望！请你下次来信说一说。我前次拟寄给笠兄的信已由上次给岳化的信中附来，请保存。你现在已回复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去环龙路国民党上海执行总部前]以前的生活状况了。你真是受东方的哲学陶冶过的产物！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的办法是有理由的。

董琴[江董琴，北伐时曾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福建事变后，被陈济棠杀害。]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他究竟现在要想找什么出路？福建的活动地盘他还能够有相当作用吗？书店的状况还能支

持否？震华[庄明远]最近的状况怎样？

欧洲最近的两大会议，赔缩会议席上中国代表曾经放了一个大炮，因为有德国的俄国的帮助得到相当的影响。目前在国际的行动上，中、德、俄已成为一个无形的联合。南京政权如能再稳定若干时，则俄国有重新承认的可能。这可见得中国问题的大势。

赔款会议几经波折而重复转圆。目前困难问题是协约内部的分配问题。在军缩会议，英、美、法主张一致；其赔款会议，英、美却不能不冲突。但是在大体上，英美目前一致的地方较多，这种状况反映到中国问题也是有意义的。冠杰兄在平凉能和孙黄见面。他的消息也有理由的。可惜我不能立时回来和你及他们一齐生活，但是这个时期必不远的。或者蒲仙兄到时可出来相见罢！十二分的盼望！

[1929年]5月26日

君达、岳化二兄：

君达兄第十二号函，岳兄第四号信，均先后收到了。兹分别答复如下：

1. 石生已有旁的方法生活，自然不能受团体格外的待遇，免人家说话，请即设法停止特别供给。
2. 以后团体及特别用款，如数目不大的，自然可以由兄等两人酌量办理。
3. 接竟[邓竟生，邓演达之兄，名演存，其女邓京育即邓演达先生嗣女。]兄来信，先后共得学会款全数三万四千元（第一次一万，二次五千元，三次七千，四次一万二千元），谅由立真转交。何以据岳兄来信数目相差如是之远？请详查再告知。
4. 蒲兄或者不久可以恢复自由。
5. 目前的局面无论如何，对于我们工作进行是有益的，请勿焦急。

6. 孙黄回后，想已得相当连络，国内报纸及传说，对于他们有如何感想，请告知。
 7. 付来报纸杂志，均照常收到。
 8. 请到有正书局买中国名画本四五册（以山水人物为主）寄来，送德国友人用。
 9. 已印就的小册子可照来本改正后先行发表。
 10. 请告知章[章伯钧]兄，先后寄伊书籍是否收到？
 11. 笠兄的消息，请继续访寻后告知。
- 余不一一，顺候进步、健康！

[1929年]6月2日

君达：

前星期日复你和岳化的信大概你收到了。据这几天的消息，知道冯不能急战必须缓冲，因此南京方面目前危机可以减少。中国目前虽十二分纷乱杂错，但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历史上必经的路程，故我们判断将来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1. 比较长时期的割据——但南京半壁仍继续资本主义化。2. 全国有一个比较强固的政治机关，使资本主义化的范围扩大而且加深。除此两个可能以外，我看不见有社会主义的可能，所以我始终对目前的直接行动表示消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必把能力浪费在不可能的条件上面。但是当然我们的准备工作要继续进行的。

目前我们所最痛苦的是：一班老朋友的生活困难流离无告。你的家庭负担不知要到什么程度？你哥哥[应为弟弟]现时能不能有收入？老母亲怎样？请你酌量告诉我一下子好吗？我是一个最对家庭及朋友不起的人，我一面以理性自了，一方却仍免不了悬念。立真最近来信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肯甘休，除非我不回国去！在她立场是应该如此的；但是可怜我一个漂荡的人，已不能和旧社会的秩序融合无间，又不能使新社会的秩序和生活相会，结果连累了一切和我发生过关系的人，我真是应该受一切人的责罚！在友谊上

只有你和立三能彻底了解我，原谅我，但是立三现在也不知哪里去了，叫我们，尤其是我怎样想，怎样过？在牢狱中的朋友妻子，也无法可以叫他们得到些微的慰安。听说浚明[孙炳文]的妻子都到上海来了，他们的状况怎样？从前的抚恤费还能够有几分效用吗？他们怎样过活？请你一一地告诉我。

国际方面最近的重要事项有二：

1. 赔款会议已告段落，大约星期三可签字，德国认赔款五十八年，平均每年2,050miliurde即每年二十万马克左右，此会完后莱因河撤兵问题即因之可以告终，因此欧战的余波才算结局。这一举使欧洲及美国的关系更加稳定，使资本主义的秩序更加平复。

2. 英国国会的新选举已告结束，工党新得议席比前届国会是多百余席。保守党损失数十席，自由党及其他损失若干。将来组阁当然为工党。但工党仍未能得到国会的绝对多数。因此它必须拉拢自由党才能执政。因此自由党可以左右政局，同时国会及内阁随时都有动摇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工党此次的大胜是全欧洲所不及料的。它胜利的原因有二：1. 新扩大的女子选举权，女子多数投工党的票；2. 失业问题在前次保守党内阁时期不但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保守党绝对不能解决；因此工人及小资产阶级不满，多投工党的票。这个胜利如果能满执政的期限（国会期四年）则这次工党政权对于世界当然有绝大的影响。

A. 欧洲和平（资本主义的稳定）更多一层保障，因为工党的政策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他们的标语是：民族的谅解和减除军备。

B. 苏联和英国的外交关系会恢复，经济关系更是容易恢复。因此苏联的困难可因此减少，因此世界大战的危机减少（苏联愈困难则危机愈增大）。

C. 英国和美国的竞争（军备和殖民政策）可因此暂时缓和。

D. 印度自治的问题（一年来印度独立与自治问题，因该国民族运动的急剧进行决定了一个议案：一年内要求英国决定允许给印度以“自治殖民地”的权利，这个议案正由英国所派之调查委员会审查，还未决定；但是因工党的执政，会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印度的自治或可加速完成实现。）如果这个问题实现，则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更形加速。那印度和中国问题的关系必更加密切，因此会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上述几种重要关系上面，我们可以估度：在最近的将来，所谓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都是一种空想和幻影。

我前次托你转辛农的信，想已转去，我想他将来和我们一定能共同工作。在现在知识分子中，他算是能了解经济学理的问题的人。可惜他对于政治的实际生活稍为隔膜一点，但是不能十二分苛求的。在这里我正在进行求友的工作；但目前欧洲的留学界内，尤其德国是一个很可悲观的状况。勤学的人固少，能了解而能深造的更少，因为他们在中国缺乏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素养根基，在外国不能得到相同的指导而行前进，同时他们和社会生活隔离，又不能有高度的生活需要压迫，使他们鼓勇前进，求得答解，因此恐怕在最近的将来，还很难有可用的人材合中国的需要。黄埔学生到欧洲来的已一日多过一日，但是一样的犯这个毛病。

松堂[郑太朴，但与6.9信矛盾]有信叫我回，我在友谊上我也应该回来；但是我如果想及我回去无补于事，徒然叫朋友们灰心，或者迟些回去益处多些，所以还不能答应他的要求。

石声很叫人着急，但是盼望还能受一般老朋友的感化。震华近时如何，并盼告知。我这个信内对于内外的分析，请你转给各友看看。我前信托你们查款事，我想一定是立真的弄手法；请你们查实告诉我！松堂向我告穷，如果十分过不去时，请你们二人设法酌量接济他。伯钧[章伯钧]的意志薄弱，自然很可惜。不知他最近有看书吗？问好！

[1929年]6月9日

日昇兄：

第十三号信（5.15）已经收到了。前星期日曾有一长函致你，想已收到。

欧洲政局如上函所述，现英工党已单独组阁，在将来新议会上大约必能得自由党之助得到多数。但以目前纲领推測，保守党必不愿即起与为难，故工党虽不能占议会中绝对多数，而仍可支持也。

赔款会议已结束，德国方面除极右及极左派失望及攻击以外，其余各派无论在任何国家均认为欧洲——甚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条件，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以后再看英国新内阁对世界的影响吧！

国内的状况，无论如何变动，它的路线总是一条：在美国的领导底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所急定的不是政党而是长期的工作。在理论方面，我目前集中一切力量去解决将来经济中的中心问题“市场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如何，可以决定我的最后的政治总纲领。目前我以为无论如何可以和陈启修（辛农）合伙研究及出版书籍。所以我在前日曾经有信托你转交给他的。你已经转给他了吗？请你无论如何和他联络，并叫他马上写信给我！

欧洲学生除一二个勤力作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外，很少有真正勤苦而有相当根底的人，所以将来我们的同伴恐怕还要在日本及本国中去找。这个自然是一个悲剧，是中国的失望景况。

太朴有信叫我不必即刻回来。我想我回来也实在没益处，如同我上信所说的一样，但我一定不久就要结束我在欧洲的工作回国来工作的。

新出版物中有很多很好的材料可以看的，可惜太未有系统。我不知你近来的看书状况怎样？

浚明夫人[孙炳文夫人任锐]近来如何生活？请你告诉我一声！笠慧的孤诣，着实可佩；但是今日的伯夷叔齐已经无目的了！可惜，可痛！或者他们不久会有信给我们的！蒲兄久无音信，近况怎样？瑞桓读书状况怎样？一一请你告知！你家庭的状况，有暇也请述及！我的不眠症时发时止，真未有好办法！我想只有做“驴子”可以治这个病的，你的意思如何。

问你及各友的好！

[1929年]6月23日

日昇兄：

五卅后一日的第十四号信收到了。豹隐[陈豹隐，亦曾在北伐总政治部工作过]兄的通讯处，我同时得到由东琴自日本的来信中知道，我不久要直接写信给他。

接奇兄的来信，知道最近他及她的经过，你还未曾和他见过面？她[宋庆龄]的立场目前是很困难的，我想你目前不必和她见面，因为一方面她不愿意谈话，他方面她也不愿意和外人见面。

关于蒲哥的事，我已经用全力去设法，或者会发生效力罢！可怜他的强毅的精神体魄都要因束缚而发生窘退的现象了！望你对于他及瑞桓的生活费及必需费多多地照料而且供给！瑞桓你最近有看见他吗？有进步没有？来信时提一提罢！

你对于笠兄的行动说了一句“他决不肯临难而去的”，我不明白你所谓“临难”的意思，你以为“失败”是“临难”吗？那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失败一定是要不叫人知道他的形踪呢？而且现在你所谓“不去”是指什么呢？指他所随奉的政治势力还是指他所服务的地方，还是他所确信的主张？那种具体的政治势力已经瓦解了，他即便还想追随，到哪里去追随？服务的地方已经是为别种势力所占领，而且地方决不能为工作对象的全部代表，那他不去那个服务地方有什么意义呢？只有最后的一个“确信主张”是他应该“临难不去”的，但是不去“确信的主张”是无论何时

何地都可以实行的；而且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确信的主张。所以我不了解他目前的心理和你的见地。或者他目前的心理是这样：他和慧凡要做伯夷叔齐。但是可惜现在已无武王了！他主观地相信他的神秘的唯心论及不能具体化的“道学”，而客观的又不能了解及分析中国社会变化的原因，自然更不能推测他的结果，因此抱着极顽固的迷信，弃绝人世去追求他所谓的“道学”，他要和一切相信客观变能律的人隔绝——他认这些人是机械，是无价值的——他深恶痛绝现时的胜利者，他要自身去苦行修练，或者希望得到“究竟”的解决，这恐怕就是他目前的生活目的和内容。他这种孤诣刚强的性格是超人的，是可佩的；但是他的方法和社会的价值是“走不通”和“负号”的，我——当然更是你——站在人对人，朋友对朋友的关系上是十二分的，更因此敬重他，爱慕他，但是站在社会的关系上，应该设法使他理解社会的变化和使他做“人的”生活，不要做“反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要设法和他发生连系的，请你探求吧！最好是叫他和你同住，并且找慧凡一起来。

你对于时局的见解是对的，历史的使命是要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接受这个使命的现时只有南京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南京胜利才有办法。

我前信对于你的批评说“你是受过东方哲学陶冶的”产物，这句话是很抽象的，让我现在把它具体化罢！

落后的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社会只有东方式的哲学才有发展的可能，这个哲学的代表是：1. 孔家。他代表了绅士及当权的人们，要把社会的秩序建立在纯粹的黄金时代（周公时代的传说）的封建关系上面，他的特征是由上而下的，调和妥协的，庸常的。2. 老家。他代表了普遍的农业社会的部落性，他要求消灭一切的政治行为，他要求恢复原始的农村共产社会的状态，他的无政府倾向是很明显的。3. 墨家。他代表了贫农及城市的贫苦市民（手工业者），他要求消灭一切除必要生活限度以外的“奢侈品”，他反

对战争及宫室的设备，他要求人类的博爱——比孔家的家庭的爱更进一步去要求人类平等。他自身的苦行为行动的中心。上述这三种哲学为中国式的——或者说东方式的物征。孔家哲学为当权的人们及盛世的楷模，而老、墨为式微时代特别是在内乱时期的产物，只有法家为中国古代进步的齐秦为商业资本开始的时期，必然地要要求统一的政治组织及严格的国家法令才能使进一步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发展的可能，只有法家的政治理想和方法为和近代的国家组织行动相切近；但是因为中国广大的区域，主要的经济组织是落后停滞在小农的手工业的经济状况，所以结果法家必然要失败（如李斯、商鞅、王安石等），而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徘徊于儒、墨、老的中间，又因为一切支配社会思想的势力为支配的政治经济的势力，所以中国始终为儒家的思想卑鄙庸懦调和妥协的思想所支配，而老墨的思想只为极下层的知识分子，或接收下层社会的要求的知识分子所接收，这就是东方式的哲学的大概及其分野。

你和笠兄及慧凡有很相同的地方是由下层社会出身，至少是了解及受下层社会生活影响的，都是你们的思想源，都有和老墨二派接近的可能，笠兄更有些和法家近，但是他受了耶教的影响，所以他总是蔑视人民的物质要求的。

唯心论和唯物论不过是哲学的名词，在宇宙本体论上面都不能完全解决及决定的，只有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特别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必然地要用唯物论及唯物史观的方法和观点才能通达，所以在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东方和西方生活的差别——由生产状况所发生的差别——似乎可以用唯心去代表东方，唯物去代表西方，因为西方的社会生活从希腊时代起已经是在城市的商业经济时期，人们的崇拜“人性”，崇拜肉体的生活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生活根据，而且有满足这个根据的可能，及后到罗马灭亡后的中古时期虽然为强烈的唯心论所支配，为封建的农业生产状况所支配，而一到新世界的创获以后，商业资本即完全支配

欧洲社会，因此唯物论及肉的生活必然要“复兴”。这个就是“文艺复兴”的意义。

反之，中国社会自周末原始的封建社会崩坏以后，商业资本曾一度的企图因秦始皇的统一而发展，而因种种关系卒不能战胜破碎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的要求，因此法家政治主张随秦代而灭亡，继起的汉代以还，已完全了解统治中国社会的神秘方法为“祀孔”“祭天”“礼义廉耻”等等的把戏，成了道教支配了二千年的中国历史。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人们除了“黄巾”“赤眉”一直到“太平”“三合会”等等，为原始的农民反抗的行动，不能形成抽象的意识（哲学）以外，只有老墨的哲学为一切革命性人们的唯一依据。所以你和笠兄等的意识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甚么唯心唯物的缘故，但是根本在下意识潜伏着的是唯心论，因为人们都否认及不了解实际生活的因果关系，他们已不能了解“物”的原因，必然地要跑到和“物”对立的“心”的原因上去。

我们现在所要说明而必须了解的是解释流行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及其原因的性格，不是解决宇宙问题的一切，因为想解决宇宙的全体问题，依据着一个根源是很危险而容易涉于幻想的了，我觉得不必死死地去追求的。

你现在所需要的还是：第一，了解社会的进化阶段和同这个社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阶段；第二，了解政治力量变移的过程及其原因；第三，特别关于中国问题的解释。上述三种第一种是社会史及经济史，第二种是政治史及政治经济学，第三种是中国历史。我目前的研究还在第二种，希望得到一个相当的段落以后即推到第三种的研究，但是第三种我认为是应用，第一第二种是理论及方法的基础，绝未有不先把基础稳定打好而即行应用的——做上部构造的道理，所以我虽曾经允许了好几次朋友们编绎上述关于中国问题的书而始终不去开始。

国内的报纸传闻关于我的，我以为你不必否认，因为因此引

出许多麻烦，也许会引出许多更大的谣传，我认为不管他是最好的办法。

唉！昇哥！离国二年了，我对于朋友们及社会有什么报答？想起来是很惭愧及催促我更加努力的。松堂兄是我所敬重的人，你的见解是对的，请你多多地和他接近，并了解他的生活。我来信的末段或者可以公开地给各友看。

[1929年]7月28日

目昇兄：

又两星期未接你的来信了！你的病好了些么？抑或有重新发作呢？我非常的担心！请你马上答复我一信吧！

我上星期复若法[丘萼华]及震华的信你大概都看了，今天又复聘兄及朴兄各一封，由御行[黄琪翔]转，内容复震华信，还要清晰些，请你到御兄处索阅。（并须速去，否则恐已转交）我的意思已坚决。九月底英国之行大约可定。明年春初决回日本与你及辛农等同居。请你先准备吧！辛农的复信已收到。我想可以和他共事文化工作和准备的出刊物。若法如果能赴南洋营业极好，因现时我们需要经济准备也。你的家庭生活负担如此轻，可慰！新夫人的状况怎样？请你告诉我一些儿罢！

笠兄究竟在哪里？真叫人急死！假的伯夷叔齐，真是该打呵！蒲兄的事现在还在进行，请不要灰心。埔生[黄埔学生]的信已收到了，但现在还不见踪迹。他们已动身了吗？俞君[俞庸]现在在哪里？他自从写一封批评我的信以后不知踪迹，真是奇怪呀！

请你照前信寄我一张最近的照片罢！问你和你夫人的好！

[1929年]8月11日

君达、若帆：

中东路断后已经两三星期未接你们的来信了！一切报纸等件

也一齐的断绝，真个叫人闷死呵！我寄你们的信都能收到吗？

蒲兄的事，一直到现在还未曾得到确实的答复，恐怕是难得一时办到的了！真是叫蒲兄难受！他最近还和君达兄通信吗？瑞桓的状况怎样？凌明夫人的状况还过得去吗？所有被难的朋友们请你们多多地设法，全权地去办，不要叫他们为难。我决定九月底到英国去，本月底到南德去。但是你们的信还是可以照常地寄到这里来，因为邮局很妥当地可以转到。

候你们的信！问你们的好！

[1928年]8月18日

君达、岳化：

中东路断后到今未接到一报一函，真是叫人闷死！想你们也是未曾接到我的信息。君达本来有点儿病的，两个月来不得到以后的消息，究竟现在身体怎样？蒲仙兄的事已得不到答复，他有和君达通信吗？请你们代我致意他！

我现在已经决定月底离开柏林，先到德国南部去旅行，再到意大利去，九月底可到伦敦。一切当络[陆]续有信来告知。国内局势愈明显地证明资本主义进展的可能而且必要，我们的工作路向更要明显地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面。我现在的研究对于欧洲已告一段落，现在当陆续转到中国问题上去。

我一年前的发愿做太平天国史及明治维新史，到现在还未曾着手，因为中国我觉得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工作时间有重新分配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那两本书及中国近代史，及欧洲、美国、日本的国家组织及其力量基础二书，我必于开始下笔时即行着手编著。你们及各好友的沉闷是必然的。我对各兄的责任未曾尽到更是叫我抱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最近一定可以相当的贡献能力于社会。请各兄不要希望过高过切致失望罢！君达兄的身体如何，岳化兄的南洋计划，均请详细告我！徐后详。敬礼！

[1929年]9月1日

君达兄：

昨日的信谅已收到了。现在蒲哥一封短信请你设法转去。盼望他能因此了解一点我的近状。

瑞桓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但现时哪里去找呢？盼望你能常和他见面，或者将来可以叫他到一个更好的学校来吗？

寄立真的一信也望你转去，我现在对她已由旧社会的嫉恶感情的反动而到了感谢她思念她的田地了！唉！人情可怕！问你的好！

[1929年]9月12日船中 南德考查

君达兄：

在得来士登城复信及沿途寄片谅已收到。我现在正因友人介绍，无偿地乘一拖货小轮由Blyew lury城顺多瑙河而下。此城距海入口处约2500km，大约和重庆到上海的水程相当。由此城以上则不能航行。

五日来的生括已完全仿佛进入中古时代的藩篱里。一切工业的新世界反为叫人忽视。（关于工业及家庭工业的状况，另日当由详细记事述之）因此城与Nuruleng（宁不尔格）城均为中古时代的重要城市。此城为旧日尔曼皇帝驻跸地，旧帝国议会亦在此。宁不尔格则除政治的中心以外，还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特别是冶铁业，一切中古时代的兵器甲盾均多出此城，故特为各封建诸侯所重视）城市。中古时代一切政治权虽由封建诸侯或王室把持，而城市中的商人及手工业者却绝不像中国城市市民的消极。尤其是商人，在中古时代中叶而至于末期（12—15世纪），无时不和封建的统治者争斗，结果各城市均争得市政的管理——因此有市政厅的设置在第十二世纪已开始；争得货币的发行权；争得市场的管理权以及一切所谓“市民的权柄”。拥护此种权柄大都是由市民自己组织“市民军”武装地去保持他的政权，故封建诸侯无

法强制。

其次，罗马被日耳曼蛮族灭亡以后，日耳曼自己各族也开始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会当时实为一切精诚的物质的文明的中心，一切教育、艺术、科学、农工商业的技术，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经验都集中在教会，集中在教会中的传道者，因此不但封建诸侯及市民被其影响领导，而且往往教会的“教区”兼领一切政治的统治权柄。这就是欧洲社会受宗教影响之深的原因。这种状况在德国南部为显著的事实，至今仍存在，我在此城及其他南部各城看见了终日无数善男善女——即一切壮年的工人和学生亦然——在礼拜堂内祈祷、跪拜虔诚过于我们的乡下，即一切小孩亦不须长者的领导，自行出入礼拜，无稍逾越常规。日常见面的问候，已不称“早安”“午安”“晚安”等，而称曰“敬礼上帝”，城市如此，乡下更可知。整个的南德天主教范围内可以说还多数保持着中古的遗教，故研究欧洲古代史不可不到希腊罗马，而研究中古史则不能不到南德各邦——尤其是Baylun（摆恩邦）。

欧洲中古时代的宗教为全社会的指导者已如上述，故非待至近代（由美洲发现开始）商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明，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觉悟地去指导新的社会，则中古时代的宗教关系及政权尚无由打破。

南德今日所以还能保持中古时代的宗教权威，实由于大地主经济之普遍的存在。德国目前的人口约40%在乡村为农，60%在城市为各种职业。而大农的组织（往往每地主占地数百千顷以上）在东普鲁士及摆恩为最多，故宗教的信仰亦以此地等为最固。此外因工业商业在此等地比较的落后的缘故，一切学校及文化机关都掌握在教会手上，如在此Byaun lury小城人口不过八九万，而学校教育，不但属于宗教的圣经及宗教历史等由传教师或男女和尚尼姑教授，即其他各课亦甚多由教会包办。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生活已主要地掌握在宗教手上，则宗教之支配社会生活是无足怪也。（摆恩十之八九人口是天主教徒）

我们在此可以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宗教生活。固然中国的“孔教”是否可以叫做宗教还是要争论的问题，然其束缚人心规范社会生活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因为：1. 孔子的学说因和实际生活的要求脱离，故与广大的生产民众——农民、手工业者——无密切的关系，所得保存的只有和拜物教相伴的迷信：祖宗、鬼神，生殖崇拜。2. 因文字的限制使广大民众无从认识比较组合的抽象的生活描写或传述。3. 因统治者的惨酷而禁锢人民的活动，用愚民政策。合此三者使中国的广大民众始终生活在极原始的阶段，无由发生更深切的生活要求与生活理想。一切文化制度典章除极少数的“书香家”以外无人了解。其了解上述各事的“学者”，又都从事于传统的腐朽的官吏生活，专门以剥削人民为事，故和广大的民众的要求，不但不能相应而且为广大的民众厌恶。故大概地说：中国人民从来未受过欧洲式的宗教教育和生活风味。他们所领受的不是孔教而是宗法社会的祖先崇拜和其他的自然偶像崇拜。他们唯一从孔教领受的是剥削，和人道的永远屏弃。拿这种宗教生活和欧洲比较，自然宗教的作用更低更应受现代社会的反击。

由中古以至近代，欧洲统治者和中国统治者的特殊点最显著的是：欧洲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生产者发生密切的关系，能了解且竭力提倡生产者，在当时自然是农业及手工业为重；中国的传统者除少数形式的规定以外——如“天子先农，皇后亲蚕”之类——大多数只有纯粹的做寄生剥削的生活，对于生产的行程完全懵然，更不要说他们完全和生产无关了。

欧洲中古及近代统治者对于生产的注意，不但在经济史上可以窥见，即在艺术、文学、诗歌上面亦可以有显著的事实可寻。我在宁不尔格的时候，参观了两个“圣人”的住宅，一为画家，手工业者出身；一为民众诗家，鞋匠出身，二者皆终其世于手工业，为十六世纪的举世所尊仰，封建诸侯亦皆下拜，至今德国奉为“圣人”，这不过是一例。英法在近代对于世界的贡献甚多，而对

于生产社会的密切联系，为其贡献的先决条件之一。

民众生活方面，在今日可以说，欧洲——尤其英、德、法三国，已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个人”迷信、“身份”迷信的观念已经打除；国民收入逐渐向水平的路线前进。固然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底下富者愈富，而贫者却不一定愈贫。其阶级差别对内是日见剧烈，而其最贫者的生活比之中国目前中等人家有时尚有过之。我试举一例：在德国最著名贫困的劳苦的家庭工业工人，我五日前曾参观过，因个人的关系，绝不受任何束缚及迷信，直到山中村内的最贫苦人家由地窖到楼顶由睡的食的穿的到夫妇的细微生活我都一一看过。我现在叙述他们的生活状况：

职业：家庭工业（德国最贫苦的职业）

家庭人数：夫妇、小孩二，（小孩尚幼不能做工）

收入：男工平均每小时收入大洋四角

女工平均每小时收入大洋二角半

因夏季生意较淡，冬季较旺，故平均夫妇二口的共同收入约每月大洋五十元（100马克）

支出：所得税、营业税、职业税、疾病保险费等，合计每年约二十元，每月平均约二元；房租：每月平均约五元；燃料：每月平均约二元；食粮：（成人二，小孩二）每月平均约三十五元；衣服、娱乐：每月平均约六元。共计五十元。

但在此村内因人口的变动很少，所有新生的剩余人口都向外城移动另寻职业，故多数人家尚能由遗产得到私用住屋，仅少数人须租屋居住。其住所大都是一大厅、一卧房、一衣柜亭、一厨房。大油木床二，另小孩床，被褥等整洁与城市人家同，均羽毛绒被盖，衬衣每人至少十份，外衣大都有礼拜日衣服和节日用衣服及工作或平常穿着用衣服的分别。每日早点用咖啡、牛奶、牛油及面包，午餐多食肉及面包及山芋（为德国最多用食品），午后

咖啡点心，晚餐多冷食，即香肠小面包及茶。其滋养之富，恐为中国中等以上人家所仅及。

如果小孩已大，普通由八九岁起除上课的时间，多帮助父母做工。(教育状况另详) 其已由职业学校完毕的学徒，除多余人口必须离父母到他处另谋生活外，在此村多居留父母家帮同工作。儿女的工作，父母(普通是父母管账)按定价给值。价值照现时规定约为每小时男子三角一四角，女子二角一三角五。男女工值所得普通每礼拜付给父母(8—10马克)四一五元，为食住报酬。其余则工作的男女自给自足，父母不管。此种家庭的资本主义化表面是残酷不仁，狠刻的算账生活，但比之“东方文明”的“仁爱”，或者更仁爱些，因为结果是要强迫大家做工，大家才有饭吃。

由上述的生活叙述，可以知一家的大概。其次我再说此村的普遍的共同生活：

该村在山顶，人口共约一千三百，共住屋约三百家。有国民学校一，容四百学童，职业学校一，容一百人。照向章及规章，德国已彻底的实行强迫的无偿的义务教育。由6—14岁入国民学校。14—16岁入职业学校。故现时无论男女，至少应受义务教育十年。在城市中尚多一年。其有可造而家庭又能供给的自然可由此上进入高等学校再入大学，但此村仅有二三人由此经历，多数人职业学校学习必要的手工业为毕生的自立根基。我曾入参观其职业学校，一切设备及教材与学生程度，恐大多数中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不能与之比也！

娱乐所除咖啡馆饭馆二间外，有电影院一，跳舞场一，礼拜堂一。

交通与山麓火车站通，有无轨电车。

由此你可以知“贫苦”乡村的生活状况。

其次再举例去考查此外的人民生活：

普通纺织工人收入 男70—100元

女50—70元

机器工人收入	男（无女工）	120—160元
泥水（或木匠）工人收入	男（无女工）	160—200元
		（现时工价比任何职业高）
商店职员	男	130—180元
	女	50—80元
小学教员（不分男女）		120—200元
轮船水手		85—100元
烧火夫		100—120元
家庭女佣人（管食、住）		15—30元
女厨房（管食、住）		50—60元
打字女工		80—160元
由大学出身的专门家初数年薪水约		70—100元
大学教授		约800—1200元
公司管理大版		约800—1200元
中央及地方		
政府总长部长		约800—1200元
中等官吏文官科长		约350—500元
武官校官		
		（是为大学出身的工作处）

这个就是不论北部及南部德国普通收入的状况。其支出大抵住城市的都要付房租。未结婚的每月有二十到四十元的房租已非常舒服。已结婚的大约从四十元起码，亦已算中等以上的生活。

我们拿这个来对照中国人民的生活，真是无法比较。我们如果粗略一点说：因为现时全世界的工业品价格，除了很少数实行保护国税的国家以外，差不多各国都相同的。农业品的价格因为南北美农业十二分发达的缘故，中国的农业品只有平均比美国更贵，不会更平。因此我们平均每个工人收入约十元一十五元，每个农民收入约二元一四元的生活，真是在地狱的生活了！

这种地狱生活是否应该保持，是否能够保持，是否可以改

造，就是目前我们的问题。

我现在再简单地来总括我写这封信的意见：

1. 欧洲宗教的生活，他的作用还未曾完全消失。
 2. 德国北部和南部的社会生活的差别就是工商业和农业生活的反映。
 3. 中国无欧洲式的宗教生活训练。
 4. 欧洲人民生活的标准线比中国的高5—10倍以上。
- 我连日都是参观和谈话，因各处朋友的介绍，所以到处都能得到机会，向他们的社会内部详细地去检查。今早天未明即附一小拖轮（拖货船四大艘，向奥国运输的）顺多瑙河下行，约今晚七时左右到河岸一大城Passau（巴骚）的地方，这地方为德奥两国的交界。打算明晚即离开Passau到南部大城Munchun（门禅）去。
其余再详。我约月底离德国经法国到英国去。又及。

[1929年]9月14日

焕明、恺青[黄埔学生]二兄：

你们署名的信，我早已收到了。因为你们信上说的要来欧洲看我，所以我一直等你们。一月一月地过去，你们总不来，正在奇怪，现在接到友人的信，才知道你们在国内急等着我的信，真是罪过！

我近来的思想，看我最近的小文便知。我的主张是：目前还未到直接行动的时期。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说，似乎非经过资本主义的“清扫”，封建社会的遗朽不会肃清的；而目前的政府似乎可以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暂时作思想上的斗争工作，徐徐地图以经济的斗争作群众的斗争日常工作。如果无广大的群众组织的斗争，那即便有一时的军事胜利，结果一定被军队拍卖，决不会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

同学的任务是：一面在思想及纲领上作系统的宣传，以团结一般进步的分子；同时更准备着将来的行动。只有积极的实际在

军队中，党部中，公共机关中，以及在学会中作模范的刻苦的工作，才能叫同学的后起的相信，才能吸收进步的同学，才能担负社会改进的责任。更须提防一般不满意于职位的人们，借着政治的口号作求个人出路的利器。

同学们曾经在革命的历史上占了一页很光荣的篇幅，只须得到很好的思想的纲领的领导，才能严密组织及肃清不肖分子。在这个工作上，我愿意帮助你们去做。

我并非立意自起炉灶，我只有感觉着中国的空虚而变幻无常，我因为要立定脚根作社会运动的一个法定形式，所以不能今日骂人而明日复联人；今日联人，而明日复倒人。但是如果行动上能证明是革命的、纲领的，我个人时时准备着合同一致。

同同学们的好！

[1929年]10月14日夜于伦敦

君达、岳化、松堂：

沿途寄你们许多的片子都收到了么？我已于十一日晚由巴黎来到资本主义领袖的祖国了！护照的检查及来历的盘问，十二分严密，结果因为我的护照已经设法换去，故能得到居留二个月的允许，我现时住在一个很僻静的地区，但是房租一般的比较柏林贵，因为相识较少，应酬减少，或者可以多用功少花钱罢！

你们来的信，我已经先后收到了。因为初到这里的关係，一切还待收拾，故匆匆先报告你们的新地址，复信待后来办。我现在请你们办的：

1. 松[松堂]兄因困难应该接济，由你们大家设法定规。
2. 浚明夫人应该接济，瑞桓及其母如果必要时也要接济。
3. 君达兄暂时不能远离，待我以后的消息。
4. 申报已多时未寄来，请设法嘱续寄。（照伦敦新住址）
5. 望将最近的印刷物（杂志）寄来。
6. 以后来电可用waltee的码字，可省时省费。

7. 我寄你们的电由waltee转，想收到。

时局正在大转移，但一切的前途不会因此转变。不过我们恐怕要提前工作就是。问你们的好！

我现在的住址

Mr. c. s. Dang, c/o mrs · Gribting

45, Ja Zoath Road

London w. 14

[1929年]10月17日

日昇兄：

前日托寄冠[郭冠杰]兄等函想已收到，兹特将起草前之详函复聘兄，请收到后即与学兄共阅，阅后即交聘兄。聘兄目前思想及行动，并盼告知也。收到后务请即复一函，以慰远念！沪报□止已久，望续订，并照新址所书唐策成收即可。书店事应与学[邱学训]兄共同负责经营，经费俟筹到即照拨。并望以小规模办法经营之。余续详，顺候安好！

[1929年]10月24日

君达兄：

9月14日复你第十八号信，及到伦敦后复你一长信，谅你已先后收到。我现在已经陆续地把柏林转来的邮件整理，再从你的第十七号信上系统地复知你。

1. 你已经重新结着果子，很为你贺！但将来的负担当然是加重了！但是至少因此可以叫你的亲爱的母亲欢喜，这个也恐怕是你减少你对家庭负担的一法。请你别以为负累，还有好处呢。

2. 健青、煥明的复信，你已转交他们了没有？大概他们能因此更了解我的决心罢？对于埔校的同学我当然未曾尽过分毛的责任，十二分惭愧。好在大家都是努力将来的时期，如果真是决心为社会服务的，将来一定可以结合起来的。我对于黄埔同学会宣

言，已经看过，他们只着眼在政治的表面问题而缺乏纲领的认识——这当然是我们未加领导的过错——故只有对于个人的攻击为多。这是为所谓左派的通病。现时我们应当设法找出他们真实能负责任的同志，和他们往来，将来预备和他们相见。俞[俞庸]君的毛病，你我均所深知。他的赞成与反对，都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决心。不过他已不愿投降，已可以看出他还有好处。我们当然还要设法医正他，补助他。不过，他仍然不是负责任的人的。

3. 奋飞[吴奋飞，北伐失败后任张发奎的副官长，1928年1929年任徐州镇守使]及静华[孙侠夫]我虽不甚知其人，你已经深知他们，自然是我们的好友，望你多多地和他们连络，并准备照下述我们的眼前准备工作里去准备。

4. 浩明夫人大概明年正二月间能有机会到日本教学。中小学及女校的教员她必然可以胜任的。请你通知她并叫她照下列事准备。

5. 若法行动附另函。

6. 张胜荣为人甚聪明，但可惜无固定的信仰与人生的标准，不过我们正在需要人做事，应该时时和他连络并尽力在人事上援助他。

7. 朴兄有信来诉失恋痛苦，想你已知道一部分，我已去信请他不必再行依恋。他现在必不能而且不必来欧洲。他一定要和你一齐到日本。

8. 你读书的计划及所选材料很适当，请你继续用功下去，不过关于历史的叙述要多看。

9. 第七批刊物未到。报纸亦已一个多月未到，想系德国邮局只转信件不转印刷物的缘故。请你即设法代定申报及天津益世报国闻周报来。定三个月一次即可。

住址写：Mr. C. S. Dang

45. Ja Zoarth Road London W14.

君达兄：现在和你谈我们的工作进行计划及步骤。

我们的目的是：由文化工作到社会运动到政权的夺取。

我们的手段是：第一步吸收进步的穷苦的青年子弟。联络海外华侨进步分子，占领海外的华侨书报社及教育机关，及出版刊物，集中干部人材，训练干部人材。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以一部留上海，作联络及维持国内组织用，以大部准备到日本。日本的生活资料得到主要在作教员，目前日本中小学教员及最近将来的南洋各殖民地教员，我们可占领的很多。日本方面大约十二月底决定可介绍的数目。

震华（已详另信） 浚明夫人 静华

大概奇兄不日可先行到日本去，你和松堂应预明年夏间再行。我大约夏间可以到目的地。蒲兄的解脱想非政局大变时不能为力。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他不至于再比三年还要多受。待我们在他出来之后赔罪罢！瑞桓如果真被家里困住，当然很可惜。不过蒲兄的夫人恐怕不能离开他家里。我们想帮助她不能用新法的！还是顺从她们乡中的习惯罢！我们能把瑞桓拖出来算好的——只要他能出来，我们可设法带他出国去。蒲兄自然是很痛苦的！望你常常乘机和他通信，但是不要多通信反为妨害了他的“自由”！

笠、凡两兄，在原则上自然很能得到他们再出；但是在实行上，恐怕他们将来不但不会弃我们，而且必然是会和我们一块的。我们且叫他们多修道几年吧！我们只有在工作上去赎罪呵！

我到这里已经两星期，明年开始学习英文的工作，大约三个月内，一定可以看书。六个月内，或者说话可以明白。只要把文及话弄通了，就不必回到东方去。那也候着见面的朋友不少，想着实在十二分的欢喜。豹隐时时有信来，他将来定可为我们的工作朋友。李达[即夫人为王会悟的李达]及存统[施存统]我以为还是有希望的。请你有机会和他们往来一下！我最近有信复聘三兄，系由松堂转交，因为信上说的很坚决，所以松堂不敢交，把它压起来。我以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有路线，不过聘兄的焦劳穷苦

我是十二分钦佩的，必要时请你援助他，当然是量力而已。

庆姊等重来，谅日间可以在巴黎相见，我们只希望她能原则上的积极，并不必强她怎样具体地去出力工作。她是中国革命的表征，我们应当尊重她。

改组派的官运可惜并不十分亨通。如果南京不因此倒台，我们固然是无十二分大利害，而改组派的声息或可以保存若干时日。

只要南京一倒，改组派寿命就要告终，因为做官的目的已经达到。

附寄给他们的信，请你分别看后转交，问你的好！祝你进步！

你回家后的感想如何？乡农的生活如何？请告我！

[1929年]

君达、岳化、震华及各兄：

一礼拜以前寄你们的思想已先后收到了。

你们的来信也都先后由柏林转到。君达兄第二十四号直寄来这里的信也收到了。

我现在虽然还未曾见到宋君，但我相信我这篇宣言有传观各同志及相机发表的必要，使关心时局的人得到我的意思。

我现在先把草稿录来，先抄转各同志，然后待下次的信——如果宋已同意——再公开地发表。你们看这篇宣言，也可以知道我们对时局的态度和陈公博辈的态度。

我的决心已详前函，不赘。

托你们准备之件，望照常进行。

笠兄望和他联络，蒲兄的家事望尽可能照料。浚明夫人的赴日以前的生活，望照前函办理。

问你们的好！

[1929年]11月9日早

君达、岳化二兄：

今日在匆忙中先托三事于你们，详函待明日复：

1. 请寄中国注音字母教科用本子及一国音的注音字母典来（最好有英文合编的），教一德国朋友用。
2. 即搜集昆仑、乐群、南□书店出版书目来，及定申报寄（报纸已一个多月未到）。
3. 即寄电汇壹仟元（如前函所述）。

我现在已搬到下述地点，以后寄信请照写。

Mr. C. S. Dang

c/o mrs. Slough

152 meadowle Rd.

Ealing W.S.

London

[1929年]11月18日

君达、岳化、震华：

十一月十一日匆匆寄你们的信，因时间关系未能列号，只用特别挂号快信寄你们，想你们已收到了。现在再详细复你们的信。

君达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号信，岳化第十二、十三号信，震华九月二十四号的信都先后由柏林转到或在此收到。

关于时局上的见解你们自己现在当能更明白些，如果看了我那篇宣言以后。

中国革命系一个长时期的事业，绝不能希望短时间内一蹴成功。我们自然并不因此放弃了革命的工作，我们自要看准了这件事去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患得患失非革命党人所应做的事，故我要再明白的声明：我们对于任何派别的区别在：第一原则上的不同，第二在手段上的差别。我们如果不能认清原则和手段的不同，则我们自己已经抛弃了立场，绝不能继续做工。我盼望大家

详细的考查。

我对于汪先生从无私怨，对于党中的一般老先生们更是敬重。但我相信中国革命如果已转入一个长时期奋斗的阶段，则过去的“招牌”主义和“空喊口号”的盲动主义，都用不着，也走不通。所以我盼望大家实事求是，照着可以做的应该做的事去做。叫我们去盲从政客式的陈公博式的领导——实际现在所谓改组派只有他是积极的——实在只有跳海。我们知道，他除了拉拢军人及失意的政客，做骆宾王式的讨蒋檄以外，他还想到做什么？革命评论的时代只是一时无出路青年的出路。却是不久信仰他们的青年们一定要失望。改组派的“胜利”（？）时期愈快，则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时间愈快到矣。不过侥幸他们现在还未曾把南京——其实他们只想取蒋而代，并未设想推翻南京——推翻，他们的面目还未大白于天下罢了。但是我们虽然不相信他们的领导。我们却不要因此屏弃了一般青年。我们只有盼望青年们将来在事实上得到证明，去求得一个真确的道路。

现在我再具体答复你们的来信如下：

1. 岳兄不能作赴南洋计划，已详前信，望你们现在一齐准备日文。一切工作，照常去做，不必过于张皇。
2. 书店的股份，能很自然的得回股本是最好的事。因为在最近的期间，恐怕需要款用了。我复埔校二代表的信，已在柏林发出了，何以君达兄最近的来信，还未曾提及收到与否？我总盼望埔校的革命的同学能有一个真正的好组织出来，替青年军人留一点历史的生机。不知道他们的进行怎样？
3. 瑞桓[侯连瀛子]应设法叫他继续读书，不好因为家庭的牵制便荒废了学业！
4. 笠兄应和他连络，将来设法找他到日本去。

此外请你们都寄我一张最近的照片。君达兄和小孩的照片，我收到后十二分的欢喜。

我现时的用功时间，一半英文，一半其他。三个月后大约看

书不成大问题。盼望和你们见面时，英语亦可过得去。

你们和松堂兄的生活费自然应由团体设法帮助，请君达兄岳化兄照从前的标准办理！

问你们的好、进步！

[1929年]

君达、岳化、震华：

十一月十八日寄你们的第二号信想已收到。

君达第二十五号信，岳化第十四号信，震华十月十四日信均收到了。除已另复震华外，兹更复你们的信。

我的宣言底稿只系指出对南京及改组派的态度，对于纲领上面很少周全。但我决定六号坐飞机到柏林去和宋见面，去决定大体的实际办法。待见面后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宋有信来，说及她到巴黎时，汪屡次派人找她，要和她接头，但她坚决地拒绝。她对改组派和南京的态度根本上和我一致。汪现在还在巴黎，我看他不敢立时回去的。

中国局面，快要到“否极泰来”的时候，我们只要准备得周全，则必然可以满足人望。所以目前的活动不必十二分挂念的。

蒋不倒，则改组派或者还有些说话余地，蒋倒后则改组派的政治信用立时丧失。你们且看罢！

黄埔学生我们当然要和他们连络，立三的出与不出，只系时间的问题。我很[想?]君达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但是无论如何要叫他了解，反蒋不是政治口号，也不是伦理问题。他现在恐怕在桂系势力重新起来的时候，又被人家拉到南方去。我们要尽我们的忠告力量。

恺青、煥明的信转交后，他们的感想如何？公开时期及方法，待我和宋商量后再定。余俟到柏林后谈，以后来信住址详震华信中，不赘。（在柏林至多留一星期并及）松堂及黄兄我已屡有详信给他们。请放心！问你们的好！

[1929年]12月22日

君达、岳化：

我给御兄的电报，想你们都已收悉，我的消息今日已详寄给他，请你们——也只有你们二人和他和松堂知，旁人并不能知的！——到御兄处打听一下。

君达兄现时又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景况，好笑又是可敬！

蒲姊的信已收到了[与1928年12月28日31日久不得候连瀛信息矛盾，似应在1929年。]，她的确是一个健者！

我想及不久的情景，我十二分的欢喜，想你们也有同情罢！问你们的好！

[1930年]

诚庵兄：

陆续寄你的信，想已收到。二十一日晚接到你们的电汇百镑，故已决明日午离此赴巴尔干，行程如下：

到达及离去日期		站 名	留驻目的
日期 到	离		
一月二十五	一月二十八	<i>Paro</i>	附近农业状况
二十八	一月三十	<i>Lyvn</i>	附近农业状况
一月三十	二月一日	<i>Milan</i>	法西士特的组织
二月一日	二月三日	<i>Rome(罗马)</i>	法西士特的组织
二月九日	二月十一	<i>Belgnad</i>	农业及手工业
月 日	候 重 夺	<i>Sofia</i> 保加利亚首都	一般的巴尔干社会组织及农业手工业

如果护照不发生障碍，则尚拟到土耳其及印度一行，然后照前信办理。

我这次到苏格兰及北部英伦旅行，所得不少，惜不能立刻把结果告诉你们，留待以后详谈罢！

你们的日文学成到什么程度？一切的人们大约已十二分心烦，望忍耐些时罢！

奇兄处两电未得复，甚念，见面时望再告知一切。

你接信后可立刻照下列住址继续来信告我：（保加利亚）

Mr. Dang

*90 mr. Dr, Zlorboff
marin Drinoff str. 19
Sofia, Bulgaria*

nasibevia

附寄石生信，请转交。向你们好！

[1930年]2月2日

岳化兄：

我寄你们的长信及问题，想你们已收到，并且解答。二十二日收到款后即于二十六日照计划行。在巴黎参观了两个农家及企业，昨日来到这里，打算找些经济——尤其是工人生活的统计，大约明日一日可办妥，即行。

前后两次请你购买注音字母字典，最好是兼有英文的，及注音字母教本，想已收到那个信件，不知道已经寄去了吗？

现在巴黎的友人潘君需要如下所述的书甚急，请你照来书目的红圈圈定者设法即行买就寄潘君。他的住址如下：

Mr. Poon,

*Chef mr. stevins,
39. Quai devalony,
Paris 10e*

我大约一个礼拜内可到罗马。那边有一个国际农业研究院，可以盼望得到许多农业及农民问题的材料。

Sofia(索非亚)保加利亚都城 3月2日

诚庵、若法二兄：

诚兄三十一、三十二，二信及附剪报，若法兄第十七号信，已由伦敦转到。

我到保来已逾十日，一切城市及农村中的生活都先后经过。我所得的结果，恐怕为到欧洲以来最好的。详细处只能以后发表。我相信保加利亚是中国将来最好的模范，尤其是关于农民问题方面。我相信中国的青年学生——自然是决心为人民奋斗的青年学生——应该到这里来求学，绝不应该到西欧去。

我的行程已历次由明信片报告想已收到。请若法兄即准备到香港西环取信，详细处附另纸开列的住址。预计若法兄至迟应于四月初即行到去取信，不必候我的电报。我的旅费因人事往来的关系每日约费一镑左右。故携带款项百二十镑，除三等车船费外已所余无几。或者我在Angora(土耳其)或Karachi(印度)要再电请你们再汇五十余镑来未定。请你们候明电再办。

中国的局势决不会因多少的曲折而变其路向，大家只要团结，最近一定有办法，不要着急。我的旅程已不照原定办法，想你们读这封可以料到，目的在看新土耳其及印度，不然很可惜了这个机会。并不会因此延误了很多的事。附寄明片为这里一般生活缩影。详细候以后再谈。问好！

3月12日

Angora (安卡拉都城)

诚庵兄：

在保加利亚寄信想已收到。到安哥拉后收到由伦敦转来的一月二十五号所发的第二号信。第一号信则并未收到，十二分地悬念。我正待到印度后，看有信转去未有再说。

胡兰畦到柏林后，曾有一封信来问我有意思，我已复信嘱她先发表意见再说，并劝她到巴尔干去求学。想不日她可以有复信给我，她不知道我有印度的行程。

俞君的信已收到，他是一个浪漫的情感的人，他可以随附而不能单独负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沪上朋友们的胡来，现时只有暂且忍耐，待我们见面时再说罢！

我到这个土耳其的新都已经足足七日，决定明日午乘车赴小亚细亚的莫索不达尼亚平原的世界最古文明发源地，到巴格达去，大约行程总要一星期左右。

这里的景象十二分的新颖发皇，千二百万人口的新土耳其，现时居然有一万三千的新式国民学校教员，五十万小学生，并其他中学、高等大学的相当学生数量，只此一项已经可以证明土耳其文化的程度高过中国多少倍了。

政治的组织完全扫清了旧时土耳其时代的官僚政治，仿模欧洲式的民主政治，当然现时还是初段。经济的设施，现时正在打算建设民族的工业，并且大部分的日用品由本国制造。社会的分化现时正在猛烈地进行。一切政府的职员大部分是由旧都君士坦丁堡教育出来的。进步的军人多占政治的领导地位。但是无论如何，现时土耳其的政府是站在商人的地位为主，而意识是代表“全民族”的。无论何部的职员及社会机关都能了解他们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经济的组织和将来设排，这一点与中国士大夫——或称知识分子——垄断政权，完全与生产的社会脱离者，相去真不止天地。记得胡汉民回国后发表他在土耳其所得的感想是：“政府和人民一致，人民拥护政府，所以土耳其革命成功”。这个不过是皮表的话。其实，土耳其的任何政治领导者及普通的社会成员都能了解近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这点为新土耳其造成的背影。这种力量，又是因为接近欧洲的缘故才能得到的。现时在经济上说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说是城市的群众开始觉悟去参与政权。在社会上说是产生新的工业商业及其他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新职业。总起来说，土耳其现在是正在经过欧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行程。这个行程，究竟可以去到如

何程度，现时还不能判断。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在五六年内，或者会碰见一大困难——农民问题，因为现时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差得太远。一切的税项负担农民也不在小。不过因为土耳其的农民主要的为自耕的小农，故问题来时或者不至于十二分的急剧罢了！

六万人的旧城安哥拉，实际不过和一个欧洲的一个小乡村设备相等，现时已增至十万人左右，旧城已分别拆除，另在南东北之线建立新城，已绝然为欧洲最新式的设排，五年之间进步很快。或者十年之后，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繁华了！

欧洲人在这里服务的不止高级顾问及专门学术人员，而且有很多的熟练工人——如建筑、机器工程等——及奢侈的消费职业者——如跳舞女、家庭用女仆之类——这个就可以表明现实的社会生活正在十二分欧化。

我在这七日中因介绍人的周转，费了很多的空忙。一直从四日以来才说得上正式工作。和农业、商业、教育部均谈过很多次的话，并且从统计局得到很新的材料，现正在打算参观农村。我以一个大学生资格来游，一切的方便都能得到，可谓侥幸。生活费这里十二分的费，旅费每日六马克（约中国四元），饭则较平宜。生活费与战前约高一倍，而这里的生活又比君士坦丁堡贵约 $\frac{1}{3}$ 。一般政府职员（与科员相当的）每月约得薪俸二百四十马克，约合中国现时一百九十二元？国民学校的教员为七十一百马克，约合中国五十六至八十元。但生活费的支出每家房租每月约十六元，饭每人每月至少二十元。可见生活之高。

沿途用德文及一部分英文尚可通行无阻。由此东去，则英文为通行的唯一工具。盼望不致发生困难。

离伦敦计已四十五日，相见总不在远了，余详若法兄信。不一一。不日你或者会接到我由Karachi(印度西方海港)致你们的电，因为我现时的旅费已经快完了。接电时请即电汇五十镑到电文的住址。我现在把由安哥拉到印度的行程图画如后：（沿途所经，

大都为亚力山大王东征波斯及印度时的路程),余后详并问进步!

[1930年]3月20日午后

诚庵兄:

自Adana(亚达那)寄的片子,大约比这封信及片早到一些罢!由Adana出发,后行约千五百里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最北部已为巴格达铁路的现时终点。故须换汽车南行,沿Qigris河(提格里斯河)而南,中间在Mossul(美索尔)歇一夜,因旅馆为美国铁路公司所包办,故取费之昂为欧洲国中所绝无仅有:一夜及四餐取费二英镑!昨日由美索尔继续乘汽车南行至Kenk-uk换英国代管区伊拉克国有铁路南行,今早五时到此。计由巴格达铁路终点起至此已复南行了一千五百里。现时的天气已入热带的了!干燥、孤寂、历史上的兴亡追索,为旅行中的唯一伴侣!此地区为欧洲及西部亚细亚文明的起源区域,到现在的发掘考古工作到处还进行着,今晚赶车到巴比伦古迹地方去,使不放过这一瞬的吊古工夫!但是废墟和现时被帝国主义统治中的半游牧民族只有叫人更加兴奋的往前工作,不会有好感的!一切生活已比欧洲贵十倍以上,这就可以推想,所谓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中间的差别究竟如何了?预计六月以后到印度西岸的Karachi埠。余详致香港转若法的信中。同好!

并问各兄弟姊妹的好!

[1930年]3月21日

诚庵兄:

十三日离安哥(卡)拉,因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格达铁路每星期只开两次,故须二日后始能接驶。特利用此二日工夫在小亚细亚内部所经城市停留。

十四日到Konia(哥尼亞),为十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土耳其的第一期统治者的都城。当时的王公贵族多到东罗马的都城君士

坦丁学习，故一切科学艺术均受感染。回教寺的建筑在此时期 Konia 的有希腊的罗马的塑像。土耳其的纯粹文化，恐怕是他的浴堂，摩罕默德所付给他的信徒的，不但是统一的争斗的可兰经，且是美洁生活习惯：地毯铺地、沐浴、入教堂前的洗涤，每年的定期免食，星期五的整日休息，拔去无用而易藏污秽的毛发（如两肋及生殖器的部分），白洁的衬衣，甚至死后的洗涤及拔毛用白洁布包裹尸首，还是十二分重要。送葬的隆重，为其他民族及教徒所罕见；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是集体的并合生存的社会团体的一种要求，即是，一村中，或一市街中，有一同信者（同志）死亡，全村及全市街的信徒都完全集合起来去送葬，并且绝不雇用流氓乞丐孝子（在中国各都市或乡村中，对于送葬的仪式大部分是雇用上述的一辈人，并且在广州有雇用孝子哭灵的笑话。）而是轮流地由送葬的人抬扛，直到葬地。我曾参观几个很小的乡村，他们的生活虽然十二分的简陋，而有几个特征可以表现回教民族，特别是在土耳其的回教民族的富于争斗团结而容易生存于近代的优长：信仰的统一，音乐的好尚，身体的健康，虔诚的信徒，每日到教堂五次祈祷，即在工作田野中亦按时向圣地麦加拜祷不间，并不需偶像与牲品，比起中国乡村及城市中的多头的拜物教自然进步；甚至比东罗马的圣像及仪式崇拜还要高明。在每次祈祷的时间不但由教师（特别是礼拜五的休息日祈祷）宣读讲解可兰经的遗教——遗教中多是切合于社会生活的规条，而不是像四书五经的只替“冠带之士”说法的！——而是唱歌及奏乐，这点虽然与犹太教及耶教无殊，而是最主要的一部。中国社会的僵化，大半是因为孔教的窒塞人欲。国家的孔庙已因为特殊的士大夫所独占，人民高不能攀，平常的人民的娱乐，特别是打花鼓，十八摩等的通俗戏曲和音乐，又被礼教的先生们禁止，斥为淫乱，伤风败俗。故特殊的绅士先生们可以蓄妾营高贵的生活，而大多数的人民不是流于变态性欲就枯槁待死；一切由战国及秦代所盛行的音乐、文学，特别是村谣民歌，都被礼教所

镇压埋没。象形文字已为统治者所提倡，金石家的士大夫所心折，大多数的人民被经济的力量所束缚，只有永远的做“书盲”，被文化弃掉！拿这种状况来和回教民族相比，真是相隔天壤。不但音乐可使生活美化，而且叫身体健康。百分之八九十身体残破不完、神经衰弱的中国人民，固然是由于经济的环境束缚限制着衣食不足使然；但是礼教先生们的惩忿窒欲的克己学说及枯槁的生活方式应该负大部的责任。土耳其回教民族身体的健康，很明白的是一方面困难游牧的时期不久，一方面又接收着回教教义的指引，向着合理的人文主义生活方式走。现时土耳其革命以后改用拉丁字母，比较旧时沿用的以阿拉伯文字为根的字母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阿拉伯文字还是拼音的文字。世界上的象形文字只剩下中国一处，巴比伦时代的象形文字（今日往凭吊巴比伦故城时曾得到一二破片，上有换形文字）早随其统治的灭亡而消灭，代之者为后起的拼音字母文字。故土耳其及阿拉伯民族即使无拉丁字母的改用，他们的文化开展也必然地会比我们中国容易百倍！我每每在小城市中看见代写书信（在警察厅及市政局及邮政局旁边还是很多的代写书信的台桌子。因为他们国内不识字的人还多，现时约20%）的先生们，已经是用最新式的打字机，我曾经流泪，因为我追想着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而少数的士大夫礼教先生们把持旧文字及礼教的残酷。一切社会上及政治上的文书，在现时的土耳其已经用新式打字机进行着。中国奴隶式的公文，往往用比百姓生活高百倍的秘书师爷拟稿，书记誊稿，司书抄写，一日办不到百十件。反过来看现时的欧洲、土耳其不在例外，每日出版的书报及一切应用的文书，恐怕比中国二十四朝合共出版及誊写的数目还要多得多。书信及电报的写录传递至少比中国要快千万倍——因为用打字机写及直接记录复写及传递的缘故——这种状况是不是要叫人痛哭呢？我在德国时，有一次遇见一位四川的在德国住了十几年的洋学生王光新先生，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不识字，实在比欧洲各国全

数识字的人民生活得还要幸福些！——你们想想，我听到这句话时的感想是如何的？原来老顽石严立三先生，还比不上文明的洋学生王光新的彻底，因为至少严先生是不会主张“不识字是幸福”的议论的。这种最反动的主张，只有是反映着地主的、绅士的独占文化。他们当大多数人民是应该永远被奴役的。他们主观的或者以为嗜欲是万恶之源；却是他们忘记了一切主张克己的先生们不是最凶恶残刻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就是被那些凶恶的人当作工具去继续残刻大多数人民。所以我们的死敌，大多数人民的死敌是礼教，是食人的礼教。我们所要的是人欲，是人人日日所不能离的人欲。只有人人起来，觉悟着，并且去追求着不能离的人欲，然后现时的枯死凶残的中国社会关系才会打破，结果是造成人类的博爱与互助；他们的克己窒欲无我（？）主义，结果是帮助了反动的残酷。这点我在今日写信时不知不觉地发气地提出。你们可以知道我和严立三的根本差别了。

以上说了离题很远的话很多了，我要回到旅行的叙述了。土耳其各城市中的唯一景象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新式化、机械化。农业银行为现时土耳其经济组织中一个最重要而且努力的工作对象。农业机器、农业学校……到处看见，而且罗马尼亚及苏联的农业机器特别多在土耳其购卖，因为价钱较平的缘故。

十五日由哥尼亞东行到阿达那(Adana)，亦为古代有名的城市。十六日离阿达那东行经法领叙利亚的一角，转赴巴格达铁路现时的终点尼西平(Nissipin)计由起点的哥尼亞到此共约行二千一百里(1063km)沿途土警检查甚严，而且十二分的细密，可见新土耳其统治者已经完全了解统治的技术。近小亚细亚东部完全是半农业化的区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差别不大。旱亢枯槁无树木，到处见蒙古式的游牧群。由Nissipin须转汽车东南行并须在Mossul(摩索尔)的油矿区中心歇一夜，乃能到现时被英国代管的Irak(伊拉克)国都巴格达。二十早到巴格达城。Mossul

及巴格达的生活完全是帝国主义掠夺土人的生活。作歌一夜8—10印度卢比，约合中国大洋十元，食饭一日须十元。我起初觉得奇怪，为什么生活程度低的土人范围中能有这种现象？详细地考问一番，就可以发现它的规律：掠夺经济的现象。

我们只要把下面的事实罗列出来，就可以知道：现时的Irak国有铁路局中用英人职员23人，每人每月由30—70英镑（每镑=13.5卢比）合中国现时约450—1050大元。政府顾问的英人约二百名，每人所得比这个还多。此外洋行主人及戍兵军医等数在3000左右。土人的生活：农民五口之家，每月生活费至少20—25卢比，合中国二十大元左右（比中国现时农民生活还要好些！我们实在比不上真正奴隶了！）小商店店员每月30卢比，土人被雇用的兵士警察每月50卢比左右。在这个基础上自然发生了极大的生活悬隔，即一英人生活等于六百七十五土人农民的生活。在这种状况，自然洋大人可以大阔特阔，并不觉得什么了。我过境不能不用英人区域设备，故陪着帝国主义者生活。由Nissipin到现在（巴比伦故城）不过四日，共用去七十六元左右，车费约八十六元还不在内，这种生活不但比中国来得凶怪，比起欧洲的生活也要高二十倍以上。我由（London）伦敦到索非亚（Sofia）行程至少五六千里，车费仅八九千元，旅费每日平均至多五六元。可以见到帝国主义掠夺经济的结果了。自然一切帝国主义的掠夺都是出自农民及手工业者的身上的！中国情形和这里差不多。

二十早到巴格达后，因须赶礼拜六（明日）由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出口赴印度的船只，故不能停留，只匆匆忙忙地游了三小时，但一切主要的地方都看过了。昨晚（二十晚）由巴格达到了这里巴比伦故城不远的小站中歇宿。你们知道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中的两条河流，提格利斯和幼发拉底近旁为世界文明最古的策源地。索马利亚、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犹太等国相继兴起，他们的文明建设起于五六千年前，故一切发掘古物的工作到处都进行着，到处都有几千年前的遗迹。但是生在文明古国的中

国人，对于三四千年前的古迹似乎是家常便饭，倒觉不到什么奇怪，不过巴比伦的文化的确是特别些，而且离铁路站不远，花钱比较少，时间来得及，故特别赶到来一看。四千年前的故宫已被发现出。特别有趣的是著名的“巴比伦的狮子”矗立着在遗迹上面。这狮子立着，其下面仰卧着一年轻的女子。这明明是象征着雄纠纠的男子——自然这里是国王——和年轻女子交媾。此外还有许多裸体女子的小石像，这种状况在宫闱秘史内并不为奇，但是由统治者提倡成为美术，成为生活的组合象征，则为欧洲文化的特征。这种欧洲文明，自然是由希腊传递出去的。但是兴起希腊的，或者就是巴比伦文明的遗习？这个狮子和女子的交媾形式，或者可以代表当时巴比伦的人生的一面？如果这样，那我们不得不拿他和中国的文明对立了，并不等到希腊、罗马及现时的欧洲来和中国对立！我因为省时的关系，利用游完了巴比伦故城的时光，急促将所得通知你们，叫你们也享受一些，潦草及错漏自不能免，等待以后的日记改正罢！这里的车站旅馆是英人监督的。有一外人游记簿，每游客必须将感想写出。我曾写了一“文言”诗！特转录下面，备你们的参考。

人文最洪烈，首推此邦阙，
战争与科哲，相并亘古绝。
世变急西移，乃生后希腊！
罗马继复起，鸿图迈前城。
生存与征伐，不得须臾歇。
中间回教义，并合非与亚。
欧洲南西东，罔被铁蹄跨。
假非哥伦布，移转新机运。
欧亚力角持，至今还不分！
海洋与温气，诞生旧人文。
艺术日递进，自然力日逊。
今日生存者，何□非自奋？

巴比伦已矣，祇余败瓦砖！
牧人与牛羊，徜徉复徜徉。
那知今与昔，相判已天壤。
回矣浪游人，故乡荒且莽。
新机在眼前，只合鼓勇往！

我素恶及文言，你们所知的，现时不知不觉地要顺口做一篇文言诗以记感想，可以晓得我的新技术还不够用，而且旧技术也是坏得很，因为我是不懂古韵，只知今日的土话韵的。回忆着1925年过红海峡时，曾做过同类的一篇五言文言诗，原文已不在了。现时的我正在望着浩荡的枯寂的平原与古城，看着头蒙黑罩不露颜面的土女，及一群一群的牧童和牛羊奔放着，对面的新铁道，新汽车等等，在纵横的冲撞，这个是什么的一个矛盾？

今日，半小时后即须急往南行赴波斯湾，六日后到印度的(Karachi)加拉士港。

手已写倦，开车时间已近，特收束，待后详。问你们大家的好！

四月八日自菩提伽耶释迦牟尼证佛地发 诚庵兄：

自得利都城今早抵此，特为参谒圣地来，二千余年的圣迹至今只有多少。由缅甸、锡兰岛及西藏多少僧徒住持着，一切荒野残废的状况和中国各地的庙寺无别，这或者已证明了佛徒脱离了社会的结果罢！回教徒在印度，现时比佛徒多六七倍，而且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尤其是文化的作用尤过此数。关于此项，另详日记。在拉和尔及得利先后均得机会搞进农村里去，得详细和各阶级的农民谈话并分别他们的一切状况，十二分的安慰！先后曾手拍数照，或者能藉它使你及朋友们共见一些。

印度的农民正在极深的地狱中——比中国的地狱更深更暗——但现时的独立运动已十二分的扩大。甘地受去年年底全国国

民会议的委托，全权执行印度独立运动的工作，现时正在西部农村中运动，并先行拒绝买政府专卖的盐与英国的布。这种办法，当然还说不上独立工作，但不久必会一天一天地加深及扩大，因为城市的成份比中国较进步的缘故，不能不多造铁路等新工具，以扩大市场，但结果都成为印度独立的好基础！帝国主义自挖坟墓可见一般。

明日早即向加尔各答行，附来证佛地的菩提树的菩提叶七张请收存并赠松堂及奇兄各一张为纪念。问好，并问各兄的好！

· 青年自述 ·

感慨话当年

陈 强

作者系电影表演艺术家，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因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荣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配角奖和1964年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我的家庭

我生在山西太原市，家祖籍河北宁晋县徐家河。我的父亲年轻时给地主家当长工，与地主女儿——我的母亲，偷偷相爱。后来老地主抽大烟，不务正业，家境逐渐败落。外祖父为了还债，将自己女儿嫁给60里外远村一个比她小的人。我母亲当年20岁，长相很漂亮，性情温柔而倔强，过了门悲恸不已，趁三天后，回娘家之机，死活也不回去了。她说：“谁要逼我回去，我就自杀！”外祖父也无可奈何。

小女婿家去官府告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婚姻自主，影响很大。结果，母亲打赢了这场官司。父亲知道小女婿家不会善罢甘休，再加上十年九涝的宁晋泊地发大水，庄稼全部被冲走，就毅然带着外祖母（外祖父已去世）、母亲逃出家乡徐家河，一家人背井离乡乞讨到了山西太原。父亲年轻力壮，善治家，凭自己的一把力气去拉洋车，别人要两毛钱的路程，父亲要一毛钱，积攒点小本钱，开始去做小买卖，卖菜、卖瓜果之类。

母亲料理家务井井有条，还给当时太原驻军阎锡山部队的被服厂打零工，拆洗、缝衣服。外祖母在街头给人家“缝穷”。

1918年11月11日我在太原一个小海子（胡同）诞生。听母亲后来说，大人们为了活命去干活，整天把我锁在屋里。姥姥说我命大，几次死里逢生，将来必有造化。有一次是我不满周岁时。一天，邻居听到我哭的厉害，邻居进不去屋，就赶紧去告诉在街口缝穷的姥姥：“您的外孙哭的声可不对呀！哭老半天了，您快回去瞧瞧吧！”姥姥赶忙撂下手中的活计，跑回家。进屋把我抱起来一看，后背和脚后跟的嫩肉全被火炕烫坏了，从火泡中往外流血水。由于抢救及时，总算未死。

我从记事时起，就尝尽人间冷暖艰辛。不满5岁的我，每天有三件事要完成：一是每天晚上，我和姥姥提个油灯去拣还在冒着热气的、湿漉漉的煤核。开始是姥姥带我，后来我就一个人去拣。那时，我只有4岁，我拣的煤核不但能供家里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我们家对门有个煎饼铺，专门收这样的煤核。有一次我拣煤核回来，看到卖油条的，馋得慌，就把煤核卖了，买了油条。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通。

另一件事是跟爸爸去卖菜。爸爸担子上，一头挑着满满的菜，一头放着我，喊着：“卖青菜、萝卜……”买菜的妇女们见状，怜悯地说：看这孩子准没娘，大老爷们儿带一个孩子过日子，多不容易。再看看我长的还算俊，是个聪慧可爱的胖小子，妇女们发出慈悲之心。一筐菜，一会儿功夫卖光了。

第三件是领粥。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那个时代有些慈善机构，每天早晨给穷人发打粥牌。我和姥姥拿着牌，提着瓷罐去领粥，领回粥，一家人喝。

第一次演出

我一懂事，就对演戏有兴趣。我父亲忠厚老实又能干，后来

本乡逃难来的老乡都找我父亲，愿同我父亲合作，共同包工建设太原开化寺新华大舞台（戏院）。这个剧场，在当时来说算是了不起的大剧场了。剧场盖好后，父亲和同乡们承包了戏院中的所有杂役活，卖花生瓜子的、丢手巾把的、倒茶和烧茶炉的等等。老板开始瞧不起这些工作，认为挣不了多少钱，殊不知父亲他们一两个月下来，赚了不少钱。

记得我5岁时，每天穿一件破棉袄去看戏，睏了就睡，醒了再接着看。剧场演出的有《花翠兰》（京戏）、《十三旦》（山西梆子）、《群采》（蒲州地方戏）等，我是场场不落，成了小戏迷。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哼上几句。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米市大街有一些粮商和开钱庄的大财主，他们养一批玩“社火”的老艺人，每逢年下（春节），便组织“社火”文艺活动，有跑旱船的、扑蝴蝶的、扭秧歌的和走驴的……“社火”的社头还聘请街道上有才华的年轻人和小孩去参加“社火”。我虽小，但很机灵，老艺人一指点就会，能唱能跳。半个多月的“社火”活动十分热闹，穷人一年辛苦，到了年下，也算玩个尽兴。参加这些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表演，对我后来从事舞台、电影表演，从形体锻炼到表演技巧、舞蹈动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1926年），我上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学习，这个附小是当年小学中最早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校之一。每个班都有歌唱舞蹈小组。我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每次开恳亲会（家长会），都演出节目，演《葡萄仙子》（饰仙子）、《月明之夜》（饰嫦娥）、《山蝴蝶》和《麻雀与小孩》等儿童剧。这些格调清新、健康的儿童剧，孩子们颇感兴趣。有一次我们根据三年级一篇国文课《洪水》排了个短剧，故事写洪水泛滥，老百姓纷纷逃难，一个卖糕饼的小孩，看到这些逃荒的人很可怜，便将糕饼分给了饥寒交迫的难民们充饥。我演这个小孩。当难民说到：“孩子，你给了我们吃，回家不挨打吗？”这时台下的老师、家长都感动地哭了。有人称赞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呀？演得这么好！”父亲高兴而

得意地说：“那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受到如此称赞，不禁对演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说我没进过什么科班，但在这个五花八门的“大学校”——街头巷尾、剧院、庙会、夜市，到处有我学艺的机会和实践机会。有位老艺人夸我是“土生土长的小艺术家”。

上 学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求知欲很强。买书没钱，看我父亲总爱把钱放在炕席底下，就偷两毛钱，去买两本《小朋友》（商务印书馆出版）。图文并茂的《小朋友》中有很多传播“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小故事。字不认识就问，越学越有兴趣，我爱不释手，它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想象力。日子长了，被大人发觉，气愤的父亲打得我屁股都不能沾炕了。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偷钱了。

虽说家境如此困难，父母还是决意让我上学念书。上洋学堂学费、书本费太高，七岁时我上了私塾。我们家的后街棉花巷有一户回族朱家，是个大财主，要给儿子请老教员授课，为了陪伴他的孩子念书，拉我一块儿去学习。我第一天去时，给老师磕个头，交一块银元的礼。学些《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学习很感兴趣，可先生总是歧视我这穷孩子，富人的孩子淘气、闹事，都算在我的头上。这种寄人篱下的学习生活，让人难忍。我不服气，由于复仇心理的驱使，给老师画了个鬼脸。老师发现，用木板狠狠地抽了我一顿。我心中委屈，又慷慨，可又不敢对家长说。我逃学了。每天把书包藏在后院一个大盆下边，跑到太原海子边文瀛海去看戏。这里有说书的、说相声的、唱小戏的和耍戏法的非常热闹，看得我入了迷。觉着时间差不多了，赶快跑回家，取出书包，进屋吃饭。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一次父亲也在海子边看小戏，发现了我，我没有看见父亲。回家后，

父亲问我：“上学没有？”我回答说：“上了！”“到哪儿上学了？到戏棚里上学了吧？”我又挨了一通打。

父亲不死心，要我改上洋学堂——太原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要不将来连记帐都不会，还得受穷。父亲为了这，勒紧裤腰带交学费，买必备的制服。附小是男女合校、合班，还有女老师任教，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进步。我学习很起劲，总是班里前三名，三年级时还跳了一班。

后来，由于家中难以维持生计，让我停学当学徒。我执意不肯，于是又断断续续上了二年多的学。

走上抗日之路

父亲终于让我上了太原城外阳曲县一高（高小）。得到了张干臣老师的辅助，命运又使我有了新的契机。他是地下共产党员，过去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当时，他除学校工作外，还负责太原业余剧团、亚波罗剧社（业余的）的工作。他对我的教诲极深，使我懂得了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救星。我由自发到自觉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张干臣老师又是我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成了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周末、假日总要上台演出节目。搞秧歌舞、小活报剧等，宣传抗日救亡。

1934年我上了太原市并州中学，热血沸腾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剧社，进行募捐演出，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我们演出了《亡国恨》、《一片爱国心》等话剧，还请当时太原西北电影公司的专家何文今、马瑜帮我们拍戏、化妆。《亡国恨》写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老百姓倍受日本鬼子的欺压凌辱……我饰欺压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军官。这是我第一次演反面角色。

西北电影公司是1935年间锡山在太原搞起来的。当时我要报名去应聘，父母死活不同意，我硬是去报了名。电影公司考官是

电影导演石继甫，考了一下喜怒哀乐。叫哭，我马上掉下泪；叫笑，我会很自然地大笑起来；还会挤眉弄眼。结果还是榜上无名。这次我虽然未被录取，却认识了几个电影界人士，如田方、王莘、宋之的、蓝马、吕班和美工师鲁渝等。通过他们的关系，我终于钻进电影公司，充当一名业余小演员，跑龙套。从此，我与戏剧、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首次与这些知名人士同台演出的话剧是《谁之罪》。剧本写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在国民党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一批批工人、小职员失业。小职员（田方饰）失业后，不敢告诉身患重病的妻子（王莘饰），还天天假装上班。吕班在戏中饰失业工人，与小职员是好朋友，被生活逼迫，不得不当了强盗。小职员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把自己的大褂当了，买了大烟土，让妻子喝下去……这时失业工人拿钱来，对老朋友说：“我从他们（资本家）手中抢来钱，这是我们的血汗。嫂子的病可治了。”上前一看嫂子死了，便骂他朋友没出息。话音未落，警察来捕捉抢劫犯，吕班大声疾呼，“谁之罪？”“谁是罪犯？”剧本以激昂的笔触和深切的同情心，描写了穷困潦倒的小职员的遭遇和身陷痛苦深渊之中的失业者，带给人们迷惘和痛苦的思索，揭示了饱受生活熬煎和备尝辛酸的人生主题。戏中，我跑龙套。看着戏，哭得我都没办法上场了。

田方演戏非常认真刻苦，他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这个还未入门的演员来说，他的身教对我的影响颇深。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一直到他去世。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精彩的演出。我立志今后当一名好演员。可搞这些活动，家里人很担心，寄钱来让我回家，可家父怎知道儿子这几年的变化。我接到钱，不但没回家，却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去考那里的国立艺专。到了艺专，招生已过，扑了个空。要了个招生简章，悠悠忽忽返回家中，呆几天又返回并州中学。当时的时局很动荡，中学中被抓走了好几位同学，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学校经常被封锁，抓“赤色分子”，学生连红色书皮

都不能用。有一位同学拿一本《红楼梦》，因有“红”字而被抓走。

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张干臣老师介绍我到由杜任之（地下党领导人）组织领导的山西新生剧院工作，我被吸收为该院的基本演员。新生剧院是共产党领导的，杜任之是该院的院长（他是德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现任中国科学院顾问）。他妻子是法国人，学舞蹈的，当时我们几个青年人还跟她学过舞蹈。

从这时开始（1936年），我如愿以偿，停止了学业，正式搞起戏剧了。记得在1936年11月间，百灵庙大战，傅作义打胜了，我们宣传他抗日有功。杜任之给我们一项任务，以山西抗敌救援会的名义到绥远去劳军。到绥远后，结识了也在这里劳军的平津妇孺慰问团的崔嵬、张瑞芳、陈波儿等人。

苦练基本功

前边我说过，在西北电影公司演出，田方、王莘、宋之的、蓝马的表演，给我很大启发和形象教育，他们那纯朴的气质，丰富的生活阅历，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人物。我细心琢磨他们表演的每一个动作，结合学习洪深写的《戏剧表演术》，研究出一套形体动作的基本功，从头到脚的动作技巧，如：一个人在悲伤时、希望时、兴奋时、动情时的形态。我拼命练这些东西，每天照着镜子，挤眉弄眼。练到可以根据不同人物的表情，随意支配面部各个部位的肌肉动作，让左耳向上，右耳下垂（或反之）。到现在我还有此习惯。每天起来，照照镜子，练上一练。悲伤时，头下垂，眼帘下垂，嘴角向下；欢乐时，嘴角向上，眉宇双开，露出笑容。能做到这一点——形体动作的控制力，并非一日之功。记得离开并州中学不远处，民教馆有个长廊，对面有个大镜子。下学后，我先跑到那个大镜子前，操练各式各样的动作：头部、四肢、走路姿态，一会儿冲着镜子笑，一会儿哭，走几步伸

伸臂、抬抬腿，学打架的姿式等，像疯子似的。参观民教馆的过路人看到我的样子，有的很惋惜地说，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疯了？有的莫名其妙地对我摇摇头，叹息地走过去。

冬去春来，我没有间断过基本功的训练，记得古人一句话“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后来的表演印证了这个道理。比如，黄世仁（电影《白毛女》中，陈强饰黄世仁）让杨白劳按手印那场戏，黄世仁双眼眯缝着，嘴角往上一撇，示意穆仁智去执行强制手段。这一段戏没有语言，是靠面部肌肉、眼神、手势变化来完成的。好多人认为我这一招是一绝。

另外，是声音声带的训练，创作一套控制声音的办法，与角色的形体动作和情绪结合起来。我采用读拼音字母的办法来练习不同人物、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心情时的声音，运用平声、尖声、细声、葱声、厚声，每天练。掌握控制声音声带的能力，创作出病人、健康人、老人、年轻人喜怒哀乐时的声音变化和节奏。

我任北影剧团团长时，给演员讲课，首先讲演员练基本功的重要性。人物内心的情绪要靠演员外部技巧——基本功来完成。这是做演员的最起码的条件（不是唯一的，还要有生活、修养）。演员不能碰运气，要有真才实学，才能经久不衰，达到情动于中，神流于外。一个演员能控制身体是本事。电工有电工的本事，烙烧饼的师傅有烙烧饼的本事，而演员去演电工、烙烧饼的师傅却不简单了，那是会电工、会烙烧饼的活生生的人。你除了要学会他的电工手艺（常识）、烙烧饼（熟练动作和火候），还要了解他们的为人。演出“像”电工、烙烧饼的，这就是演员的本事。

电影演员（只要你想做一辈子电影演员的话）要经常训练形体，能适应各种角色的需要，才能成为好演员。我们有的年轻演员，演一两部戏，全碰运气，成了名，可后来消声匿迹了。为什么？他没有生活，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或人们常说的演员的功

力)。有的年轻演员的表演，笑，观众不知道为什么笑；哭，观众不知为什么哭。演员自己脑子里少一面镜子，感觉不出什么地方对，或差几分。我在处理《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几场戏中，应表现几分、几层心中都有数。但我在演《汉奸子孙》的小特务时，非常做作，受形式主义的影响，营造的痕迹多，为表演而表演。这次演出的失败，使我认识到除掌握基本功训练外，还要通过人物的内心情感来创造人物。所以基本功是体现角色主体意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老生泰斗”

这一时期，我比较多的演宋之的写的剧本。其中《烙痕》我担任了主角。演一位坚决不当亡国奴的人的父亲。演这个戏，我从自己父亲身上找到了形象的依据。将父亲身上某些正直、憨厚的特性移到老头身上，同时我将过去看到的、听到的、心中的模特儿都熔为一炉，加以提纯取精，表演起来就很真切，很有深度，生活气息浓，博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当时有个电影明星叫宗由(现居台湾)，他是西北电影公司的演员，也演我这个角色。他一上场，完全是“海派”味，用嘶哑的嗓音喊：“海呀！天呀！……”，他说话、动作夸张，拿枪时架式都不一样。本来是老百姓的戏，老百姓却看不懂，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而我朴实的演出，却受到了好评，使我增强了走自己戏路子的信念。

我从20岁开始，在台上一直演老头，人称“老生泰斗”。演出时人们感觉不到我还是个孩子。其实当时化妆很简陋，可能滑稽可笑、失真的地方不少，但这些大家会谅解，戏还是受欢迎的。从此，有人聘请我当演员了。总之，我从普通演员到基本演员到骨干演员，走过来的路，一直还算是顺利的。

新生剧院有一个特点，全部节目都是反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戏，如《血洒卢沟桥》、《夜光杯》等剧。为演抗战戏，还

和阎锡山进行过斗争。国民党中央宣部张道藩写了个反共剧本给阎锡山，让我们剧院演。我们剧团一看，不能演。但又不能对着干，借口剧院人手少，拖了下来。我们剧院共8个人，说演此戏得几十人，需增加人。实际上我们每次演出也不只8人，大部分是请来的，如演工人，我们就请女师中的进步学生帮助。他们学校有一个妇女反战同盟，经常与我们合作，所以要人还是有的。因为我们团是党领导的，谁抗日我们就拥护谁。这个信条，大家是坚守的。

在新生剧院后期，我在演戏方面有了很大进步，除在剧院演出外，还在社会上演。有一回在海子边组织活报剧，宣传抗日，怕有日本特务破坏，把戏名改成《戒烟运动》。其实演的是《放下你的鞭子》，我演老头，影响很大。

另外，我们剧院和教育学院、牺盟会、师范学院经常联合演出，其规模其声势是空前的，对推进团结人民一致抗日，保卫祖国，消灭侵略者，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后，党组织对山西新生剧院这一段戏剧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前夜，剧团领导通过组织，将剧团移交给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南汉宸同志给我们开了从太原转到晋西北的介绍信，我们整装待发，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

“九路军”开赴延安

回到家，与父母告别。怕父亲阻拦，只告诉了母亲，并请母亲保密。母亲为我料理这、料理那，一夜未眠。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我离家后不久，太原失守，相依为命的、慈爱的姥姥去世。宁死不愿当亡国奴的父母携妹妹也逃难来西北，可怜可爱的小妹在逃难中丧生。

1937年9月以后，太原大乱，阎锡山部溃不成军，一些逃兵趁火打劫，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们部队纪律严明，

那些逃兵一见我们就跑。我们每到一个村子，就帮助老百姓干活，担水，打柴、扫院子……老乡们对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钦佩，就问我们是不是八路军？我们回答说不是，老百姓就叫我们为“九路军”。

这一段我们边走边演一些小戏，大多是根据当地风俗人情、传说故事，拉一个提纲，就演起来。重点宣传不当亡国奴，老百姓就要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战自卫。我们的演出对安定民心、团结人民、保卫家乡、组织抗日队伍，起了鼓动作用。

我们进西北，从临石碛口镇过黄河走至绥德（当时是国统区），部队在此地整休三天。一天我在一个街道拐角处，突然碰着了我的父亲。父亲惊奇地问我：“怎么逃到这里来了？”我告诉父亲：“到延安学习去！”父亲说从我离家后，他也随后逃了出来，一直在找我。父亲将我领回家中（借人家的两间小房），母亲见儿悲喜交集泪如雨，听说我要匆匆离去，失声痛哭。我安慰母亲说，今去延安学习抗日本领，打倒倭寇，定会再团聚。我终于说服了父母，又随队伍奔向延安。

1938年4月我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和马玉、何文今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二期学员。

在未到延安之前，听人说过延安很苦，要自己挖洞自己住，自己开荒自己种等等。其实不然，那里是一个崭新的制度，是另一个天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们无拘无束，自由奔放。

我们住的窑洞早已挖好，干干净净，吃的小米饭、荞麦面面条，非常可口；没有食堂，大家都在外边吃，有说有笑，舒畅愉快。到过延安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美好的日子。

到延安不久，为庆祝“五·一”节，鲁艺组织演大戏，我和剧团同志都积极投入演出《大旦河》的行列。戏剧系张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任导演，左明（老左联的，在上海曾导演过《王先生过年》）排歌剧《农村曲》，老师崔嵬主演《流寇队长》，我在戏中饰演配角。

第一次交女朋友

为纪念“七·七”事变，延安举办了戏剧节，第二期学员参加演出了《流寇队长》(话剧)、《松花江》(京剧)、《农村曲》(歌剧)。一位饰演《农村曲》的工人病了，没有人顶替，就让我上，经试唱，一致说好。左明导演评价我气质好，表演好。从此，我被人注意了，也有点小名气了。接着又参加《国际玩具店》的演出，崔嵬指导，成荫导演，马玉、苏里、陈克和我参加了演出，我在剧中饰希特勒，这是我第一次演反派角色，很成功。

这时，有个女孩子，她是鲁艺第一期学员，她对我很好。我们曾一起在《大刀河》中演出过，她任女主角，合作得很默契，受到了人们的称赞。由于事业和生活有了共同点，我爱上了她，并正式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突然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说她是有夫之妇。听到这，我如雷贯耳，惊魂落魄。怎么？她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事啊！我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还是固执地追她、热恋她，总是忘不掉她。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原在东北军，是我党的党员，是组织上派他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由于形势的恶劣，组织才把她与丈夫分开，将她送到延安。我不能影响人家的幸福，要果断、主动地“撤出”。因此，我感情上倍受打击，大病一场。

第一期鲁艺学员，组织了一个鲁艺实验剧团。第二期戏剧系毕业后，组织让我留在该团当演员。我觉得这样影响不好，要求去前线。1938年10月我被派到第二战区，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抗日宣传活动争取阎锡山参加抗战。我和庄燃、翟强参加了文化界抗敌协会剧团、第二战区民革实验剧团。我先后参加了《矿灯》、《打虎沟》等剧目的演出。

1939年反共高潮，阎锡山转向了蒋介石，白色恐怖猖獗，组织上通知我们立即撤回延安。我是第一批撤走的。通知我走的竟

是多年不见的老师张干臣。当时他是阎部中的高级干部。我为老师在危险情况下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战斗精神而感动。

第二次回延安，又赶上为“五一”做演出准备，我参加歌舞剧的演出，冼星海一下把我看中了，动员我去学习音乐。这样，我考入了第三期音乐系，成为冼星海的学生。

不久，中央根据抗日形势的要求，动员大家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宣传活动，鲁艺、抗大大部分人都参加了。鲁艺由成仿吾带队，抗大由罗瑞卿带队，我们算第三梯队，往敌后开拔。

到 敌 后 去

1939年7月10日，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从延安驻地向敌后进发。在不久前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属文艺队三团，这个团力量雄厚，团长是沙可夫，文艺教员干部有崔嵬、丁里、穆虹、钟惦棐、胡苏等同志和我。团里分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我被分配到戏剧组，戏剧组有郑岩（组长）、邢国柱、郭维、洛林、蒋立兴等同志。

我们过黄河前部队要休整一下，姚时晓乘机写了个剧本《棋局未终》，写的是国共两党的摩擦，国民党想把我们吃掉，阴谋杀害八路军一名司令（崔嵬饰），然后将部队歼灭。我演钻进共产党部队中伪装厨师的特务，想要杀掉八路军司令，又下不了手，结果阴谋败露……这个戏在联大一下打响了，也成了后来的保留剧目。我演得也十分成功，被一些老艺术家肯定。

我在三团担任前站设营队队长，我们跟着部队尖兵排和一个机枪班打前站。通过封锁线，从延安到敌后要走2000多里的路程，我们一路小跑。文艺兵边跑边助兴，有时要挖掩体。团长说，挖到能把自己保护起来就行了。每个人带个水葫芦。跑起来咣当咣当响，怕敌人听见，命令把水倒掉，很多同志倒了，我未倒，因为毛驴驮的水比我们这声音还响。跑了一段路后大家又渴

又累，没有水喝，后悔当初把水倒掉，我把水给他们喝。这段路，有的同志掉队了，有的同志病倒了。有一个同志被敌人俘虏，他叫张治。后被敌人押送东北挖煤，他逃出来。老乡给掩护了起来，在油房里做豆腐。他给家乡写信，转告部队，部队将他接到了延安。

傍晚，趁着明月往下看，战士们东倒西歪都睡在山坡上。这里有三八五旅警戒，旅长余秋里命大家起来，赶快走，不能停，这里很危险。

9月24日夜行军80里，通过同蒲路，翻过一山又一山，行进更加艰难。第三梯队全部集结在干河滩山，罗瑞卿在那等着，他是我们的总指挥，说是来接我们的。他给大家鼓气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我们有英勇的八路军掩护，敌人不敢爬出乌龟壳。再向东走就到晋察冀巩固区了，到了巩固区，同志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每天走他40里、30里……可以轻松愉快地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很激动，可他话音还未落，就听到敌人的枪、炮轰轰响起来。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日本占领了“葫芦口”，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被困在四面高山的口袋里的几万人没有武装，余秋里派的保护我们的几个连，寡不敌众。于是找了个羊倌引路，走出了“口袋”。这条路只有羊倌知道，敌人煞费心机也没有找到我们。我们通过天贵山脉，越过封锁线。要说通过封锁线的艰难，可以用渴、累、饿、冷四个字来概括。

渴，我们过一道铁路，有臭水沟，大家都趴下去喝。我爬上半山腰，有玉米杆，我拔了很多，口袋装着，腰里别着，这时的玉米杆解渴又解饿，十分香甜。一天，走过一个土丘，忽见面前有两桶水，这是老百姓偷偷放在这里给我们喝的。谁送的？没留名，老乡是怕日本鬼子知道。同志们边喝边流泪，边流泪边寻视送水的亲人……

累，有时爬山，有时过草地，一走就是几十里不休息，实在一步也不愿再走了。这些知识分子是经过延安革命熔炉锤炼的全

国之精华，是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其中有搞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是党培养的一批宝贝。部队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虽说行军艰难，也不能掉队……为避开日伪冬季大扫荡，我们由平山转移，在风雨雪迷漫的行军中，越过“漫山”。我们几个同志成了“冻号”（受了冻伤的同志），这时，一位首长把马给我骑，后来我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彭真同志。这件事使我永记心怀。

冷，爬上五台山南端最高峰骆驼梁，是一山接一山，山雨濛濛，路滑难行，衣物全湿透了，每个人都要摔几次跤。侯金镜（文艺评论家）眼睛不好，摔的跤最多，眼镜被摔碎了。等到山沟里休息，大家互相一看，各自都变成了泥人了。看着各自的怪模样儿，都情不由己的开怀大笑起来。

山沟里是一线天，好像已走到了尽头，有小水柱从山腰往下飞腾，到了山沟中间变成小溪，路更加难走。在终年被水冲刷成的鹅卵石上走，我们的鞋子全破了，自己打草鞋，有很多同志光着脚丫子，踩在石头上走……一个小同志在一个阴冷的夜晚熟睡中，被冻死了。出了山沟，过葡萄河上游又下起大雨，山洪爆发，桥被冲走了，到老乡家找了些门板搭桥，就这样，有同志还掉入水中而牺牲了。

饿，部队终于到了彼岸，过了河安全多了，可衣服、干粮、粮食全成了泥糊了，湿漉漉的。大家点起火，暖暖身子。我去买了一只小羊，解解大家饥饿之苦。我们一边烤衣服，一边吃着烤的半生不熟的羊肉，高兴极了。夕阳余晖，阵阵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部队从平山到了会口。我们住在张谷庄，边区政府送来了粮食。这是多少天来，第一次吃饭，吃的是面条。我一下子就吃了四大缸子面条。平均一个人吃两斤。随队医生来，劝大家少吃，这是患了胃扩张的病，慢慢会恢复正常。

这就是我们穿越封锁线的艰苦的历程。它给我的东西很多，

锤炼了思想意志，坚定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斯氏体系的学习

当年联大有个口号：“背起背包就行军，放下背包就学习。”

联大很注意文艺理论的学习。上海孤岛时期，有一批人翻译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和“斯氏体系”，后来他们到了解放区，弄过来一些油印本，由河北华北联大出版《斯氏体系研究》一书。这本书现已成了历史文物了。陈鲤庭是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专家，是中国第一位将斯氏表演理论介绍来中国的人。他翻译一些有关材料，拿来供我们学习，我读了很有体会。当时我们排话剧《凤凰城》就是按斯氏排练方法进行的，对我的表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们每周都要讨论几次斯氏表演体系。开始学习还好，后来越学越觉得所谈的表演艺术太玄妙了，“下意识的门限”一节那就神了，不可能实现，也不可信了。

演员是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结合，主客观结合的完成体。我在舞台上表现的是另外一个人，决不是我陈强。另外是什么样？我主观有想法。通过什么样的动作来表现？要有较清晰的认识，达到有意识地去支配客观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我个人，我又是剧中的人物，是两者的统一体。既然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那么通过我来表现的人物也就带有我主观上的东西，指挥自己完成客观人物的任务，将人物的感情和自己的感情结合起来，这一点与斯氏不同。我既不是斯氏派，也不是莫特尔一派，是既重视形式也重视内容和技巧的莫斯科剧院中华科坦科夫一派。大家学习中争论很激烈，通过讨论，有了很大提高，收获非浅。

演员演戏不能完全靠天才，还必须靠理论，靠技巧，靠生活的积累。每部戏都有它自己的主线、单位和目的。而戏中每一段、每一节，也有各自单位的目的。斯氏方法有很多是好的，现

在也还是有用的，对演员来说必须要读要学习。一个有志于一辈子当演员的人，不要凭碰运气，争荣誉、争主角，应主动去学习理论，在生活中学习，使自己的演出不是“昙花一现”。

我的“小抽屉主义”

演员除了学习理论外，最重要的，也是人们常说的，更为今天年轻演员所忽略的就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学习生活。生活在群众中间，和群众在一起，对群众喜怒哀乐、风俗习惯要做到了解和理解。当时我们在敌后，可以说除演戏、拍戏外，总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是和劳动人民在一起。他们的甘苦及追求，我们了如指掌，与他们亲如手足。演戏时的戏感和灵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演员自身有底数，人物的步子怎么迈，说话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不会走调。所以戏感的迸发，自然流畅，其实就是一个字“像”。“像”是大家所追求的，但怎样才能像呢？

我的办法是，善于观察各种人的穿衣戴帽，言谈举止，习惯动作，性格特征，音容笑貌，并默默地记在心里，回到宿舍琢磨着反复练习。有点像电脑一样，将这些人物特点储存起来，“储存器”就是脑子，脑子就像中药铺那些小抽屉，各装各味“药”，各有各的用途。好人的、坏人的、伤感的、善良的、丑恶的、欢乐的、凶残狡诈的……各种人物，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生意人等，他们的人生处事，逻辑思维，这一切都储在我的大脑的“小抽屉”中，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中药抽屉”中就会越来越丰富。

这就是我的方法。当时和日本反战同盟人员共同演有日本人的戏时，他们说我很像。这是“小抽屉”对我的帮助，从我“小抽屉”中借用的，给角色长上“翅膀”，演活了。

前边我说学习表演理论，这里我再说一下学习中外名著的问

题。演员没有文学修养也不行，因为演戏毕竟不是重复生活，重复生活的戏决不是好戏。所以提高文学素质是演员重要的一课，否则便成了导演的“木头人”。在联大期间，我看了不少书。我爱书如命。可惜，存留的好多名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横扫一空。“四人帮”倒了，退回甚少。当时，我读了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我看书有一个特点，看得慢，常是和书中人物感情一块儿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贵族儿子和女奴结婚生了孩子，老贵族气愤地扬鞭打儿子：“你死了，也不要回来！”儿子携妻子离开了家园。当老贵族的妻子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时，他问老婆有什么要求？老婆说：“我要看看孙子，接儿媳回来吧！”老头站在床边偷偷地掉了泪。这一段描写，我足足看了三天也没过去。每看一次，眼泪哗哗地流。当一读到老贵族的戏，就情不自禁地进入了角色，和书中的人物共命运。

果戈理著的《达拉斯布尔巴》，写哥萨克族老头一家。老头送儿子出征，母亲一夜未眠，看着儿子。父亲一言不发，他是个性格倔犟的老汉。小儿子和波兰公主结婚了，投降了。战场巧遇，老汉大声疾呼：“我生下你，我再送你回去！”一枪打死了小儿子。大儿子则被波兰华沙政府处决，老头买通买卖人，赶到刑场。在断头台上，英勇不屈的大儿子说：“我死了，可我父亲不在我的身边。”老头高喊：“好儿子啊！”老头对待两个儿子不同的情感，紧紧抓住我的心，至今还记忆犹新。

《欧也妮·葛朗台》的作者写了那么多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用心血培育出来的。当演葛朗台这样的角色时，就会有立体感、厚感，戏出来不会一般化，富有深刻的内涵。这就是原作者编剧的重要性。借用作家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也是丰富自己“小抽屉”的方法。应该说，这对演员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不去做，不去拿，不勤快点，就不会把宝贵的东西、有用的东西装进“小抽屉”。现在我有很多“旧货”，至今还未用完。

现在年轻演员不太用功，没事干，玩，“侃大山”，抱孩子，不去追求自己的艺术，没有把演员表演艺术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有的只演一二出戏，有的一下成功了，获奖了，可以后却再见到她有什么进展，甚至不见踪影了。作为一个好演员，你演不动了，才能论定是不是好演员。我现在只能说我是个宣传员，一个表演艺术创作者，只有到了八宝山才能论定：我是什么样的演员。

《把眼光放远一点》

1941年大扫荡，我们演《把眼光放远一点》，是在敌人心脏演的。戏写的是老大老二住在一个院子里，分家过。我演老二，凌子风演老大。老大从事革命工作，老二为人胆小怕事，哥俩的儿子都参军去了。老二担心儿子打仗会战死，心情十分矛盾。演这个人物时，我“小抽屉”中有很多类似这样老乡的模特儿，戏虽然在敌人心脏——范氏县演，但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喊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鬼子”的口号。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叫联络员来镇上看看，怕有共军埋伏。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班。我们有此胆量，是因为有群众保护和为革命的那种献身精神。

《把眼光放远一点》编剧胡丹沸、导演穆宏（后任戏剧学院院长）。戏很受群众的欢迎，影响很大。1944年把这个戏带到延安，当时延安正处于文艺整风的后期。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话剧是“输入品”，不合国情，不是本民族的东西，加以否定，只有秧歌舞才受欢迎。我们给中央领导汇报演出，领导看了后，认为故事新颖，思想挖的深，艺术性很强，说这是真正的话剧，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央领导如此高度评价，剧组人员欣喜若狂，演话剧的劲儿更足了。那些对话剧持有偏见的同志，也受到了教育。从此，延安演话剧又兴旺了起来。

所以，戏不在艺术形式，而在于群众喜欢不喜欢故事的内

容。目前一些电影，脱离群众，群众看不懂，说是给未来观众看的。请问，未来观众看什么？喜欢什么？你怎么知道？实质上是否定观众。我仍然认为：内容好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推动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是好作品。那些抽象的、淡化的、无情节的、闹到看不懂的程度，我看仍然不能说是好作品。据了解，世界获大奖的艺术片仍是那些有故事有情节，为人们所接受的好作品，我看这就是一个证明。

角色的创作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对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有了新的明确的认识。我们编写了《拴不住》，写的是儿子参军，儿媳妇愿意。父母开始反对，后来没办法，媳妇说的在理；父亲点头同意。我演戏中的父亲。接戏后，我把戏中每个单位的目的、任务弄清楚，再找到每个单位任务的生活依据——模特儿，进行造型，设计动作。表演出来的人物则是活生生的了。为演这个戏，我剃了个光头，再加上化妆很成功。这个戏是有感而写，有情而发，剧情与当前群众生活紧密相连。戏“一炮”打响了。后来这出戏很流行。戏由丁里导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静、刘沛、迺林等同志。

我们又根据国民党总找碴儿，制造国共摩擦，新、旧军（新，指决死纵队；旧，指阎锡山部队）的矛盾，以此为素材，写了《空军司令》剧本。每天演三个戏：秧歌舞、《拴不住》、《空军司令》。三个戏都是我任主角。忙得不亦乐乎，几个人为我化妆上戏。群众冒风雪严寒来看戏，其热烈情绪，对演员也是个鼓舞，再累也不累了，再冷也不冷了。

1941年在联大文工团，除参加演出《拴不住》、《空军司令》外，还参加过《二大伯》、《带枪的人》、《求婚》、《钢铁与泥土》等话剧的演出。《钢铁与泥土》，丁里编剧，是个歌剧。写的是有的

人在敌人面前是钢铁战士，有的是泥土——软骨头，背叛了革命，当了汉奸。郭良玉演儿童团员，张静、王树萍、贺露演文工团团员，侯金镜演伪军，陈辛演特务，我演“泥土”，丁里演“钢铁”。我调动了“小抽屉”，把“泥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舞台上。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我也创作了几个秧歌舞和歌曲。例如，《过新年》：

打走呀鬼子，过呀过新年，
军民呀合作，闹呀闹得欢，
今年不比往一年，
抗战走上了第二阶段。

大家呀努力，克服困难，
流血呀流汗，战斗生产，
青年壮丁上前线！
拥护边区防汉奸。

你也呀干来，我呀我也干，
咱们呀来打游击战，
军队人民齐动员，
打走鬼子过个太平年。

百团大战后，环境日渐恶劣，敌人蚕食边区，步步为营，形势越来越残酷。中央要求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联大文工团在此形势下，将文工团分成了几份，我被分到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个团最早领导人是丁玲，后来是周巍峙领导。

1943年大扫荡后，我演了一个歌剧《不死的老人》，邵子南编剧，凌子风导演，我演干部。歌剧是我拿手好戏，但这个戏不算成功，主要是剧本提供的生活基础不够扎实，人物形象失诸粗疏，情节处理上显露出戏剧化营造的痕迹。

做一个演员应该自己会唱、会跳，还要会武术、会表演、会模仿各种人的语言声音。现在演员单一，戏路窄，这无疑影响自己适应更多的角色的创造。

因为我从小就会跳舞，日本舞《摸泥鳅》，我学了两次，实践了两次，就掌握了它的规律，成了我的保留节目。到什么地方，群众非要我演出这个节目不可，否则就过不了关。

演员是万花筒，能变化各种花样，演员要想做到演什么像什么，一要有生活，二要技艺扎实，三要素材多。假如没有掌握好这三点，你就好比磁娃娃——腹中空。电影演员反映生活中各种人。演员要随角色变，因之演员的气质也得变。有的演员，演农民像，可演资本家，还是农民。这是因为他平素少这方面的积累和训练，大脑中没有“中药铺中的小抽屉”。

我演黄世仁、南霸天，同是反面人物，地方一霸，鱼肉百姓的恶棍，但身世和性格并不相同。每场、每景、每个局部动作，突出表现哪一点，扩大哪一点，心中要有数，光靠导演说，心中无数，人物形象必然苍白，少内在的东西。

电影演员很苦，创作一个角色就像妇女生小孩，从无到有，是用心血来滋养的。演员从接受剧本起，就开始“孕育”。怎样来完成它呢？我举个例子：

我在《大河奔流》中演了个老农民，跨度二三十年，人物是在大的变化中产生和发展着自身思想情感的。

黄河决口，农民遭到最深重的灾难，离乡背井，逃荒在外，这是个大变化。在大变化中，老汉孤独一人没有走，留了下来，度过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多少年的时光。他整天只有和鸟、鱼说话。人，已变成自然的人了，不是社会的人了。等李麦他们回来，老头那个激动，一下痴呆了，说不出话，这又是个大起大落的变化。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自救，到敌占区把人找回来，成立了根据地自己的政府。人虽然衰老了，可精神年轻了。到后来见到周总理，总理要征求农民意见，刹那间，老汉思

绪万千，一言难尽。这时的表演，完全靠技巧来完成。

一个演员演一部戏，要设计好“全部”。在把握大单位（总体上）的前提下，处理好每个小单位的任务，完成人物性格发展变化史。而这些小单位任务，正是大单位整个任务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完整体——故事（如果一个细节处理不当，都会有损于整个的故事的真实性）。这样你看到的人物则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的。

返 回 延 安

1944年4月，日本大扫荡后，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缩小。上级命令我们再次通过封锁线，速返延安。要说这次行军更苦，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我们必须两个男同志架一个女同志快速行军。我和凌子风架着胖大姐胡斌（后为中国评剧院院长），紧紧跟着队伍，掉队是不行的。我们每个人身上还带有粮食、手榴弹，女同志的腿累得都打不了弯了。王昆同志在这次行军中流产了，她被留下来（后来，通过交通员送回延安）。千里迢迢，跋涉艰难，奔赴延安。

上次过绥德是国统区，巧遇我父亲。这次过绥德时，是解放区，休息两天。我在街上看报，有个女同志抱着孩子在我旁边转来转去盯着我，我一转身，她叫了声“陈强！”我一愣神，原来是在延安认识的女朋友。真巧极了。她吃惊地问我：“怎么穿老百姓的衣服？”我告诉她从敌后回来的情景。她把我带到她家，洗了个澡，送我一套他爱人的衬衣、衬裤，又给我带了毛巾，肥皂等，吃了一顿香甜可口的饭。我们有战斗友谊，也有朋友的友情，我们都忘不了那段使我大病一场的“人生插曲”。我离开她家时，她嘱咐我：边区正在文艺整风，说话要小心点，有几个朋友都被打成反革命了。你脾气不好，不要急躁发火。这时她爱人是陕甘宁边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她原是留苏学原子医学的。

我们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回到延安后，西北战地歌舞团与鲁迅艺术剧院合并。首次汇报演出《粮食》等节目。演出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粮食》由海默编剧，《打粮食》由陈荒煤编剧。这些剧本都是从战斗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加上在联大期间学习和在敌后演出实践，表演技艺纯熟多了，演员在体现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也比过去跨出了一大步。

演歌剧《白毛女》

《晋察冀边区日报》连载罗曼根据河北唐县、完县、阜平一带的民间传说写的小说《白毛仙姑》，周扬看了以后，认为是好东西，希望搞成歌剧。为了突破话剧的时空限制，用过去古典戏的手法来写。邵子南开始用诗的形式改编成剧本，不好演，诗不好表现，群众听不懂。后来从鲁艺文学系请来贺敬之同志写剧本。贺敬之年轻也很有才华，他集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反复琢磨，根据情节写戏、写歌词，把戏的意境和表现手法又提高了，使戏越加完美和精练。

一开始让我演黄世仁，我不愿演。我对演杨白劳很有把握，演黄世仁费功夫，再则我多少年来，主要演正面人物，演反面人物觉得别扭。导演王滨鼓励说：“你能演！”这是他对我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从我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得来的。我品味着这种“信任”中意味着什么。演员是宣传员，教育人，也同时教育自己。今天把反面人物演成功了，其教育作用就会更加深刻。实际上开始让我演黄世仁，我的“电脑”——“小抽屉”就开始检索出各种各样的模特儿。想起我的同学，他家是个大财主，一进屋，古色古香的家具陈设，线装书满架。但剥削穷人，他们一改那种“世家文人”的面孔，似恶狼一般。还有，在晋察冀边区，有的地主，我也看到过，一家的院子十几层，一个院子装饰一个样，古董千万件，土地上千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说的比唱的

好听，尽做男盗女娼的事。有的村地主有初夜权，无论穷人谁家小伙子娶媳妇，必须要新娘和地主先睡一觉，否则，地主是不会让你活下去的。

“我要吃你！”这是地主的人生哲学。彩排时，陈荒煤、黄纲等同志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有同志说情节好，但黄世仁太帅了，美化了，对黄世仁“吃人”的一面表现得不足，要将他恶毒、残忍一面画龙点睛地点出来。

“杨白劳划押”那场戏，少东家让穆仁智把杨白劳（张守为饰）叫来，开始是笑眯眯地说：“你把女儿送来顶租子。”好像是他最宽容的合情合理做法。杨白劳一听这话，扑腾跪下，哀求道：“少东家，这可不行啊！”“求求您啦！”黄世仁马上站起来，脸刷一下变了，一眼高，一眼低地用眼神示意穆仁智，采取强制行动……这段戏没有对白，一个眼神，一个手帕的身体动作，表现出要“吃人”的十足的恶霸嘴脸。

1945年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党代会，首次给代表们演出，党代表们把它作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题目，有的农民代表说：对黄世仁这样恶贯满盈的恶霸没枪毙，不看了，太憋气了。刘少奇同志讲：他（黄世仁）不是统战对象，是汉奸、恶霸、地主，还有人命案，应该枪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恩来同志说：这个戏非常好，演出也非常成功，走到了时间的前面。“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意思是指民族矛盾已逐渐变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开始变为主要矛盾。

我们根据这些意见，待正式演出时，将黄世仁枪决了。从此以后，这个戏一下红起来，直到解放战争的后期，可以说百演不衰，百看不厌。对我来说，它也是我在表演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白毛女》的创作，是我从艺以来，也是我们鲁艺创作史上一次大的飞跃和成功。

三幕一场。黄世仁手持灯笼，边走边唱。这段唱腔，道出黄

世仁吃人本性和十恶不赦的恶霸面目。

黄世仁我命好，家富贵，
穷人家没吃又没穿，
注定他该受罪！
牛马不走我用鞭打，
猪羊不死用刀杀，
穷人谁和我作对，
那算该你倒了霉！

这段是歌与舞结合起来的表演，人叫提灯舞。用舞蹈身段走场，很多人喜欢这段戏。

还有开头黄世仁出场唱的戏，大家评价也很高。这段辞旧岁与喜儿（王昆饰）《欢欢喜喜过个年》、《红头绳》的唱段形成鲜明对比：

喜儿唱：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
爹爹称回来二斤面，
带回家中包饺子，
欢欢喜喜过个年。 （第十曲）

杨白劳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第十一曲）

喜儿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爹钱少不能买，
扯回来二尺红头绳，
给我扎起来！ （第十二曲）

地主黄世仁在自家，醉意浓浓，唱：
花天酒地辞旧岁，
张灯结彩过除夕，

堂上堂下齐欢笑，
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家自有谷满仓，
那管他穷人饿肚肠。

这段唱很难写，应该丑化黄世仁？还是美化黄世仁？还是只用音乐加以形象化呢？开始时采用了秦腔，试唱以后，不理想，编剧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我演，我唱，为了唱得更顺口，更能表达情感，我亲自谱写成民族歌剧的曲词。唱时，很自然，味道找的准。后来各地演出这个剧目时，都尽力学我唱的那个味儿，但怎么也达不到。这是因为过去学过音乐，又学过舞蹈，帮了我的忙。这个戏一个时期传遍了边区，对土地改革斗争起了一定的鼓动作用。

黄世仁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不能以单一式的表演来完成。他是人，是人中吃人的人，是恶霸地主。他有时表现出洒脱、自乐的美感，有时表现出恶毒多刁的丑感。只要人们想到他就会时刻警惕他。杨白劳按手印，黄叫穆仁智执行，撕破脸皮，暴露原形。在对待母亲时，黄世仁所表现的又是另一副嘴脸，像百依百顺、唯命是从的孝子。见了喜儿，完全变了，像狼看到小鸡，垂涎三尺。对穆仁智，将他当做仆人、“哈巴狗”，黄世仁做坏事要靠他来干，是狼与狈的关系。

演这个戏，我也有难处，比如强奸喜儿那场戏，我怎么也做不出来，排了好几遍。那时，我年轻，不好意思，我就诚心不想演好。导演严肃地对我说：“不是你陈强，是演黄世仁。”我激动地说：“这戏演好了，还有人喜欢我吗？我还未结婚哪！”演员要忠于角色。角色要求，黄世仁是畜生，要达到他兽性的欲望，他可以在“礼义传家”的佛堂里、“积善堂”的牌匾下干出他的兽行来。

我要完成这多面性的表演，又要时刻不忘把握黄世仁“吃人”的主线，才能将黄世仁的形象创作最后完成。

戏演好了，也轰动了，可我却遭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孩子们一见到我就喊：“他是坏蛋，不要理他！”我到南市场买东西，孩子们追着用石头打我。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地区，一次正演到要枪毙黄世仁那场戏时，剧情与观众心情交融了，悲愤至极的群众用水果打，把我打得晕头转向。坚持演完下场，发现眼眶全被打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晋中，给部队演出，演到最后，战士们哭的一塌糊涂，台上喊出“枪毙黄世仁！”台下一位战士端起枪就要射击，被旁边的排长一手按住：“你干什么？”战士哭着说：“我要打死他，打死他！”排长说：“人家那是在演戏！”这位战士才醒悟过来。为此，戏停演了几天。再次演出时，事先通知部队，来看戏的不准带枪。后来，《白毛女》拍成电影，拿到越南去演出，一个战士竟持枪给银幕打个眼。这是原越南电影局局长陈登科对我说的。

不难看出，这个戏就其影响和演出效果，在戏剧、电影中也是罕见的。

演完这个戏以后，好多同行都认为我只能演反派戏，成了“反派泰斗”了。其实我演正派戏，老头戏更多些。

我演这个戏，自身有这样一个体会，首先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诚恳的人，而这些正是做一名合格演员的自身气质。演员气质是形象创作的基础，形象创作的可信性是一部戏成败的关键。观众相信了，说明你的表演是真实感情的流动。没有真实感，没有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角色——黄世仁，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所以说，一个演员平时要注意修养，培育自己的气质，以适应各种角色的演出。

第一部故事片的创作

由于蒋介石疯狂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失守，华北文工团撤到冀中。组织上派我去战火纷飞的东北，到电影制片厂搞电影（即

长影前身)。

东影是在伪满电影厂的基础上成立的。1946年末，东影已由长春撤到兴山鹤岗。田方、陈波儿、袁牧之等同志在那里组织班子。我们和满影留用人员组成编导组、演员组。编导组由王滨、王震之任副组长，演员组我是组长，于蓝任支部书记。我们招了二三十个年轻人做学员，先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分到演员组。开始不懂电影艺术，边学习边干。练舞蹈，扭秧歌，拍一组形体动作课教学员练。学员每天跟我学习练功，学表演理论，做小品，表演人物，独幕小戏。请音乐老师教学员练声，后来这批人成了新中国电影事业方面的骨干。

我是建国后第一代演员组组长，我们在人力不足、器材欠缺的情况下，拍了两个短故事片。由伊林导演，包杰（原满影留用人员）任摄影师，拍了各5.64尺的《老母猪半天还乡梦》、《留下他打老蒋》两个本子。《老》是写还乡团的。《留》写一个战士不小心，打死小孩。新区人民该怎样看？部队决定当场枪毙小战士。丧子的父亲很痛苦，但看到人民子弟兵为保卫老百姓出生入死的战斗，厚道的老人，想想说：“我的孩子已经死了，留下他打老蒋吧！”表达了父亲对解放军的爱。大家第一次搞电影，映出后一看，这不就是故事片吗？大家信心足了，兴致也大了，何不拍个正儿八经的故事片呢？

不久，于敏同志写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剧本《桥》，王滨任导演。我们剧组全体到哈尔滨铁路工厂拍的。导演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和工人在一起上下班。我住在一个工人家，和他睡在一个炕上。那个老工人睡觉都在想他的工作，想他的明天。他对党非常热爱。日本期间工人们吃的是橡子面，干的是牛马活。解放了，当家做了主人，幸福极了，深感翻身后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工作十分认真负责。

过去我一直演农民，这次演工人，很有新鲜感。这位工人对我的感染力很强，他迷住了我。等我演出时，不带他的山东味说

话，都觉得戏的效果出不来。我体会到，只有演员对生活的领悟，发自灵魂深处的感受，才能塑造出逼真的形象来。尽管这部电影还不能说是上乘之作，但她毕竟是新中国第一部影片，也是新中国以工人形象为主人公的第一部故事片，其意义是深远的。就说体验生活吧，我们开了个好头。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凡拍一部影片之前，都要先去体验生活，成了一种好的风气。

我们当时只用一架最简单的老式法国电影摄影机、五六个水银灯，就把戏拍出来了。大家同甘共苦，以艰苦朴素为荣，只有一个信念，把戏演好，拍好，支援解放战争。

接着拍《白衣战士》。这次剧组是到刚解放的济南拍摄。这部影片拍完后，拿到部队去，每解放一个城市，就在那里演，影响很大。

正拍《白衣战士》时，我被通知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我被选为理事。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中南海看了《桥》。他对我说：“电影拍得很好！”我说质量不算好。总理说：“工人阶级登上银幕，做为主人，这还是第一次。人物性格很突出。”

影片《桥》以崭新的思想内容，朴素的风格，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艺术影片载入电影史册。

（胡明 整理）

转蓬的一生

丁 聰

丁聰，画家，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三 项 专 业

今天人们都习惯称我为漫画家，其实这只是我的三项专业之一。漫画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不是难事，但靠它吃饭却不容易。尤其是在旧社会，即使是被称为大漫画家的人，也还需要一项能够养家糊口的“正经”职业。再者，漫画主要是靠报刊发表来和读者见面，需要较优的制版印刷条件，旧社会战争频仍，人民迁徙奔波，常常为漫画以及一切艺术的发展带来困难。还有，漫画生来就是刺人的，被刺者常常依据政权的力量给以抵制。由于这三种原因，虽然我起步于漫画，但时干时停，使我在漫画之外还得兼有其他的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如当画报编辑和戏剧美工设计。这三项专业因时因地交替使用。给叙述带来困难，评书艺人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却难于把大半生经历分成三个单项分头讲起。原因是在任何一段时间里，三个单项常常处在“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并存状态，常常呈现“二合一”或“三合一”的并进局面。为此，我的叙述大体仍以时间的先后为序，个别地方才“上挂下连”，集中在某个单项进行阐发。

李商隐著名的七律《无题》的结句是：“走马兰台类转蓬”。兰

台，是古代的秘书省，李商隐大约是形容自己在官场中转来转去得不到自由。“转蓬”的形象鲜明生动，也极适合于我，只是我一生从未攀陟过“兰台”一类地方，而一直随着时代的激流旋转，有些时候我的身子和行动得不到自由，但我的心始终和人民息息相通，这便在形势好转时，使我在工作及创作当中获得最大的自由。转蓬的一生，大概并不仅仅是我个人才有的经历，但我又确实从中体会到难得的人生滋味。因此，我愿以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

为什么年过七十还称“小丁”？

这是近年人常向我提出的问题。

说来话长。第一个原因是：我的父亲丁悚，是上海的一位老漫画家，“五·四”运动之前就已成名。较他稍晚，又起来一辈漫画家，如张光宇、叶浅予等。张、叶年龄都介乎我们父子之间——张比我父亲小9岁，大我16岁；叶小我父亲16岁，大我9岁。故而他们习惯称我父亲“老丁”，称我作“小丁”。记得我开始画漫画时，签名曾用过真名“丁聪”。但繁写的“聪”字笔划很多，写小了，版面做出来看不清；写大了，在一幅小画上占了很大一块地位，看上去很不相称，于是张光宇就建议我署名“小丁”。我以为有理，就采纳并沿用至今。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在乎“老”、“小”之间的表面差别。法国作家大仲马和小仲马爷俩，在传世的画像中，儿子白胡子一大把，比老子还“老”。第三个原因是：中文的“丁”字有“人”的意思，“小丁”即“小人物”，这倒符合我这一辈子的基本经历——尽管成名较早，但始终是丁“小人物”，连个头儿也是矮的。

受张光宇的影响大于父亲

我祖籍浙江嘉善。祖父是个读书人，家中没有田产。父亲小

时，从祖父学过一点“千字文”之类。12岁时，父亲独身背着一个小包袱，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一个当铺里“学生意”（做学徒）。干了10年，一直干到能上柜台写当票。10年中，他在晚间通过函授自学绘画。22岁时成为画家，最初在《神州日报》发表漫画，又在“生生美术公司”出的石印的画报中做编辑。稍后，给当时畅销的《礼拜六》等杂志绘制彩色封面，内容或是滑稽画，或是美女图，很有点名气。刘海粟1912年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我父亲应刘之邀，担任了该校第一任教务长。

父亲长我25岁。从我记事时起，他的职业是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因为每月有固定的薪水，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画广告的工作不累，但需要每日定时上下班。父亲就在办公时间干“私活儿”——为社会上的报刊画漫画。父亲在家里是不画画的，偶尔星期天画一张，可我一凑上去，就被他厌烦地轰开了。但我们这个家中，有画的书报很多，父亲朋友中画画的人很多，这无形中给了我很大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到处“涂鸦”——比如，在画报人物的脸上添个眼镜或加两撇小胡子，就可视为我最初的“创作”。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的是儿童画，画的是戏台上演《空城计》的情景。署名是：“画家丁幕琴（父亲的字）先生之公子（六或七岁）”，旁边还有“公子”的图照。

父亲当时与上海许多漫画家创立了《漫画会》，《漫画会》的牌子就挂在我家大门上。这些朋友是：张光宇、叶浅予、黄文农、鲁少飞等，其中张光宇、叶浅予与我家同住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天祥里”。我时常到张光宇家去看他画画，并且翻阅他的外国画册，欣赏他房里“陈列”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品，而这两类东西恰是我父亲所没有的。光宇待我很好、很亲切，在某些爱好（比如京剧）上与我又完全相同。他当时曾为时代图书公司设计过一套京剧人物的脸谱造型，可轮换插在日历的底板上，作为装饰，在那套脸谱中，有几个就是我帮他描绘的。因为那时，我也喜欢在戏园子看戏时当场“记谱”，同时也搜集、临摹画刊发表

的“大花脸”剧照。因此不妨说，我虽然生长在一个画家家庭，却没有受到父亲的直接传授。幼年间，我主要是对父亲周围那一种绘画气氛的感受而亲近了绘画。在这种气氛中，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莫过于张光宇。他长我16岁，我一直尊称他为“伯伯”。

漫画也要有“师傅”

我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向社会上的报刊投稿。最初是投向上海《新闻报》的“本埠附刊”，它每周都有一个漫画专栏。我这时开始拿到稿费，尽管每幅画仅一元钱，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就蛮开心了。后来，投稿范围逐渐扩大到专门的漫画刊物，如：《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在上海，先后涌现出来的。

任何绘画都包含内容、技巧两个方面。作为漫画来说，好像对技巧的追求和把握可以不那么严格，仿佛一幅漫画的成败关键，主要在于其立意构思。这种带普遍性的观点似乎还有事实论据：许多有名的漫画家（如张光宇、叶浅予乃至我父亲），都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自学成才的。我就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走上画漫画的道路的。最初感到很“自由”——有感于生活中的某一现象，随手画出并发表了，这种时刻常常会自鸣得意。但是画着画着就感到力不从心了。这个问题是我们那一辈的年轻漫画家所共同碰到的，大家都感到了苦恼。怎么办？看来只有根据各自的爱好去各自投师了。由于漫画形式属于舶来品，所以就参考外国漫画家的作品。在30年代的上海，进口的欧美画刊种类很多，各国漫画家不同风格的作品也都看得到。于是，华君武找到线条活泼、简洁的俄国的萨帕乔和德国的白劳恩，张光宇、张仃受到墨西哥的柯伐罗皮亚斯夸张的色彩和变形技巧的影响，蔡若虹、陆志庠找到揭露社会黑暗面的素描大家——德国的乔治·格罗思，我的“师傅”则有好几位，他们是美国的版画家肯特和漫画

家格鲁泊。当然，这只是最初一段很短的时间，由于中外题材内容不同，技法也不可能照搬，经过消化，以后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中学毕业，因家里弟妹多，无力供我升大学，面临着生活的三岔路口，到底何去何从？本来，父亲对于有我这样一个能画画的儿子颇为高兴，如今见我当真打算以此谋生，他却坚决不赞成了。原因之一是画画收入小，又不固定，难以帮助维持大家庭的生活开支；原因之二，是漫画太容易得罪人，弄不好就会进退维谷。但我就是喜爱这个“自由职业”，也深知自己绘画的基本功不够，于是在中学毕业后的近一年中，时常上午到上海美专去画素描石膏像，下午则去画人体速写，以此来提高我的绘画技巧。

走上社会

1935年，19岁的我取得第一个职业，在上海《小晨报》做记者，副刊是由我父亲的朋友姚苏凤主编的，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做一两个插图。叶灵凤当时有一部长篇小说《永久的女性》在《小晨报》连载，即由我做插图。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那时在江湾体育场举行，我每天去当速写记者。这项工作不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在报馆，两三小时干完了就回家。只做了几个月，《小晨报》因得罪了国民党中央什么人而被查封，我这第一个职业也就告终。在《小晨报》尚未结束时，我就得到了做画报编辑的兼职。当时上海的“新华电影公司”和“联华电影公司”分别请我的朋友龚之方和唐瑜为他们办电影宣传的画报。我就为这两个画报做美术设计工作。我参考外国电影画报的编排，连编带画——画明星像、画电影中的场面，也画以电影为题材的漫画。这项工作不需坐班，我都是抽时间在家里完成的。

1936年下半年，黄苗子介绍我进《良友》画报当编辑。当时上海的画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上海人办的《时代》系统，一是广东人办的《良友》系统。我是上海人，却经广东人黄苗子的介

绍进了《良友》。画报是大型的，编辑部却设在很小的一个阁楼上。我每天上午去上班，边干边学，从英、美和苏联的大型画报中去“偷”有关的知识、技巧。编辑之余，我仍热衷于漫画创作，鲁少飞的《时代漫画》编辑部及张光宇的《上海漫画》编辑部，都成为我们漫画界朋友的聚会之所。1936年，我们在大新公司楼上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我有两件作品参加，其中一件还被外国人买去。

1937年上半年，我应聘到上海晏摩士女子中学任图画课教员。我父亲曾在该校任过图画课。此时该校教务长请我父亲介绍美术教员。我父亲回答：“我现在没时间教课了。如果要我推荐，我儿子就会画画……”教务长当即答应了。我后来听说，当时就着了急，因为晏摩士是一所贵族式的女子中学，校规极严，高中女生的岁数或许比我还大，而我又无丝毫的教学经验……但“父命难违”，我终于在父亲的“押解”下去上第一节课了。我本来准备了许多有关美术知识的话，没想到十几分钟就都讲完，剩下的时间我就和学生在沉默的尴尬中度过！但第二节课一转入实地绘画，我顿时感到轻松。我除了向学生示范绘画要领，还随时走近一个个座位去提示学生，或径直修正学生的绘画。渐渐地，学生都和我熟了。一些年纪大些的女生经常一边绘画一边和我聊天儿，问我本周在市内都看了什么电影……因为这所女中位于上海北郊，学生们从周一到周六都住校，过着枯燥刻板的学校生活。

在这段时期内，我每日上午去《良友》，每周两个下午去晏摩士，所余时间或编“新华”、“联华”，或为上海的刊物画些漫画，这无论是对我个人的心理感觉，还是对父亲支撑家庭的实际补助，都是很可以满足的了。

“八·一三”使我的生活改观

是“八·一三”打破了我个人心理上的满足。在“八·一三”之

前，我的漫画中固然有爱国的积极主题，但就总体来说，实不乏小市民阶层的趣味。“八·一三”使社会风气顿时振作起来，一向发彩色美女的《良友》封面，也改换成刊发抗日将领的照片了，沪战期间我还参与编辑了良友公司出版的《战士画刊》和《战士画报》。前者五天一本，稿子随来随发，紧张得很；后者是月刊，曾经出过八路军特刊，朱德肖像被用于封面。同时，漫画界同人编起了《救亡漫画》（五日刊），我在这张四开报纸上，发表过四幅的连续画和两个整版的封面画。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我的思想和以后的生活道路。

这种紧张的新生活，一直延续到上海沦陷。这时，张光宇和他弟弟正宇准备离沪赴港，我也向父亲提出要跟他们一起走。因为《良友》画报出不成了，“新华”、“联华”两家自然也停了，晏摩士地处上海北郊，战争中成为一片废墟……总之，我刚刚在上海打出的一点“天下”，一刹那化为乌有，再加上上海沦陷，迫使我决心去香港闯荡一番。对我要走的决心，父亲先是舍不得，因为我自出生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一旦离开，他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但是同时父亲对我这半年来忙于积极抗日又有些怕，怕惹出大麻烦来。我就在父亲的这一种矛盾心情当中，于1937年底与张光宇兄弟等一起登上一条法国船赴港了。出乎意料，我一上船就遇到《良友》的老板余汉生。他告诉我早把《良友》画报的总编辑马国亮派往香港筹备出版之事。余要我一到香港就去找马国亮，仍然去编《良友》。这样，我在离沪的一刹那，未来生活的轮廓又变得清晰了。在我到达香港的第三天，我就上了班。而资深年长的光宇兄弟，还得一切从“零”开始。

港岛风云

与我们前后脚，上海有不少文化人来到香港，使这片冷漠的文化荒岛陡然热闹起来。因为这里的印刷出版条件比内地好，于是很

快就成为对海外宣传抗战的有利阵地。

1938年，叶浅予由武汉来到香港。他所在的国民党三厅要印一部画册《日寇暴行实录》，照片大部份是从日寇俘虏身上搜出来的奸淫烧杀，狂轰滥炸的罪恶实况，考虑到香港印刷条件优越，所以由他把资料带到香港来编辑出版。我和叶住在一起，帮他设计版面。叶浅予原是“漫画宣传队”的队长，来港后他组织旅港画家画抗日宣传画。为了便于巡回展出，这些画得画在布上，而且尺寸很大。画大画与昔日作小幅不同，就很需要有一些素描的基本功，幸好我在上海美专画过半年，如今用上了。这种宣传抗战的绘画展览在港搞过两次，第一次宋庆龄来看了。她买了我的一幅作品《流亡图》，并与在场的画家们一起合影。这幅画后来被“保卫中国大同盟”印成招贴画。第二次展览我也参加了，我画的一幅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正义的同情与援助》，后来用于《今日中国》画报的封面。说起《今日中国》，是叶浅予在港主编的一本对外宣传的大型月刊画报，有英、法、俄、中四种文字。叶君健、爱泼斯坦负责英、俄文本的文字翻译，法文版的译文归戴望舒，画报的具体编辑、设计工作，则由叶浅予出点子，我帮着做具体的版面设计工作。

《良友》画报在香港出了几期，老板看到日军侵占上海后没有进入租界，于是把《良友》搬回了上海，因为成本比香港便宜。马国亮和我不愿回到上海沦陷区，就和李青一起创编与《良友》类似的《大地》画报，找香港代销《良友》的书商“美美公司”垫钱印制，待出版后拿画报还给他们。《大地》的基本内容也是宣传抗日的。这个画报一直出版到1941年冬香港沦陷。

我在香港的四年中，除了编画报外，还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晚报》画过100套连载的漫画《小朱从军记》，在党领导的《华商报》上发表了我在仰光画的20幅组画《而公路依然伸展着》。此外，我参加了皖南事变后，由重庆撤到香港的进步电影戏剧界人士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做舞台设计工作。

转赴内地

港岛作为抗战阵地固然如火如荼，但我的内心也颇矛盾：因为既然要抗日，就应该迎着警报、冒着轰炸，回到内地去展开工作！常住香港这个“世外桃源”，对自己没有好处。在这一种心情的驱使下，我从1939年起三赴重庆，随后又转入成都，一呆就是两年。内地条件差，漫画只能用展览的形式，直接与读者见面。在渝期间，我参加了题为“香港的受难”的画展，作者都是从香港沦陷后撤出来的，如浅予、特伟、郁风、新波和我等九人。不久我又参加了由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廖冰兄、特伟等10人组成的“漫画联展”。靠画画没法生活，于是我就转业搞话剧舞台的美术设计。在重庆我设计过《雾重庆》、《祖国在呼唤》、《北京人》、《家》等剧的舞台布景，至于具体的知识是向原来的美工师和工人师傅请教来的。在成都的两年，是我创作欲最高，创作成绩也最显著的两年。我与吴祖光等化装探访了成都最下等妓女的麇集之所，归来画出彩墨漫画《花街》，我应《华西晚报》副刊负责人陈白尘之邀，画出24幅《鲁迅阿Q正传木刻插图》；旅行西昌，画了一批彝胞素描；最后，又画出了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现实的《现象图》。我曾为“怒吼剧社”的《牛郎织女》做过服装设计，还在四川省立艺专教过素描课。

业余的“专业”——吹笛子

在成都演出《牛郎织女》时，耿震在剧中饰牛郎，剧中有他当场吹笛子的场面。当耿在台上执笛做吹状时，贺绿汀《牧童短笛》曲调却从侧幕飘了出来——那是我在吹。张瑞芳饰的织女现场演唱“织女之歌”，我也是从旁伴奏。整个演出期间，我成了业余的“专业”乐师。

我为何会吹笛子？早在上海读中学时，由于父亲是位京剧迷的缘故，我不但常进剧场去看，也常从收音机和唱片上去听。我嗓音不行，便用一把胡琴和一杆笛子用耳朵和手指摸索着学习伴奏，不求精通，自得其乐而已，不料后来还屡次派上用场。我用笛子首次为人伴奏，是1940年二赴重庆时，为一位叫周志斌的名票彩唱《雅观楼》和《夜奔》帮忙，因为他在上海时，曾跟我说过这两出戏。当时笛子有两根，一根是著名昆曲艺人方传芸，另一根就是我。两根笛子居然能够合拍，使在场的田汉等人大为奇怪。

在“怒吼剧社”离开成都之后，我又用笛子为“中华剧艺社”的《桃花扇》帮忙。秦怡在剧中饰李香君，要当场清唱一段《牡丹亭》。实际上是由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张允和在幕侧代唱，我在一旁以笛伴奏。张允和家学渊源，唱起来当然韵味极佳；我学笛本无师承，只是当时找不到专人，我才每天晚上去后台干这差使的。

上海的民主运动

1945年10月，我重新又回到上海。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民主运动的一派高涨之势。这时革命及进步的报刊极多，有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主编的《文萃》，甚至共产党直接办的《群众》也公开出现于大庭广众。我仍然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此期间除了为上述刊物画了大量的讽刺漫画外，还和吴祖光合编了《清明》月刊，一个图文并茂的杂志。凤子主编的《人世间》月刊的封面和美编，也是我担任的。此外还为《升官图》等舞台剧做布景服装设计，为“文华”电影公司画电影广告，靠它来养活家口。

《周报》封面的四分之一地位，用来刊登醒目的讽刺漫画。从我回到上海直到1946年秋该刊被查封之前的将近一年的时间

内，这个封面画成了我的专栏。《群众》第一期的漫画也是我画的。我还在陈翰伯、刘尊棋等主编的《联合晚报》1946年底的那期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送旧迎新”的一专版漫画，并配有袁水拍写的“讽刺山歌”。为《民主》也画过几个封面。登有讽刺画封面的刊物常常一送到报摊，即被国民党雇佣的流氓撕毁。

在上海，陈秋草、庞薰琴、吴作人等人和我成立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团结广大的美术家们，在“大新公司”举办过两次“联展”。其目的主要是与国民党御用的美术组织唱对台戏。“上海美协”和“漫协”，不仅列名参加各种进步活动，还常常集体为某些大会画大幅的人物画像，如纪念李公朴、闻一多被刺的追悼会，纪念鲁迅、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大会，我们都用大白布绘成巨幅画像，悬挂于主席台或会场中。由于我是个人所共知的“自由主义者”，活动起来比较方便，上海“美协”、“漫协”的图章就放在我家的抽屉里，乔冠华、陈家康住在马思南路“周公馆”，我也敢和他们来往。我和吴祖光还与陈家康一起看过几次京戏。

1946年，欧阳山尊、李丽莲自延安来到上海，他们表演秧歌《兄妹开荒》，我给他们吹笛子。戴爱莲同年在上海举行个人舞蹈表演会，我也为之打鼓，吹笛子。我讲这些，不是显示我的“音乐天才”，只是想说当时年少气盛，只要工作需要，而“大将”们又不屑或不敢做的事，我“小丁”就顶着上。前年，有人听说我会吹笛子，要我吹一段听听，我40年未拿过笛子，一试，发觉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毕竟是老了。

话再说回来，正因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国民党加紧了政治高压。在1947年秋，以宋庆龄的名义在沪举办了一次“中秋游园会”，组织了许多电影、话剧、戏曲演员进行演出，我担任联络工作。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为上海文化人的撤离筹集经费，我为之竭尽全力，可能是形象“过于突出”，受到了“注意”。不久，地下党的叶以群、戈宝权便通知我，要我迅速离沪赴港。叶并安排我陪茅公乘船离开上海。这样，我再次到了香港。

在等待祖国召唤的日子里

到达香港之后，我找到的职业是在永华电影公司画海报。反映解放战争的长卷彩色漫画《现实图》，就是1947年底在港画的。1948年香港演出歌剧《白毛女》，严良堃指挥的乐队找不到吹中国笛子的，经夏衍推荐，我的笛子又派了一次用场。

1948年底，周恩来同志向香港的党组织发了一个电报，开列了一批文化人的名单，要他们去解放区。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夏衍便问我去不去，我答：“当然要去！”我们虽然远在祖国的南大门，但都已深深感到祖国即将新生，感到祖国在召唤我们，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就是具体的体现。1949年初，天津、北平次第解放，我和阳翰笙、于伶等一大批文化人，乘宝通号直达天津塘沽转赴北京。

我们刚到北京，周恩来同志就来到饭店看望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并专门介绍了三大战役的情形。在接见中，周还很随便地问我关于建都在哪里的意见，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如果建都南京，倒是离我家（指上海）近；可是北京气魄大，建都在北京好！”举这一个小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那个时候心情的欢快，和上下级间的无拘无束。

在这次谈话后，我先后参加了第一届青代会和文代会，随即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联欢节。从此，我成为这个兴旺大家庭中的一员了。

简单的结束语

我在解放后的经历就不细说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三项专业和一个爱好，仍然如转蓬般飞旋不止。不过舞台设计不搞了，代替它的是组织大型展览会，如1950年的《五四青年运动史料展览会》；

1953年的《反对美帝细菌战》展览，以及60年代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和去日本的《红楼梦展览》等等。

建国伊始，我从苏联参观后回到北京，廖承志同志早已在等着我了。他告诉我组织上的决定，要我筹办《人民画报》，因我过去干过这一行。我本来是想今后专业画画的，可那时候最兴“服从组织决定”，于是就愉快地答应下来。本职工作是编画报，漫画就只能业余时间断断续续画一些。笛子，似乎是在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的那一晚吹了最后一回，因为欧阳老（予倩）要清唱《思凡》，座中找不到合适的人伴奏，于是我便挺身而出……笛子后来不吹了，但胡琴又跟上了——1951年“五一”节在朝鲜战场司令部的坑道里，我为一同前去慰问的侯宝林用二胡（因没有京胡）伴奏过《萧何月下追韩信》。京胡一搁几十年，直到“文革”之后在一次政协委员自己临时举办的联欢会上，我又被“将了一军”——为李万春清唱《连环套》进行伴奏，又用的是二胡。与操琴的情况相类似，我的画笔自1957年后，一搁就是20多年。当然，这些均已成为历史，而且也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遭遇。

我的三项专业和一个爱好，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拜过“师傅”，都是从爱好开始，一点一滴地摸索出来的，这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逼出来的——那时人才少，也没有专门教“漫画”、“画报”、“布景”的学校，所以能凑合，就干了再说，一边干，一边学。我就这么应付着过了大半辈子。联想到今天有那么多的艺术专门学校，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才，使我既羡慕又生不胜今昔之叹！

以上的问题与感受，是我从转蓬般的一生工作和艺术实践中提析出来的，或许对年轻同志还能有一点启发吧。

（徐城北 整理）

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李默庵

1939年2月，为贯彻国民党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作战的决定，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湖南南岳创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本文作者作为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忆述了该班的组织、训练概况。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是专门训练用游击作战方法，到敌后去打击入侵我国的日本侵略军的组织，同时也是国共两大政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而具体的产物。我忝为该班主要负责人之一，至今印象深刻。

南岳第一次军事会议

自1937年7月7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挑衅而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到1938年10月底，我国东部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处，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在各战场抗敌的战斗中，我军虽不顾牺牲，奋起战斗，终以装备过于悬殊，纯凭血肉之躯难抵猛烈炮火，其牺牲之壮烈与惨重，是史无前例的。

在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

日，在湖南南岳召集南中国战场参战的各高级指挥官，举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并邀请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氏及叶剑英氏。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重大决定的要点如下：

- (1) 决定长期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 (2) 利用广大国土，以空间换取时间，争取长期抗战，以困敌人。

(3) 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改变过去以占领要地即为胜利的旧战争概念。纵如首都南京及其他要地陷敌，而我们仍占有被敌占领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和人民，以包围敌人，增强全国军民对敌长期抗战的认识和信心。

(4) 界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作战，以正规战为主。以失地过广，划分为敌前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前以正规战为主，由国民党军担任；敌后以游击战为主，由共产党军担任，国民党军亦以一部分任。形成全国全面对敌人的作战。

(5) 在敌人所占地区，随时予以攻袭，积小胜为大胜，使敌枕席难安，必须处处设防，因而占地愈广，力量愈分，时间愈久，消耗愈大，这是敌后游击作战的主旨。当时应乎需要，曾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以增强各方的注意。

创设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贯彻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游击作战的决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在湖南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施以短期训练，倡导游击作战在对敌第二期作战中之重要性。为特加强各方注意，由蒋介石氏自兼班主任，派汤恩伯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并商请中共同意派叶剑英氏为副教育长，共同主持之。

游干班在组织上直属于国府军委会。因系短期训练班，仅常设一个班本部，分教务、总务、军需、军医等处和一个政治

部①。任用专职人员，处理该班一切事务。其担任该班军事政治等教育课程者，均系向各专门机构调用。担任教授游击战的军政课程者，以叶剑英所率的中共代表团为主，驻班担任之。该代表团共约30余人，其约半数为任教者，半数为办事人员。该代表团后于1940年2月底撤离。

游干班训练的时间为3个月，其训练时间的分配，军事为55%，政治为45%，均以训练游击作战为主旨。课目有游击战术、游击战斗的实战演习、爆破技术、游击部队政工、民众运动等等。

该班第1期召训各战区中级现职军官1100人②，编为1个总队，2个大队，8个中队。其总队长大队长由现任军长师长中临时派任之，中队长及其以下干部，由受训人员中选派之。第1期于1939年2月25日开学，一切依原定计划顺利进行。

在1939年4月间，因河南战场的需要，本班教育长汤恩伯奉令回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原职，率部驰赴河南作战。蒋介石氏即令我接任该班教育长。我自抗战开始，率军参加晋北忻口会战后，移驻晋南之中条山地区。时任第三十三军团长，辖第十四军及第九十三军，以攻袭同蒲铁路南段之敌为任务。当时华北战场重点在台儿庄，敌我双方均向该处增兵。本军团正面无重大情况，等于休整状态，故蒋氏令我接长该班。

我于4月初奉令离晋，经重庆谒蒋后，于4月下旬到达南岳，于5月1日正式接任该班教育长职务。其组织与人事和教育等一切均依原定规矩照常进行，毫无变动。

第1期于5月25日③圆满结业，学员仍各回原职工作。随即作

①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该班组织编制中多总队部、机要室编制。

②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第一期招收学员为1046人。

③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第一期于5月15日结业。

第2期之召集，一切仍照第1期办理。第2期学员约500人^①，编为1个总队，4个中队^②，于6月20日开学。

在第2期训练期间，规定主修的游击战课程，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执教诸同志，在叶剑英氏的领导下，热忱执教，甚得好评。叶氏亲自主讲的课程，因他经验丰富，且善于辞令，深入浅出，更受欢迎。

在此期间，我还特别邀请了周恩来先生（当国共合作开始抗战后，周氏以政治部副部长名义驻重庆协助工作）来班驻留1个星期，作了多次讲话，使听众深受鼓舞。

第2期学员于9月20日训练期满结业。第3期的召训办法略有变更。除仍召训各战区学员600名，编为4个中队外^③，另在各地区招考高中毕业生600名，编为4个中队（内女生150人，编为1个女生中队）。是以本期遂编成1个总队，2个大队。第1大队为学员队的4个中队，第2大队为学生队的4个中队。其训练的课程，学员队仍依照第1、第2期的计划施教，学生队则另加军事基本教练，训练时间则改为6个月1期。第3期1939年11月1日开学^④，其学员队于1940年2月1日结业^⑤，学生队则继续留班受训。

由于敌人飞机的侵扰，游干班于1940年3月全部迁到祁阳^⑥，继续办理。于4月1日改为西南游干班，南岳游干班从此结束。

总结南岳游干班自1939年2月第1期开学起到1940年2月第3期学员队结业止，共招训来自全国南北各战区的学员约2000人。该班在开辟敌后战场，倡导游击作战的重要性，增强长期抗战的信

①②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第一期于6月15日结业，第二期学员为530人编为5个队。

③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第三期招收学员1459人，编为10个队。

④⑤⑥ 《民国档案》1991年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文中第三期于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底结业，游击干部训练班于1940年夏迁至祁阳。

心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由叶剑英氏所讲述的，游击战中之军民关系如鱼和水一样，一刻也不能脱离的比喻，使各方印象深刻。

1986年9月28日于美国华盛顿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

——回忆参加研究日本密电码的前前后后

王维钧

作者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后长期从事对日无线电报侦察活动，作者在本文中用亲身经历介绍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三十年代对日情报收集工作的具体情况。

密电检译所的成立

我于1932年夏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对口就业极为困难，经光华教授颜任光老师的介绍，参加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工作。局长为温毓庆氏（以下简称温），温氏早期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温与颜都熟习无线电技术业务，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真如国际电台是由颜温二氏于斯时共同筹划建立的。颜当时系交通部电政司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策划侵略并吞我国的阴谋，其使领馆遍设在我国大、中城市，有时还深入内地探测各种情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自行秘密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直接与东京外务省通报联系。日本使领馆人员通过各驻地的我国电报局拍发电报极

为频繁。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野心和行动，严重地打击了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内一部分显要就打算收集对日情报工作，以维持其统治政权，并做为对日交涉讨价还价的依据。

1934年秋初的一个星期天，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长温毓庆约我到他的上海住宅，说有事和我商谈。我如约去后，温首先向我谈了很多抗日的道理，接着他拿出一张日本外交密电报底，问我能看懂否？我说看不懂。温就接着说：“对日战争，迟早是要打的，宋子文部长已向蒋委员长（以下简称蒋）谈过，要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码。我已用英文写好一份建议书，请你翻译成中文，并用正楷抄写在手折^①上，由宋部长转上去。”温毓庆最后叮嘱我说：“这件事务必严守秘密。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有生命危险^②。就连你的妻子也不能讲。”我听后，心情极为兴奋。就很认真地将温所写的建议译成中文，并用毛笔工整地写在手折上。这次谈话是用英文进行的。温的英语很好，英文很通顺，但中文不行。我写好后交给了他，就告别返家。记得当天上午为完成这项工作，连午饭都忘却了。在返家的途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学生时代参加了抗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运动，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些抗日的切实的工作了。

手折的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除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上海电报局和国际电台所拍发的来往密码电报外，还要逐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中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的密电。香港电报局是由我国政府管辖的，也可收集香港日本人来往的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

① 手折是当时流行的下级向上级提建议的一种小册子，约同现在小本工作本大小，用一整张纸遇长折成数页。

②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到处横行，并可随时暗中将中国人逮捕杀害。

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成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等以后有了成绩再行发展等语。

事隔两月未见动静，我曾向温探询那个手折是否已批下来了？温说没有。

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次改组，原交通部长朱家骅去职，改由次长俞飞鹏代理部务，同时颜任光辞去了电政司长职务，蒋介石手谕任命温毓庆为交通部电政司长。温毓庆由上海去南京就职时，亦将我带去南京，任交通部技士，在电政局办事，实际是做他的秘书工作。当时由于这项秘书工作十分繁忙，已无暇考虑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之事。

我在电政司工作四五个月后，温毓庆才告知，那个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建议，已经蒋介石批准了。定名叫密电检译所，是一个极为保密的机关，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幢比较僻静隐蔽的二层小洋房，并有一个小院落。

估计蒋介石手谕温毓庆任电政司司长之时，也即批准温毓庆研究日本密电码之日。密电检译所的成立约在1935年初。

温毓庆嘱我白天仍和他在电政司工作，晚间和他去西桥七号研究日本外交密码。每日下午，我从电政司下班后，赶回家吃了晚饭，就匆匆忙忙去到西桥7号。对家人讲，我是去教晚课。每晚都要搞到11时至12时才离开。温毓庆也亲自参加研究工作，每晚同样搞到深夜才离去。

顺利地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

温毓庆系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留美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在蒋介石内战中，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那时，一般人士都认为他背景很硬。温毓庆曾和我谈过，在

蒋介石与唐生智交战中，他曾截获了唐生智的一份密电，哪知系唐颁发的一个月的军用口令。由于蒋介石获得这一情报，因而能出奇制胜。温毓庆曾为蒋介石在蒋、桂，蒋、阎，蒋、冯的内战中，破译过不少密电码，提供了适时的情报。有助于蒋的胜利。一说因温向蒋索取1亿元高额报酬而激怒于蒋；一说因其内部人事倾轧，温放弃了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交给其妹婿黄季弱负责，改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以下简称毛）领导。定名为“中文股”。当时的中文密电码变化极其简单，多采用加减法，破译容易。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则难度要大得多，组织变化要复杂得多。

在温毓庆就职电政司司长之后，电政司就秘密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电报局和上海国际电信局，将当日所有日本使、领馆人员所交发的来往密电，每日抄送报底1份，寄至电政司。香港电报局的报底是温毓庆去香港联系的。这些都是研究的原始材料。起初，这些寄来的大宗报底均交温毓庆收存。自从他叫我参加这项工作后，每日这些报底改后由我收集，每晚带至西桥7号。

我去参加加密电检译所工作时，西桥7号已有3人在工作，再加上温和我，共5人。其中有1人系日本留学生，名叫霍实，广东人，与陈铭枢有交往，曾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逃来南京的。一人系交通部电政司日文报务员，名叫叶钟骅。一个姓连的负责行政事务工作。那时的工作还没有细致分工，都是大家一齐动手来做，但也各有重点。熟习日语、日文的人偏重研究日文、日语在电码中的应用；温毓庆和我均不懂日文、日语，就研究其密码的组织构造。我们首先在大堆的报底中先找到报头标志，分门别类地归类，然后做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研究其密码如何构成；日本的电码不像我国的电码是用数字来表示，它是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它是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日文的片假名字母的编码，然后再进行任意的、不规则的各种变化来迷惑他人。这种变化有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但使用次数多了，总

有一定规律性可循，深入下去，就可将其逐个解决，顺理成章。将其杂乱的变化的组织理顺后，再根据其字码出现的多寡，词字出现的多寡，及其文字在电报中的习惯用法，按照一个国家语言、文字使用频率曲线，就可研译出电文的全文。密码的诀窍在于不时的变换，又能迅速的译出。破译的可贵，贵在于一二日内和寥寥可数的报底中迅速解决。

抗日救亡，是人心所向。国家民族的观念，当时紧扣着人们的心头。因此，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大家情绪高昂，干劲很大。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才散，温亦伴随我们到深夜。密码检译所成立不久，就很快破译了两种日本外交密码。记得我们工作不久，即归纳研究出一种LA密码。这个LA密码组织是比较简单的，是日本外交人员在国外使用的一般通用密码，通报一些日常工作之用。这个密码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更换。因此，密电检译所能逐日译出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情报，历久不断。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起初逐日送至机要室毛庆祥转蒋介石。当时军统、中统也争相研究日本外交密电，但始终无一突破。译出的日本外交密电的内容，大致是日本外交人员的来往行踪和调动，使、领馆的经费等，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对华外交上来往的意见。这时正是日帝进一步攫取华北，蒋搞何梅协定之时，破译了一些有关日本在这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对蒋并未起多大作用。丧权辱国的外交，本无外交可言，至多作为蒋在出卖华北主权上和日帝作讨价还价之用，华北还是被出卖了。

此时，温毓庆叫我为他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除报功外，报告日本外交密电码已能破译，并要求扩大组织，增加人手，增加经费。蒋介石不久就批准了。

扩大规模，自行设台

这时日本比较复杂和重要的外交密电码尚不能破译。在蒋批

准扩大组织的报告之后，温毓庆即着手网罗人才。1935年秋，我的表兄，光华大学同学杨肆（光华数学系毕业，以下简称杨）在南宁广西大学任数学助教。因他在数学上对排列、组合方面有些研究，温毓庆即同意他来密电检译所工作。杨来后，我因交通部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即向温辞去密电研究工作，交杨负责。我仍做为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电检译所的秘书工作。

杨肆来后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人员的比较复杂的和比较重要的密码组织。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可以从破译的密电中获悉一二，从而可以获悉日帝对华的一些动态。并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大使馆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和东京外务省直接作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吞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双方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领馆人员下旗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就随之断绝。温于是决定，一面在鼓楼附近设台侦察日本在南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的对外通讯联系，一面自行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抗战发生，进一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其重要的。

温毓庆在电政司下设立一个侦察电台，指定一位工程师负责，配备军用收报机两部和定向装置，由日文报务员数人，日夜轮流侦察日本大使馆无线电台的所在。叶钟骅曾参加这项工作。温毓庆同时与军统通讯科长魏大铭（以下简称魏）^①联系，亦派人协助。不久就侦察到日本大使馆确实设有秘密无线电台，并且就设在大使馆的院内。同时也就侦察到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

^① 魏大铭原系国际无线电台技术熟练的报务员，后应军统的要求，调给军统。

间等。进而侦察到日本东京外务省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国首都的大使馆的通讯联络网，都侦察到了。这就为密电检译所对日本外交密电研究，打开了广阔门路，发展了研究范围，并取得切实可靠的报底来源。

温毓庆还与康泽合作，在羊皮巷合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培训报务员30名，为自行设立侦察电台，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作准备。这个训练班结业后，未继续举办下去。以后报务员的来源是温毓庆委托魏大铭培训供给。

1935年底，密电检译所的研究工作已取得较好的进展，日本外交密电多数已能破译，自行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无线电台密电亦具备了条件。温毓庆再一次写报告给蒋介石，要求增加研究人手和报务员，自行设立侦察电台，侦收日本外交无线电密电，并要求发给一部分外汇向美国RCA胜利公司购买当时最新的军用收报机。这个报告也很快就被批准了。

1936年，密电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除电政司所属各地电报局抄送的日本人拍发的报底外，自己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伦。研译组聚集了日本留学生约六七人，其中有闵石麟、孟广治等，叶钟骅参加了研译组。在解决了日本密码的组织以后，由这个组研究出日本的明码电文，然后再译成中文，加工成最后的产品送出。研究组网罗了一批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约六七人。这时，我的光华大学同学杨贻清、李立民等相继被录用进来，他们都是光华数学系毕业。研究组进行各种密码的打字、分类、统计、归纳、分析、研究工作，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解破各种密电码的组织。只有密电码组织解破了，才能进一步研译出日文的电文，进而翻译成中文。侦察电台购置了军用无线电收报机约四五部，配备报务员

约20人。报底抄收质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抄收正确无误，才能促使研究人员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同时还有打字人员、事务人员和医生等数人。

密电检译所原在西桥七号的住所，已不敷应用，改迁至新市区山西路十四号两栋较大的两层楼房，研译、研究两组各住一栋。在撤离西桥七号时，我将住宅内外，前前后后，彻底清理一遍，将所有不需要的文件资料彻底焚毁，不留痕迹，因为这个机关当时还需要极端保密的。

当时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电政司收集来的报底和自行抄收的报底，每日有100份之多，均送给研究组进行分类打字，由各研究人员解破其密码组织。凡已破译的密电码报底，即送至研译组译成中文。由研译组复写3份，1份加火漆固封，由专人每日送至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由他转给蒋介石。另1份加火漆固封送交我转给温毓庆阅看。而后退还给我归档。另1份留研译组存档。此时每日译出的成品达50—60份之多。

在筹办初期，密电检译所的经费每月大约为1800元。有一次温的财会人员不在，温毓庆将蒋介石的手谕交给我前往军需署会计科具领。手谕写明“发给温毓庆特别费1800元”，下署“中正”二字。估计初期每月经费大约如此。及至1936年，密电检译所共约有人员40余人，经费大约已增至5000余元。

七七抗战和南京撤退

进入1937年，对日形势日见紧张。我们的工作亦随之紧张。但大家的情绪是异常饱满。因为抗战很快就要爆发了，因而我们的工作也很有起色。日本东京外务省对华交涉上的一些指示，可以从破译的密码中获知一二，日本外务省和巴黎等国外大使馆的通讯也能破译。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抗战形势，全面掌握日本外务省的通讯联络是十分必要的。这时，军用收报机迅速增加到20余

部，报务人员增加到50余人左右。同时筹备自己的通讯联络电台，为今后战时分开通讯之用。这些新增加的报务员均委托魏代招代培的。电台台长原已是魏的推荐。这就为军统后来染指这个机关带来无穷的后患。

我的表弟，也是杨肆的堂弟杨德基（后改名杨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青少年时期，思想就比较激进，清华读书时期，在清华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运动时，负责宣传工作，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每次放假回家，以及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下抗日时，路过南京和我们见面，有时寄宿在山西路十四号。杨肆曾将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转告给他。这是我们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初联系。

七七抗战终于爆发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救亡图存。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力量和智慧。日寇在进攻上海时，当时它原地兵力单薄，我们多次从日本外交密电中收到其从海上增援上海战争的消息，以及部队番号和人数，我们多么盼望能从海上予以拦截，消灭它，但这对蒋介石是无补于事的。这时，上海失守在即，南京亦将不保。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不考虑我们今后工作的安排。我们所依靠的国内各电报局抄送的日本外交密电行将断绝。温毓庆于是决定全力侦察、抄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国际无线电通讯和日本国际无线电台的通讯。并准备进一步侦察日本在华陆、海、空军的无线电台，研究在抗战中的日本军事密码。同时，建立了自己通讯用的联络电台。俾将来分散后的通讯联系。香港电报局的报底此后尚可陆续寄到。

进入9月，南京形势更趋紧张。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交通部先撤至汉口，再去重庆。电政司大部人员迁至重庆，一小部分人员则随蒋介石的行营撤至长沙。10月初，我随电政司一小部分人员首批乘江轮去汉口转往长沙。在我从南京撤退之时，电政司人心惶惶，各自料理自己的私事。办公室内的一切文卷档案无人过问。为了不让这些文件在日军占领南京时落入敌人之手，

我曾将档案柜内的文件亲手予以销毁，不留痕迹。

在我撤离南京时，密电检译所撤至何处，请示蒋介石时，未做定案。我们于是决定，将研究、研译两组随蒋介石行动。侦察电台撤至长沙，以后用自己的电台通讯联系，专人传送抄收的报底。

我到长沙后，即为侦察电台租了一栋旧式大宅院。对外名义是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侦察电台不久就由南京迁来长沙。研究、研译两组11月间迁至汉口。电政司在长沙的一小部分人员于1938年初又迁至汉口，与交通部合署办公。我亦随之来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长沙未动。

在长沙、汉口的一段时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空气十分浓厚。这直接推动我们工作的进展。这时，日本外务省与世界各国首都大使馆的无线电通讯密电几乎全部能侦收到，并可从日本国际无线电台抄收到一些日本外交密电。日寇在华的军用电台也能侦察到一些。香港电报局的日本密电报底则逐日由航空寄来。从所破译的情报中有时有一些蒋政权下的大员与日寇暗中秘密来往的消息。记得我们曾侦收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手下人员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姓名，其中有霍实的名字，我们十分惊讶。但此情报送出后，未见有任何动静。

在武汉，集中力量侦收日本军用密电

密电检译所的侦察电台以及和魏大铭的日常联系，以往均是由温毓庆亲自掌握的。我由长沙到汉口后，温就即改由我和他们联系，有些重要事项才请示温毓庆处理。我和魏大铭的相识，也是在汉口由温毓庆介绍的。在以后和魏的往来中即感觉到“军统”有攫取这个组织的野心。这时，侦察电台集中力量侦察前沿日军的军用电台，并已能掌握其前线各部队各自的局部的通讯联络和呼号、波长，以及呼叫时间。

在武汉时，国民党政府又经过一次改组，俞飞鹏辞去交通部次长和代理部务的职务，改由张嘉璈任交通部长。温毓庆的电政司长职务未动。温系宋子文派系下的人员，张与宋在宋夺取了张原先掌握的中国银行大权之后，彼此矛盾很深。张对温虽更换不得，但也是有成见的。加之电政司内部本分有两派，温是在北京邮电派的拥戴之下的。这时上海交大派（其领头的是CC系统）因政治空气的变化，就在内部掀起倒温的暗流。所以，温在交通部的处境就不佳了。记得1939年底，张欲派温出国考察电信业务，（这是当时一种较体面的更换职务的手法）。温要我写报告给蒋请示。随即由侍从室以蒋的名义用代电^①通知张嘉璈，说温司长公务在身，不宜出国。于是此议作罢。但不是问题的终结。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不宣而战。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全面抗战，南京日本大使馆不得不放下旗归国，在我国各地的日本使领馆人员不得不全部撤退。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恶的行为也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到达汉口后，大家认为密电检译所已没有作为绝密机关的必要。温是主张作为一个保密机关对待有利。这是内部一些人员对温有了矛盾的萌芽。大家认为，工作以来和家庭通信，说不出所在机关的名称，和亲友见面，说不出机关和职称，长期成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感到很不方便。希望有一个可以公开的名称对外。经请示温毓庆，暂沿用了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交通队的名称。有些对外联系工作，也就用此机关名义了。

和中共取得联系

在汉口时，研译组和研究组是租赁靠近郊区飞机场附近的两

① “代电”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公文格式，显示比一般公文重要，但不以电报方式发送，将行文抄录在“代电”纸上，以书信方式发送。

幢小洋房分别办公兼住宿的。我的表弟杨德基这时也来到汉口，由于研究组的人员不多，加之都是同学亲友，他又是杨肆的堂弟，所以他经常寄宿在研究组。大家不以为意。这时他已介绍杨肆和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同志王明见了面。不久，杨肆将此事告诉了我，并约我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同志。有一天晚间，我们3人一同过江前往汉阳一个茶馆的楼上，秘密与李克农同志见面。这个茶馆面临江岸，我们走上二楼，即见楼上仅有位戴着黑色茶镜的同志独自沿着栏杆面对江心坐着。我们3人走近后，德基将我们2人分别介绍给李克农同志。寒暄后，杨肆将日本密码组织的情况相告，告知系用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日本的片假名字母。我将我们侦察电台呈送给温毓庆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给李克农同志。这是厚厚的一本总结，内绘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以及在华日军前沿军用电台相互联络通讯的联络网，并有电台呼号，波长和通报时间以及文字说明。这个总结，按月呈送1本，温毓庆阅后即交我保存，封面注明电台台长梁伯伦和他的名章。李克农同志接过去后，即对我们说：“我们也要研究日本密电。”这是我们正式和党取得联系的开端。在武汉时，读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心胸豁然开朗，更加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

在武汉尚未沦陷时，我们家乡一些亲友和要好的同学，因不堪家乡沦亡，做亡国奴的痛苦，纷纷逃来汉口，甚至举家迁来。大多数青年亲友和同学均通过德基的介绍去投奔延安，其中有叶林同志夫妇等。举家迁来的路过汉口，前往重庆，成都定居，个别的以后又辗转到了延安，例如德基的全家。在当时我们是可以将这些青年、亲友、同学介绍给温毓庆的，因为那时研究日本密电也需要人。但看到国民党政府贪赃卖国，腐化无能，是没有光明前途的。

在桂林相继破译了日本海、陆、空军密码

在武汉沦陷前1个月，密电检译所即迁至桂林。我在武汉沦陷前1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衡阳，我也就到了衡阳。在长沙大火之后，电政司又从衡阳撤退到桂林。这条撤退路线是随着当时蒋介石行营的行动而行动的。

温和我在衡阳时，杨肆来看望我们。杨和温在一起谈话，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温把帽子向桌上一扔，对杨肆说：“你滚”。杨在气愤之下对我说，决定离开密电检译所投奔延安。吵后温和杨肆均去桂林。我仍和电政司人马留在衡阳。我考虑杨离开去延安也好，不打算挽回此事。过了一星期，温几次叫人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速去桂林。杨肆也来信要我去桂林。我到了桂林，温表示要挽留杨肆，杨也说研究组的同事不愿他离去，意思就留下来。这场内部的风波也就这样平息了。

南京撤退辗转长沙、武汉、衡阳、桂林之间，所谓戎马倥偬，对日军军用密码的研究未能专心致志，尚无成效。到达桂林以后，有一个喘息机会，温毓庆即着手侦察电台集中精力侦察抄收日本太平洋海军军舰无线电通讯联络。当时就侦收到了一些日本军舰的通讯来往，并可以从中获知其位置和调动情况，其密码也能破译。侵华陆军的密码也破译了一些。日本关东军的密码，逐日抄收的报底很多。虽努力钻研，未能破译。它另成一个系统，其密码组织的构成，始终未能突破。不久，又掌握了日本的空军密码。日本陆、海、空军密码，其组织的严密性，均不如其外交密码，特别是空军密码，更为简单，一经抄收到其通讯，随时就能破译。但它们都更换频繁，必须紧跟不放，才能随换随破。

1938年，汪精卫已是公开的投降派。他和日本的往来，可以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获知一二。汪精卫派要员陈公博、曾仲

鸣、周佛海、褚民谊等与日寇的往来，电文中均有报道。抗日胜利后，据《中央日报》登载的消息，陈公博乘飞机逃往日本时，根据破译的密电，才得悉其行踪的。蒋介石手下某些大员也有暗地派遣人员在上海和日本保持某种联系。我们到了重庆以后，也曾从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见到云南龙云也派人和日本秘密接触。记得这个密电码是使用比较复杂的组织拍发的。后来蒋介石向龙云发难，指摘他有通敌嫌疑，就是根据这个情报。相反，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8年中，从未见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任何一个人员与日寇有往来的情报。

在破译日本陆、海、空军密电码之后，密电检译所又进行了一次扩充，军用收报机增加到30余部。温毓庆从香港和其亲友中招来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数人，充实了研究组的人手。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努力，有的迅速成为能手。例如陈振泰、丁绪曾等人。

由桂林迁到昆明，继迁重庆

1938年底，密电检译所大部分人员由桂林迁往昆明。那时贵阳到昆明尚无公路可通，人员和机器只有假道河内前往昆明。桂林和昆明均非蒋介石的地盘，这个机关设在桂滇系所在地，均是温毓庆亲自与白崇禧、龙云洽商同意的。假道越南也是温毓庆与越南当局亲自交涉商妥的。

研究、研译两组和侦察电台均迁到昆明，昆明和重庆的通讯联系由自己设立的电台联络，信件用航空传递。在重庆只有几个行政人员和报务员数人。1939年下半年，温毓庆考虑密电检译所主力放在昆明不很妥善，于是又全部迁来重庆。

我于1939年初随同电政司的最后人员由桂林撤退。沿桂黔、川黔公路到达重庆，与早期由南京、汉口撤退到渝的人员汇合，大家相见甚欢、大家又团聚在一起了。

1939年初，蒋政权的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机关大都撤退到渝，有了一个较长期的喘息机会，蒋政权下的派系斗争益趋激烈。日本虽不紧逼，但侵占武汉以后，仍用兵西进。1939年春，日本数次猛烈轰炸重庆闹市区，火光烛天，群众惊惶万状，夜间人声鼎沸，数日不停，扶老携幼，迁往乡村。电政司在渝的临时办公地址，这时亦被毁于火。密电检译所由于迁至昆明，未遭损失。温毓庆到渝后的处境较前更感困难了。

在桂林、昆明、重庆这段期间，密电检译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大家一如既往，尚能专心致志的工作。侦察、抄收、研究、研译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一些日本外交密码多数均能适时破译，侵华日军的密码也在掌握之中，每日送出的情报多至100余份，是研究日本密电全面发展的时期。

军统的野心

温毓庆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和戴笠是在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贻家相识的。他到渝后，和戴笠过从颇密。大轰炸期间，有时住在曾家岩的戴公馆。我们不以为然，温毓庆亦曾表示不很愿意住此。我就和他的汽车司机将温的被褥搬至他的另一友人家借住。不久，温就租赁到学田湾衡舍顶层一栋楼房为其住处，我也同住在此。以后，衡舍即作为密电检译所在渝的办事处。衡舍与电政司上清寺办公处相距不远。

戴笠在我们面前表示非常尊敬温毓庆的学识和为人。就在我们到重庆不久，戴笠就向温毓庆建议，鉴于抗日战争形势，应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密电。将军统、中统研究密码人员统一交给温毓庆领导，并组织成立正式机关，不再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实际上，密码研究工作，不应视为一种特务情报工作，应视为一种尖端技术工作。戴笠的建议是以集中力量为名，以交给温毓庆领导为诱饵，着手染指这个组织。温毓庆将此意告我，也洞悉这个

诡计，他表示不赞同合并。我未表示可否。

接着，魏大铭向温毓庆提出要求，请他派出熟练的密码组织研究人员两人到军统作技术指导。温迟疑很久，但不得不同意这个请求。于是指派杨肆等人前去。杨肆由昆明来到重庆，只作一般性的技术指导。魏大铭见其作用不大，又向温提出拟派军统技术人员两人到研究组见习，温毓庆同样不得不同意这个请求。派来的两人中，其中一人是日本留学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名叫夏隆坚，是他们阵营中的佼佼者。事后了解，此人是上当受骗才参加军统的。

研究日本密电工作，对戴笠来说，是很重要的，必欲取之而后快。因为有了这个特殊工具在手，他可以为所欲为，大展“宏图”，还可以伪造情报，任意伤害他人。起初，戴笠对温毓庆是百般拉拢，甚为尊敬，意欲他参加军统组织，归其门下。则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但温毓庆本身是个学者，长时间受英美的传统教育，甘心作为军统特务，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还有宋子文一家的后台，不甘心屈居戴笠之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温一直虚与委蛇，未上戴的圈套，于是这场明争暗斗，也就愈演愈烈了。

将译出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

我一到重庆，我的表弟杨德基就到电政司来看我，我们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晤谈，他提出能否将我们破译的日本密电也送给地下党一份。我同意他的要求，并研究了如何作好秘密传递。他说能否由我亲手抄录一份送出。我说每日译件多达100余份，我俩边工作，实在无法抄录。我想到每日由研译组译出的报底全份，有一份用火漆固封交由我转给温闻，温闻后退还给我，即将温拆阅后的这一全份报底由专人和我联系取至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当晚抄录下来，再将原件退回给我送交归档，比较天衣无缝。德基亦认为可行，于是就决定这样办了。指派的专人每隔一

二日来见我，相互交换文件。来和我联系的是一位青年同志，说好我们是老同学，约好在几个不同地点见面。其中有赖家桥乡下我家，上清寺祥德村交通部宿舍，上清寺电政司办公处等。事情办得很顺利。

德基还介绍我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怡同志秘密见面^①。几经考虑，他和周怡同志决定到我家相见。当时，为了避免空袭，我将家安置在重庆市农村三圣宫赖家桥叶家院子一个农民家里，地方比较偏僻隐蔽。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来到我家，我从重庆市赶回赖家桥，相见甚欢。晤谈极为融洽，并在我家用了晚餐。当晚，两人留宿我家，第二天清晨离去。之后，我每月都要和周怡同志秘密见面一次，未出任何问题。

1982年春，我和内子去重庆作旧地重游，曾拾级登上红岩村，拜谒曾和我有过一度交往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也是过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地方。回首以往，无限激动。登上三楼，在紧挨楼梯的一个小间卧室内，见到山墙上悬挂有周怡同志与徐特立同志合摄的全身照。周怡同志身着军装，英武不减当年，缅怀先烈更增怀想！并得知三楼系当时的机要重地。由红岩村言旋时购得四川工艺美术品竹编“红岩青松”山水画一幅，带归留作永久纪念。

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1939年夏，温毓庆勉强接受了戴笠的建议，集中研究日本密码人手，将密电检译所改组扩大为一正式公开机构。

温毓庆叫我起草了扩大组织，集中力量的文件，报请蒋介

① 当时杨德基向我介绍周怡同志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我也曾见到八路军办事处给电政司写的一份公函，请求安装电话事，署名处长周怡，副处长钱之光。

石批准。温和我们商定，定名为军事委员会技术室，将军统、中统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人员和机器合并过来。温将文稿交戴过目。戴在“技术室”的“技术”二字后亲笔加添“研究”二字，因而以后就正式定名为“技术研究室”了，其他未作改动。

技术研究室下设5个组，1个主任办公室。研译组为第1组，研究组为第2组，原密电检译所的人员组织照旧。军统合并来的研究人员也不打乱其原建制，成为第3组。人数约30余人。由陈祖舜带队而来。这是温不愿将军统人员渗透到原密电检译所已有技术成就的两组之中去的一种苦衷，是分而治之的一种措施。中统研究日本密码的人员只有吴玉良等4至5人，均系日本留学生，且中统此时确已放弃研究日本密电的打算，所以合并到第1组。第4组为侦收组，侦察电台归其管辖，并将军统合并过来的报务员和收报机十余部，并入此组。侦察电台原是温放手由魏大铭培训组成的，实际上温已放手由魏掌握。第4组组长方砚农也是由魏推荐而来的。但研译、研究两组工作，特别是研究组的工作，温是不让他人插手的。第5组为总务组，办理事务行政工作。这5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是：

第1组组长霍实，副组长孟广治；第2组组长杨贻清，副组长李立民；第3组组长杨肆，副组长陈祖舜；第4组组长方砚农，副组长张雅焯；第5组组长施家幹（温的妻弟），副组长张廷启（毛的至亲）；侦察电台台长梁伯仑。

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职工人数激增至300余人。第1组约有研译人员30余人。第2组有研究人员20余人。第3组共有研译、研究人员30余人。第4组共约有报务员180余人，军用收报机40余部。另有自己的收发报机，3班作业。第5组约有事务行政人员20余人。主任办公室办事人员4、5人。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主任由温兼任，副主任为毛庆祥与魏大铭，我兼首席秘书。

合并后技术研究室的技术业务还是向前发展的。职工的情绪还是高涨的。这一时期曾破译了日寇外交密码上一些重要密电。

凡蒋政权下官员与日寇暗地来往和互派使者（电文中有具体来往人姓名）的情报，多是用这类密码发出的。日寇空军密电，我们随时都可破译。日寇空军的气象密电也被破译了。记得日寇空军从武汉机场一起飞，我们就立即知道它出动的机群架数、飞行方向和轰炸目标。那时重庆空袭警报的预警标志，是高高挂起灯笼。当我们的情报送出后，就看到灯笼挂起来了。

扩大组织，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外交军事密电的报告很快就获得批准了。主任定为同中将级，副主任和各组正组长及首席秘书均为同少将级。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不久也分别发给任命状。研究、研译两组人员的宿愿如愿以偿了。批准全月经费5万余元，另有约300元美金的外汇，为购置器材之用。这个机关经过这次的扩大和改组，经费是充裕的。但需要办理正式报销手续。不能像特别费那样可办可不办了。但温在以后辞职之前，还是责令施家幹把过去的特别费给予报销。

技术研究室改归侍从室领导，是侍从室下的一个单位。所有研译出来的密电情报，均按日改送侍从室；由侍从室第6组归纳整理后送蒋阅。我们只负责送出译出的密电原文。

在技术研究室成立伊始，毛庆祥就和温商量将他所领导的贵州安顺黄季弼股（中文股）亦合并进来。温当时并不愿意。因为这个黄季弼股原系温亲自创立，研究非蒋嫡系的军政密电，（当时研究桂、滇、阎系的密码）。对蒋曾立有功劳。后因内外人事关系，温拂袖而去。这次重归温的领导，温自然不很愿意。记得温曾和我谈，我们不研究中文密码，也不研究中共密码。尔后又几经磋商，戴笠也同意合并，黄季弼本人两次从安顺来到重庆向温面恳。最后还是合并进来。因为技术研究室的组织建制业经蒋批定，所以番号定名为第6组。组长为黄季弼，副组长为黄锦民。这个组约有人员70至80人，收报机10余部，业务照旧，按原组织未动。1940年初从安顺迁至重庆。这时全室职工人数共达400人，收报机约60部，是技术研究室鼎盛时期。

有一次，温和我去杨肆等人神仙洞宿舍，见到杨肆床上有一本《群众》杂志，温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这给老蒋知道了，要杀头的。”并说不许看这类东西。事后我对杨肆讲，要注意，要警惕，不能这样堂而皇之的行动。

因为技术研究室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单位，所以当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封私人信给温，要求将翻译出来的密电情报也送给他一份。温要我写报告向蒋请示。蒋的回文是，系研究日本的外交密电，今后如有有关军事方面的情报可以抄送一份等语。实际是不同意抄送。还记得当时行政院院长张群，也想拉拢温毓庆。有一次，张群下了一张堂皇的请帖，请温吃饭，虽然温是应约去了，但他叫我将这份请帖烧掉，不要留下痕迹。因张属政学系，温之举措，可能是不愿参加政学系。

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因为在重庆侦收日本陆、海、空军电台通讯，远水不解近渴。温于是决定组成两个工作队，分驻宜昌和桂林，就近侦收侵华日军的电台通讯。宜昌工作队长为叶钟华，侦收日本陆、海、空军为主。桂林工作队队长为吴玉良，以侦收日本太平洋海军为主。不但能侦察到其相互间的通讯联络、部队、舰只、番号、调动情况也都一目了然，相互之间的通讯密码，也大都能破译。以后毛来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又向陕坝傅作义部派去一个工作队，队长为王明德兼，副队长为孟广治。派去后，效果不很好，联系也不经常。每队携带军用收报机两部，人员10余人。成果每日用自己的电台发回重庆。

温毓庆的引退和军统的侵吞

1940年以后，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逐渐减少，军事上也不用兵向西穷追。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势头加剧，内部人事倾轧，互相排斥的情况也就加重了。温毓庆的处境更加困难，加之又身患黄胆性肝炎和钩虫病，几次去香港治病，迟迟不

返，他的情绪日见消极。

1940年初，蒋介石突然给技术研究室发来一个代电，大意是说，这项秘密研究工作事关机密，所有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今后应定为终身职务，不得擅自离职，此后该室的人事，统归戴副局长兼农管辖等语。温毓庆见到后，没有作任何处理，就将文件交给我了。不久，温以治病为名去香港，一去不复返了。技术研究室第1、第2两组人员闻讯，群情大哗，不愿将技术研究室拱手送给军统，6个组长也绝不愿隶属于军统之下。我们一方面挽留温毓庆仍回渝主持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设法取消这个代电的意图，解除这个强加的无形的束缚。

当时由6个组长和我联名写了一个报告给蒋介石，要求温毓庆回技术研究室主持工作。同时不愿接受军统的人事管辖，定为终身职务。我们的理由是优秀人员是应长期留在这样的机关工作，但表现不好的人，不能允许定为终身职务。

这时我们找到毛庆祥表示了我们的态度，并将我们给蒋介石的文稿让他过目，他表示赞同。毛庆祥见温毓庆不归，很想掌握技术研究室的主任职务。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侍从室第4组组长陈方，陈述我们的意见。毛庆祥说：“陈方主管这些事情，我再用电话和他联系。”并嘱咐将我们给蒋介石的呈文交由陈方转。我们当时就作了另一种打算，万一温毓庆不返渝，我们就拥毛庆祥出来主持工作。这比交给军统管辖要好得多。毛庆祥是蒋介石的内侄，留学法国，所谓名门子弟，可以暂时合作一个阶段，以渡过当前的危机。

温毓庆在去香港治病之时，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是由副主任魏大铭代理主任职务，因而我和魏的接触也就更加频繁了。我将大家要温毓庆回来主持工作的意见向他一再陈述，并经常和他聊天。海阔天空的谈的很多。记得有一次，魏盛赞我的才华说：“戴先生（指戴笠）①面前就缺少像你这样的秘书人才。”我听后毛骨悚然，但态度极为冷静，未作任何表示。我返回来告诉了杨肆，

事情不能干下去了，认为必须打破他的这个打算。以后，我多次和魏大铭谈话，表示我们坚决要求温毓庆回来的意见。魏大铭若有所悟的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来我被称为“温派”。其实魏大铭并不真正明白是怎样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

这期间，周怡同志和我每隔一个月秘密晤面一次未断，密电译件仍照常每隔一二日由专人来取。我将军统要看并技术研究室的情况告诉了周怡同志，并请示他如何应付？周怡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说时态度极为严肃。金石良言，掷之有声，它长时期萦回于我的耳际，我始终是记住的！

杨德基同志1940年初在重庆暴露了身份，他到交通部来找我，告诉我日内即将去延安，不能在重庆多留。以后和周怡同志的联系，就由我直接处理了。临走前，他送给我一些进步书籍，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他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将来还是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

周怡同志曾询问我，国民党当局还有哪些反共的行为。那时国共双方摩擦加剧了。我说魏大铭要将军统一名特务派往延安，充当延安电报局局长。化名是汪光毅。那时，延安电报局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直接管辖，局长由交通部任命。并规定电报局长要由报务人员充任，所以才按照这样程序手续进行。这些任命文件都是经过我手的。我告诉周怡同志后，他说立即转告延安，查明情况。1个多月后，周怡同志告诉我，现已查明，确系军统特务，并携有秘密无线电台，已将其驱逐出境，电台没收，延安电

① 当时军统人员对外谈到戴笠，均称戴先生，以示尊重；对外谈，则称戴老板，当时毛人凤系戴笠的秘书。

报局长以后不准再由交通部派了。我1949年初参加东北化工局工作，锦州合成厂第一任总支书记赵子卿同志曾对我说：“这件事我知道，那时我是县委书记，中央曾发过通报。”

有一次，周怡同志曾和我商谈，周恩来同志见到我们的情报中有一份系蒋介石手下的人员和日寇秘密来往、卖国求和的消息，打算根据这一情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抨击蒋介石卖国求和的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发表。当时我说，等我回去商量一下。我曾和杨肆商量。这期间，正巧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把我们的一份有关日本国内经济情况衰退的情报，在大公报上全文发表了，并加以评论。温毓庆见报后，大发雷霆，立即要我写报告给蒋介石，并说我们的密电情报是极为机密的，不能拿到报上发表。我和杨肆商量后，将此事转告了周恩来同志，我认为最好不要发表。因为如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必然惊动国民党当局大肆追查，那就不好了。后来，周怡同志转告我：“周恩来同志决定尊重你的意见，不发表了。”我听后，如释重负，心情轻松了。听到“尊重”二字，当时的心情是不敢当的。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这些人总是爱护备至的。这种宽广的情谊，至今难忘。

周怡曾告我，我们所送的情报，均由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阅看的。有一个星期天周怡来到赖家桥我家，说叶剑英和他在北碚一起参加了一位民主人士的追悼会，本想会后一同来看你，由于目标过大，没有能来。我深深体会到当时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是深受党的重视和奖勉的。

毛庆祥来接替温的情况

1940年夏，温毓庆滞留香港不归，大家推我去港见他，要求他毅然返来主持工作。这个意见在当时技术研究室是一致的。我去香港，必须征得魏、戴的同意，否则是去不成的。魏大铭和戴

笠也很同意我去。戴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毛也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均表示挽留之意。我到香港后，即住在温毓庆家。他对我说：“你带来的这些意见和信件，都是要我回去的，但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并说：“香港这个地方，日本人也要占领的，我在此也不能久留。”意思是全家不久要去美国。我住在他家约四、五日，几经谈话，他不回的意见极为坚决。他在言谈中暗示，待他走后，你们不妨和军统合作。我表示坚决不与军统合作。他最后带安慰之意说：“我走后，你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妨拿点钱去成都住下，买点房子和田地维持生活，等抗战胜利了，再回江苏。”温还说：“10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时，你就能理解了。”从此以后，就未能再和他见面。现在回忆起来，温毓庆坚决不归，立意是对的。他如果回到重庆，很有可能被秘密拘留，暗中软禁，技术研究室在这样邪恶势力重压下，军统就可垂手而得了。

我离港言旋时，温毓庆要我写一个报告带回给蒋介石，说因病在身，请辞去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我请温在呈文后段建议由毛庆祥来代理主任职务。他最初不甚同意，经我坚请，也就同意了。至于辞去电政司司长职务的呈文，温说稍后一步，等他的指示，再将辞呈递给交通部长张嘉璈。

返渝后，我的情绪也很消极，将温毓庆的辞呈送交侍从室后，我就回到赖家桥家中，迟迟未返市内。魏大铭派车来接我。我回后即与大家商量，我们7个人（6个组长加我）再联名写一个报告给蒋介石，一致要求毛庆祥来代理主任职务。我们找毛庆祥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并要求取消人事归戴笠管辖的代电。毛庆祥有些半推半就，并叫我再去找陈方，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给陈布雷（侍从室主任）和蒋介石。

秘密通缉和通缉令的撤销

温毓庆的辞呈并未立即批示。据毛庆祥透露，在我去香港之

后，戴笠亲自去香港面邀温毓庆回渝，遭到了拒绝。戴笠曾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将温毓庆引渡，英国当局亦未同意。不久，温就去了美国。他到美国后，在宋子文经管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下工作。毛庆祥对我讲，蒋介石已秘密下令通缉温毓庆，并说温将永久不能回来了。温被通缉，又不得不放弃租借法案工作，留居美国。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来华到重庆。据说居里和蒋介石在谈话中曾提到温毓庆。居里说，像中国温毓庆这样的人才留居国外，颇为可惜。蒋介石于是又下令撤消了这个秘密通缉令。但温毓庆以后始终未见返国。据说，居里和温毓庆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同学，温找到这个特殊关系，才获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亦云幸矣！但温如回国想作什么贡献，已是无可奈何了。

温在美国租借法案下工作时，和我还有书信来往。其中提到我们所破译的日本外交军事密码组织的底稿已被戴笠秘密出售给美国，代价为500至600万美元。温信中说，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也是值得骄傲的。这是极端无耻的卖国勾当。把国家的尖端机密就这样廉价出售了。我估计这些底稿被窃取，是军统派在第2组的两名人员干的。温毓庆滞留香港时，也曾有书信往来，温多系交给重庆香港往来的国民党要员、他的好友带交给我的。这就避免了军统掌握的邮电检查。有一次，一位要员（即张禹久）将温信交给我后，立即叫我阅后当他面烧掉。我有些迟疑，他严厉的责备说：“你们太不知厉害，还这样神气。”并告诫说，以后少在外面走动。我们当时的确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我们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那时军统在重庆确实嚣张已极，疯狂迫害人民，就连国民党的要员也难免。我曾在市区人民道旁见到军统用黑色吉普车逮捕了经济部一些司局长。

监视、盯梢和“不得离开重庆”

在1940年上半年，当温毓庆去香港不归时，军统就开始迫害我们。他们不仅派特务在衡舍大门外监视我们，而且派人跟踪盯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中。我曾向魏大铭提出责问，他伪称那是监视共产党的。实际上既监视邹韬奋，也监视我们。因为那时邹韬奋同志住在衡舍坡下。接着，我突然收到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稽查处的一份公函，内容说，奉上级命令对你室施家幹等15人要严密监视，不得离开重庆，其中尤其要注意施家幹、杨肆、王维钩等3人的行踪。我们见到这个文件后，气愤异常，我们再一次上书给蒋介石，表示抗议，并将稽查处的原件抄附。我们分别向毛庆祥和魏大铭提出我们的愤怒情绪。据毛庆祥后来秘密告诉我，军统曾两次打报告给蒋介石，诬陷我们与美国大使馆人员有通谍嫌疑，要求逮捕我们，被陈布雷挡住了。陈认为对这些青年技术人员不能这样做。我们才幸免于难①。

1940年夏末秋初，技术研究室第6组副组长黄锦民，突然失踪，后来得知是军统秘密抓去了。我数次向魏大铭交涉，要求释放，他均含糊其词。过了1个月，魏大铭对我讲，戴笠约我去吃午饭。我还是去了，并布置了我万一被扣留的后事。这顿午饭是在曾家岩所谓戴公馆内吃的。魏大铭和一两名戴笠左右的大特务在座，还有一名年轻的女秘书，并介绍说是我的光华同学。饭间，我向戴笠提出一名副组长被捕的事。戴佯称不知，转脸嘱魏大铭查明，如果确有这件事，明天就释放。这位副组长果然第二天安全的回来了。

① 1956年我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时，副经理芮杏文同志（后曾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告知，关于我在重庆受军统迫害事，外调人员去重庆看到敌伪档案，确有其事。

怎样和中共失去联系的

在上述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和周怡的秘密联系未断。那位专门与我联系的同志仍秘密和我来往，周怡也定时见面。有个星期天，这位联系同志来到赖家桥我的家相告，组织上决定让他休养，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并决定另换专人和我联系。我因相互之间搞得已很熟识，工作也联系得很好，希望不要换人。他回去转达后又来告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休养，并决定另换新人和我联系。他辞别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见。不久，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①持周怡的亲笔介绍信来到电政司找我，这样我们又联系上了。但尚未及交换所传递的文件。有一天，我从衡舍枣子岚垭上观音岩石坡，迎面见到这位同志也从观音岩下坡，对面相见时未打招呼，他走近下坡“漱庐”（军统局总部所在地）门口，就从容走进去了，门口警卫未加阻拦。当时我顿生疑虑。回到衡舍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杨肆，考虑暂时断绝往来为好。此后，这个人曾数次来找我，我均未见。本来，同一天晚间约好和周怡同志见面，我按指定地址前往，周围因敌机轰炸，不能找到指定地址。因此，这项工作就暂时断绝了。

相隔大半年以后，我将这段情况转告我的可靠同学周梦鏖，让他到新华社去找他的大夏同学戈宝权同志，请戈将这一情况转达给周怡同志，并请示今后的联系办法。戈回告说，已将意见转达。周怡同志考虑，现在双方都在严密监视之中，还是不联系为好。过去派的那位专人是有些欠妥的。1943年我去新疆建设一座小型硫酸厂，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都曾想和党取得联系，因没有找到可靠的联系人而未果。1948年下半年，我在天津时，曾嘱已去解放区的外甥全钰嘉同志联系我进入解放

① 因时隔太久，这两位和我专门联系同志的姓名，已记忆不清。

区，因全家都去，目标太大，不如静候天津的解放。

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9月在北平见到杨述同志。他告诉我，周怡同志已不幸逝世。抗日战争期间，周怡由重庆回到延安，在延安杨和周见到面，曾谈起我们，周向杨说，我们还是好的。这可以说是周怡同志对我们的鉴定。

毛来就职和带来的上方宝剑

1940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发布了毛庆祥代理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命令，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毛庆祥来接事时，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手谕：“所有在技术研究室的军统人员魏大铭等以下全部调回军统局，原军统局合并过来的器材亦交回军统。”这是毛带来的上方宝剑。接着，侍从室又以蒋介石的名义来了一个代电，撤销以前规定的技术研究室的人事归戴笠管辖的意见。并说优秀的人员是需要长期保留下工作的，一些不好的人员没有这样的必要。因此，我们糊里糊涂地堕入军统的怀抱之中的危害被消除了，规定为终身职务这一条，也就无形取消了。

毛带来的蒋介石的手谕是要将技术研究室和军统截然分开，如何分开，是很棘手的问题。第3组的人员原是青一色军统，一律遣回军统局毫无问题。问题却是在第4组，如果魏大铭一声令下全部撤走了，则技术研究室就没有密码电底的来源，工作就难以维继了。我们考虑，第4组的报务员虽然绝大部分是由魏大铭栽培而来，但并不一定已参加了军统组织，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不愿隶属于军统之下的。事不宜迟，在毛庆祥前来就职的当晚，我们征得毛的同意，立即会同他委派的新的第4组组长王兴智去到黄葛桷垭深山中的凉风垭（第4组所在地），向全体人员谈了话，表示新主任毛庆祥要大家安心工作，要大家继续留在技术研究室。军统方面如果有人来煽动大家回军统，千万不要上当。大家经过商量后，表示都不愿去军统。于是我们要每人填写了一张志愿书，声

明本人并未加入军统组织，不是军统所属人员，现愿意继续留在技术研究室工作。这项手续整整办到深夜1时才全部填好。所有报务员都填了。因而第4组就稳定下来。这件事是办得迅雷不及掩耳的。事前已有风声要派车全部接走。如果撤走了，事情就棘手了。回忆当夜月光似水，繁星满天，凉风习习的深山中，步行回到黄葛桷垭时，有的人正为我们捏了一把汗。

在毛庆祥尚未来代理主任职务之前，有一次魏大铭曾和我谈，我们这些机关都要归党（指国民党）领导了。军统局将成立区党部，技术研究室人员可共同参加一个党部。这是他又一次要吞并技术研究室的如意算盘。我当时对魏说，我们还是独立成立一个区党部好。我随即把此意告知毛庆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由毛介绍我去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联系成立事宜。毛庆祥就职后，这个区党部也就成立了。这是技术研究室成立党部的由来。

毛庆祥和军统的矛盾这时就尖锐化了。当时毛和我们都住在黄葛桷垭的新市场。一天的深夜，军统以查户口为名，敲开毛庆祥的家门进行搜查，毛一怒之下欲开枪射击，被其妻阻止，未酿成火併。这是军统威胁毛的一种举措。

破译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密电

太平洋事变发生一星期前，我们从日本海军军舰通讯联络中了解到它们相互靠拢的调动情况，并破译了一份海军密电，得到了它们即将偷袭珍珠港，准备出动空军轰炸的情报。我们立即将此情报专送侍从室。过了两三天，又同样截获破译了一份海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密电，我们也立即送出。我们确信日军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了。不出二三日，日军果然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据沈醉在《戴笠其人》一书所载，“军统研译密电的技术

室^①，侦译到日本空军有在太平洋方面进行轰炸的准备情况后，戴笠想以此讨好美帝，引起它的注意，便决定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站长肖勃^②，由肖勃告诉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便急忙转告美帝一些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据说美国一些将军们听了捧腹大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并感到中国人是在破坏美日关系，因为日本这时在军火方面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两国间的关系很好。以后军统又陆续获得这方面有关情况，经肖勃转告郭德权，郭自己也有点怀疑，不敢正式通知美方，只和与他私交较好的一些美帝军官们谈谈，而他们也当作神话一样听听，毫不在意。结果日空军于1941年12月8日，在东栖三郎赴美商谈途中，美帝全无防范的情况下，偷袭珍珠港成功。这时美帝一些平日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才想起郭德权事前通知他们的消息是可靠的，便去找郭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以后晓得是军统方面得到的，这时美帝对外活动的情报机关，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才找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这时戴笠真是高兴极了，便在他公馆里大宴宾客，招待迪帕斯。他并连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也赞成他早日与美帝发生联系。

现在据我推测，我们将上述两份日本海军密电情报送到侍从室后，可能是由侍从室第6组组长唐纵交给戴笠，再由戴笠通知肖勃的。前面提到温毓庆来信告知，我们破译的日本密码组织被秘密出售给美国得手一事，估计时间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1939年至1941年，军统曾聘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密码专家“约得来”来重庆当军统的密码顾问，并由魏大铭和杨肆与他接谈工作。据杨肆讲，此人技术业已陈旧落后，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水平，因此无所作为。在重庆两年，享受了丰厚待遇回国。

① 沈文中所说“军统研译密电的技术室”，实际上就是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但当时并未归军统领导和管辖。

② 肖勃当时对外名义是驻美大使馆副武官。

1940年左右，军统和苏联曾有一个秘密协议，由苏联派来报务员（人数不详）及收报机，在重庆南岸设立电台侦收日本外交军事的密电。苏联报务员抄收到的密电报底，也送给我们一份。我们看到所抄收的报底字迹非常潦草，错误很多，远远不能与我们所抄收的质量相比。如果报底抄错了，是无法破译其密码的。

改变研究方向的企图未能实现

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庆祥一早来到技术研究室上班，带来了一张蒋介石的亲笔手谕交给我，要我们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密码。这是蒋要转研究方面了。我对杨肆说，这项工作，我们再也不能干下去了。能离开就离开罢。杨肆也很同意我的意见。我一面对毛庆祥讲，现在抗日形势很紧张，应付日本外交军事密电的人手很感不足，有些重要复杂的密码还不能破译。这项工作，还是稍等等再说。毛表示同意。于是这张手谕就被我留中了（不向下发去执行的意思）。1941年的一天，毛庆祥同样在一个早晨上班时，又带来蒋介石的同样亲笔手谕一纸交给我。我考虑像前次搪塞的措词是不行了。于是对毛讲，第1组、第2组现在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对日本密电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就交给第6组去执行。毛同意我的意见。第6组是中文组，这是他们工作范围之内的事。第6组当时只能破译一些桂滇閩等系的密码。中共的密码，按照第6组的技术水平是破译不了的。我对毛说，第6组如果感到技术力量有限，可派人到第2组去见习，提高了技术水平再说。事后就派了第6组技术副组长黄锦民（前述被军统秘密逮捕的人）来到第2组。第6组以后也只能搞出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拍发给延安的一种极为简单的加减法密码。内容是当时中央日报所登载的社论和中央通信社的一些消息。直到我1942年10月离开技术研究室时，情况都是如此。

我的辞退

1942年初，我就将由我介绍进技术研究室工作的同事杨钰等设法辞去职务，脱离了技术研究室。这是准许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辞职离开的开端。这说明过去坚决要求撤销那个定为终身职务的代电有用。

毛庆祥这时认为已能掌握技术研究室的工作，军统对他的捣乱，也不能得逞。我们这些所谓“温派”人员也不能尽如己意。毛并想方设法拉拢杨肆，认为杨是掌握技术的，介绍蒋介石对杨的召见等。我看到局势更不可为，我自己必须离开不可。我当时宣称，我是学化学的，要去干我的本行。我决心选择时机，脱离这个技术研究室。

毛庆祥未就事之初，要我暂行摆脱电政司的工作，专职在技术研究室。我同意向交通部暂行借调。工资仍归交通部发给。毛为我办了借调手续。1942年10月，我乘机向毛提出了辞职，要求仍回交通部工作。我对毛讲：“你已来到两年了，情况已能掌握，论理我早就应该辞去首席秘书职务，恐怕你初来有些情况不熟悉，现在是我应该辞去的时候了，请你允许我仍回到交通部电政司工作。”毛同意了我的辞职，行文送我回交通部工作。首席秘书职务，毛指派黄季弱兼。我从此脱离了这个兴衰动乱的技术研究室。此后再也没有踏进这个机关的大门。回到交通部时，人事司王司长问我：“你已彻底离开了吗？”我说：“彻底离开了。”技术研究室第1组组长霍实对我讲：“这是你的急流勇退。”军统特务还来了2人到我家，对我的妻子说：“王某为什么连少将都不干？”第5组组长施家幹随同我辞职。杨肆调任军事委员会军用译电管理处处长。抗战胜利前夕，第1组组长霍实和第2组组长杨贻清亦均辞退他。有些技术骨干力量也离开了，例如陈振泰转职中国航空公司。

对日密码研究工作，可以讲是一项尖端技术研究工作，也是国防上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早期那种蓬蓬勃勃的精神状态，经过这样大的动乱之后，大家均无心安静的工作下去，技术和业务也就一落千丈。这是蒋介石实行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的深可痛惜的后果。

1943年春，我在杜重远所著《盛世才与新疆》一书的鼓动下，去新疆乌鲁木齐建设一个新疆省营制酸厂，一年后建成，又不得不返回重庆。原因是那时的新疆更加法西斯化了。在那儿也不能久留。

抗战胜利后，据说重提集中力量研究中共密码一事。因为抗日已经胜利了，蒋介石旧事重提，查问技术研究室的工作情况。他听说“温派”的人员多数已散去，要重行召回这些人。我那时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暗自担心。但并未召我回去，大约因为我是干秘书工作的。被召回的人也为数寥寥，杨肆就是此时被召回南京当顾问的。据说军事委员会撤消后，这个机关归国防部领导，由郑介民、魏大铭主持其事，还是落入军统之手了！

关于救国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

李 庚

作者是救国会的骨干，本文从其亲身经历的回忆中记述了救国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各种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我在去年11月26日曾写过《关于救国会一段历史的材料》，其中，首先提出：“有人认为，‘救国会在抗战初起时就已结束，或救国会的历史虽可算至解放后救国会宣布解散为止，但在抗战时期，救国会并无多少工作’，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然后写了我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和所知的基本情况。

但这是一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大事，现在救国会的诸前辈多已辞世，我自“一二·九”运动时起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参加过救国会工作有将近10年之久，对救国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自觉有责任把自己的所知记录下来，并尽可能完整一些，以供研究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发展等等历史问题的参考。已写者既有不足，故再作补充。

救国会本来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救亡团体。当时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会员团体有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学生界各全国性救国会和上海、平、津、南京、西安、武汉、四川、华北、西北等各地区的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众多，声势浩大，对组织民众，掀起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促成抗战，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当时国民党独裁专制，

不仅毫无民主可言，且对群众爱国行动横加镇压，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完全控制的南方，参加救国会的主要成份，特别是其骨干分子，必然首先是政治觉悟较高，对抗日救亡有坚强信念而又愿为其实现牺牲奋斗的人。那就是当时称为“进步分子”或“前进分子”的人。1937年4月15日，当时为中共北平学委的黄华同志，在给南京秘密学联题为《我们对南方救国团体的意见》的信中指出：“南方的各界救国会、学联等团体，名义上是一般统一阵线，实际只是前进分子加入——只是一个左派团体或左派联合团体而已。”“实际上也是左派集团。”应该说这一判断是准确的。是从少奇同志在中共北方局针对当时救亡运动情况，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来的。

由此，信中又明确提出：“南方的救国团体应不要用一般的统一阵线的名称。而应以左派团体为骨干，去建立、组织、巩固真正的一般统一阵线团体。”“一般团体与左派团体是相辅而行的。以左派团体去代替一般团体，必走上关门主义之路；而只要统一阵线，不要左派团体，是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一般团体并逐步提高其政治意味，便是左派团体（像南京秘密学联这样）的任务。”（黄华此函，原件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档案馆，曾载《南京党史资料》1984年10月出版的第四期。）

这里，既反对了把一般救亡团体变成左派团体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又肯定了左派团体的存在及其应有的作用。

全国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接受了这一意见，在1937年3月20日发了题为《救国会工作过去所犯过的错误》的《告上海各界救国会会友书》，表示过去救国会在认识上“不够了解中国问题，必须经过真正的和完全的民族、民主运动始得解决……看不起一般的爱国主义，以为爱国主义运动只有前进份子可以包办。……关起门来，组织方面完全是‘小组’、‘分区’那一套，好像四万万国民都须编成小组交给组织部领导，每周开会讨论时事、做检讨、布置工作，学习材料都是左翼的社会科学书刊……越显得像一个政

党……。”（见《南京学生》1937年第四期，现存南京市委档案馆）

胡愈之先生在他的自传材料中也曾写到：“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遂由在香港的胡愈之、潘汉年找邹韬奋、陶行知，根据《八一宣言》，以中间派的立场写出一个文件，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个文件经韬奋、陶行知签名后，由韬奋带往上海，沈钧儒同意，章乃器却不同意，嫌文件太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虽还保留了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失去了中间派要求的特色，因此对群众影响不大。”

以上材料说明了那时救国会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组织状况。当时指出救国会实际是个左派团体，而要求其在工作上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发展扩大统一阵线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

但事过境迁，今天再来考察这段历史，却要承认：自“一二·九”运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广大群众中必然要出现一部分先进份子的结合、聚集，以至形成为一种骨干力量，是个客观事实。北方，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及时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并正确地给予解决。这就是在北平一方面坚持了北平学联作为北平全体学生的组织。一方面又发展了作为左派学生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而在南方，左派力量就一直形成和存在于救国会这样本来应是广泛的统一阵线的团体之中。

今天，历史地来看，应当承认，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在救亡运动中，在抗战以前，已经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左派（非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在国共之间、

在各民主党派之间，有了一个“救国会派”的历史渊源。

救国联合会作为一个救亡团体，可以因形势的变化而成立或结束，但“救国会派”，作为一个已经聚集、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它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而且应该认识到：这是使中国抗日民主阵营、进步力量得到扩大加强的一件好事。

这一点，蒋介石是意识到了的，所以1937年8月初，他下庐山回南京，马上就约见沈钧儒先生，向他提出：“你们要求抗日的目的已经达到，救国会就不要再搞了，以后可以在政府领导之下参加动员民众抗战的工作。”接着即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与七君子正式谈判解散救国会问题。自8月4日起连续谈了3天，因意见不同，僵持不下。国民党一意孤行，当即明令宣布：现在由国民党来领导统一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规定：“所有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救国性质的团体和单位行动。”随即，“国民党就在上海搞起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由国民党CC派的骨干人物潘公展当了主席。并在报上发出通告，要求文化界人士前去参加。”“本来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已经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实际也是救国联合会的核心组织，很明显国民党要以文化界救亡协会来代替文化界救国会，从而控制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为了团结抗战，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界救国会成员还是要参加进去，在其内部争取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权利。”同时，“为冲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我们又采取由救国会会员发动组织文化界各种专业团体的办法，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各界抗敌后援会，同时又保持各团体的独立性，来发展救亡运动，于是相继成立了戏剧界、游艺界、漫画界、编辑人等各种救亡协会，左派人士在这些协会中都占据领导地位”，各自自主地进行工作。同时，救国会又支持创办了《救亡日报》（夏衍主编）和《中华公论》（张志让主编），《抵抗》（邹韬奋主编）两种刊物，并在文化界救亡协会下，组织了国

际宣传委员会(胡愈之负责)……“这样，对内对外的宣传阵地都为我们所掌握”，使CC人员无法控制。(以上引号内的话均引自胡愈之同志所写自传材料。)

事实是，在蒋介石明令禁止救国会活动并在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后，救国会虽不再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它的队伍并未瓦解，而是仍在继续工作，实际起着它本来具有的救亡运动(统一战线)骨干力量的作用。

沈衡老那时暂住南京，借居聚槐村五号千家驹同志的寓所。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同志出狱后也住在此地。这里一时就成为上海、南京及江南一带救国会同人接头、聚会、交换情况和布置工作的活动中心。这所房子还是救国会妇女组、组织慰问伤兵，和青年组、接待东战场流亡青年及将其中有志者送往延安的联络站。由南京秘密学联和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共同组成的“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也是此时得到救国会的援助，出发到安徽腹地工作的。

那时川军出川抗日，成立了以刘湘为司令长官包括江苏、浙江、江西、皖南各一部分的第七战区，救国会经王昆仑同志向刘湘做工作，争取到刘湘决定以南京救国会的同人为主，帮助他建立起第七战区的战地动员委员会。但当人员基本组成后，以南京沦陷，这一带成了武汉的前卫地带，蒋介石撤消了七战区，改派顾祝同率国民党嫡系部队组成第三战区，这一才开辟的工作只好作罢。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华北、华东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国会成员纷纷撤至武汉。以沈衡老为首，在这里又继续进行救国会的工作，首先着手的是把原各地各界的救国会负责同志联系、组织起来。1937年12月开始了定期的救国会各界代表联席会，——民盟中央王健同志处至今保存的一份1938年1月19日会议记录，就是这个联席会一次会议的记录。参加的代表有沈钧儒、沙千里、陶行知、钱俊瑞、张申府、刘清扬、史良、韩幽桐等人。记录还记载着当时这个联席会议还设有

执行部、分设联络、秘书等组来负责日常工作，这方面的负责人有王昆仑、何伟、薛藻宁、陈传纲、李庚等。从记录上还可以查到，当时开始重新建立了联系的因战局变化分散各地的救国会骨干，有湖南的杨东荪、曹伯韩、罗琼、廖庶谦、汪楚宝、刘良模，江西的孙晓村、王造时，浙江的骆耕漠、张锡昌、孙克定、张若达、张植华、吴大琨，河南的陈洪进、李紫翔，广西的于家驹，贵阳的张定夫、广东的石辟澜，重庆的漆鲁鱼、刘志刚，成都的韩天石、周曼如，香港的王新元等地诸人，并正在寻求发展联系在西北、西南的救国会同志的关系和工作。所有这些事实，归结起来就是胡愈之同志在他留下的《自传》材料所记的：“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这时都在武汉，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开始恢复救国会的活动。”

为努力恢复本身的组织和工作，救国会在武汉于1937年12月创办了《全民周刊》(出过30期)，以该刊和生活书店，广泛组织文化界的活动。由曹孟君同志负责发动建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和设置战时儿童保育院(至1939年在全国建成十七所)。由何惧负责重建了原为上海职业界核心力量的蚊社，由全国学联负责人郑代凡、李庚和祁式潜组成了救国会的青年部；这样，就逐步又形成了救国会仍以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和学生界为基础展开基层活动的格局。此外，并支持章乃器和狄超白在第五战区的工作(章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狄在五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了一些救国会成员和流亡的抗日青年前往大别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同时也动员另一些同志去山西临汾，支持李公朴先生在民族大学的工作。再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1938年国民党在军委会下成立了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胡愈之同志任三厅五处处长(主管宣传动员工作)。“第三厅集中了全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五处则是以救国会人员组成的。”

救国会在武汉进行了恢复救国会的活动并做了许多工作，但并没有正式再建立救国会的组织。其原因一方面是避免国民党的

干涉，另一方面胡愈之同志也有记载，即他在自传文稿所记：救国会领袖开始恢复救国会的活动，“但救国会原来只是一个松散的人民团体，在新形势下这样的团体是否需要存在？或是组成政党形式？我把这个问题向王明、博古（当时王明是中共长江局书记，博古为副书记。周恩来是委员之一）谈了多次，都不得要领。实际上王明是不敢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怕救国会变成政党，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愈之同志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但王明、博古同志在救国会恢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不仅是个“怕国民党不满就不敢做”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以后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看到，他还有“左”的观点，对中间力量怀有戒心，不懂得如何去组织和发展代表中国中间阶层的民主政治力量，以扩大和巩固中国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这和周恩来同志的看法、做法是很不一致的。

不必讳言，救亡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的领导，救国会的领袖和骨干是倾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还有相当一些救国会成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王明以中共长江局第一把手对恢复救国会不予支持，再加上国民党对救国会的严密注意，救国会在武汉和此后也就一直以并无正式组织的方式在进行实际上是有组织的活动了。

救国会自身的组织虽然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建联系，开展工作，但暂时也只能止于此矣，因此与此同时，救国会也就将相当一部分力量，去发动、推动成立一个在新形势下团结面更为广泛的全国性救亡团体，这就是1937年11月即开始筹组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

1937年11月，为筹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召集了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沈钧儒、黄松龄、阎宝航、刘澜波、高崇民、潘梓年、章伯钧、张申府、沙千里、李璜、左舜生、李公朴、曹孟君、罗隆基、张西曼、王昆仑、梅龚彬、孔庚、于光远、李庚等29人，议定了以：“贯彻抗战到底，实

现全民抗战，确定抗战政策，革新政治机构……”为宗旨，推出范长江、徐寿轩、王造时、潘梓年、李璜、罗隆基、王昆仑、梅龚彬等为“宣言”和“章程”的起草人，设立了由钱俊瑞、王炳南任正副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和以何伟为首有袁青伟、汪德彭、祁式潜、李庚、季洪等参加的秘书组。但12月13日的成立会因故未能开成，随着向国民政府军委第六部（即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和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申请立案又阻力重重。不得已就先建立了一个在武汉的“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国民党武汉卫戍区司令部表面上不直接加以干涉，实际上却当即下令限各团体在三日内离开汉口，“否则即予整肃”。

这时国民党已决心立即遏制各地迅速发展日益壮大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2月底，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最先动手，以“未经合法筹备”为名，下令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13个所谓“非法团体”。随着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无论成立什么民众组织“需有本党党员过半数之参加，方准成立”。这使当时救国会还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女救亡团体的计划也因之受挫，4月中救国会见抗敌救亡总会立案不成，遂经商议改组为“抗战建国纲领实施促进会”，并改向军委政治部要求批准。但国民党决不开放“民众运动”的方针已经定了，沈老、阎宝航同志为此屡屡奔走也毫无结果，到5月17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重申解散“非法团体”，居然动手拘捕了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于光远，西北青救负责人何志诚和西北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的负责人蔺克义。而国民党中央在8月份并明令规定：“凡民众团体召开大会，必需前2日呈请批准”，致使救国会连召开各民主党派、民众团体的会议也有了困难。组织全国抗敌救亡总会的活动到此不得不暂告停顿。随即形势更加严峻，发生了在武汉一次查禁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和蚊社等14个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严重事件。

回头看，在武汉时期，救国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

织起人民的进步力量，争取再建立一个团结各党派的全国性救亡团体，打开全民抗战的新局面，确实曾经是迎着困难奋斗不已的。虽然这一目标，在武汉时期，未获成功，救国会也并未就此放弃其努力。武汉失守，国统区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以后，尽管已经发生了三次反共高潮，已经由国民党五中全会宣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军、警、宪、特对人民救亡活动的监视与迫害已经更加猖狂，更加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救国会还是冒着风险，不计成败的一再努力，在1939—1940年间，先后组织过《宪政期成会》、《宪政促进会》以及《兵役实施协进会》等等。——这些组织活动的时期都不甚长，声势和影响远不及抗战前的救国会，但终究在促进国统区人民觉醒，团结民主力量，促进民主党派活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9年春，当救国会朋友又逐渐集中到重庆以后，救国会成立了包括救国会各地代表人物的定期的17人座谈会（17人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章乃器、张申府、刘清扬、柳湜、王炳南、于毅夫、史良、胡子婴、沈兹九、陶行知、钱俊瑞、李庚、郑代巩）。另推沈老、章乃器、张申府、王炳南、李庚五人负责与各方联系及处理日常事务。并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设“救国会党团”（李庚为秘书）。这样的组织形式持续约有二年。联系的外地的救国会情况随战局变化稍有变动，但大体还保持了武汉时发展起的各个“点”、“面”，又大大促进了重庆和成都两地救国会的工作。而开展得最好的要数救国会在广西的工作。那时，在广西的救国会同人有定期的聚会，有为广西当局承认或与广西实力派合作的工作单位。胡愈之、杨东荪则更以救国会会员身份公开在桂林展开多方面的工作。1939年在桂林出版了救国会的机关刊物《国民公论》，并由救国会投资与李、白的智囊咨询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合办了《文化供应社》，出版了上百种社会科学、知识、文学和通俗读物。胡愈之先生记道：“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

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界人士接触，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民主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势力，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的绿洲。”（胡愈之《自传》稿3——33页）

工作的开展，使救国会本身的组织如何调整加强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1939年至1940年中救国会内部进行过反复讨论、一再研究，而意见未能统一。因为那时救国会在武汉和重庆的群众工作都很有发展，所参与、联系或推动组建的团体不少都和共产党的地区工作交叉、交错进行，共产党就在救国会内组织了共产党的党团，以便于及时互相配合协调工作关系（这是一个很小的党团，成员只有钱俊瑞、王炳南、李庚等三人）。此刻，“救国会怎么办”的问题就又被党团提请党的领导进行考虑。钱俊瑞同志生前在就李庚的历史情况给中国文联党组写的证明材料中这样说：“从1939至1940年，我在武汉和重庆，主持救国会党团工作，当时和李庚同志常有工作上的往来，1939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当时我党南方局曾考虑通过适当方式组成广泛的‘民主政团’同盟，来和国民党抗争。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救国会从一个救亡的群众团体改编成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当时我立即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磋商，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他们的意见，恩来同志就要我起草一个使救国会成为一个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的纲领草案。我在起草的时候，约了几位同志商量，其中就有李庚同志参加。后来这个草案（《重建救国会纲领》）起草好了交给南方局。”“大约在1939年秋冬之际，当时南方局已酝酿整个组织‘民主同盟’的问题，要有救国会几位领导人出面组织，所以《重建救国会纲领》问题，暂不做考虑，我就和李庚等同志以后不再在救国会内部谈这个问题了。……”“以后组织上对于李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什么意见和

处理，我都不了解。现在只把这件事的经过情况，负责做上述证明。”（原函存中国文联“李庚档案”）

当时周恩来同志恰巧因事回延安，重建救国会的建议是留渝代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博古同志和凯丰同志否定的。这一设想只好作罢。

这件事反映了党内对如何估计中国的中间力量，应否发展中国的民主力量；是否要努力促进有多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是有不同意见的。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的正确意见不能贯彻，得不到实施发展，事实上影响了那一时期中国民主力量更迅速更有力的发展。

自此以后一段时期，救国会仍以“无形的联系方式”进行工作，没有再提“恢复”或“重建”的问题。也放松了新建一个全国性统一阵线的抗战救亡团体的努力。皖南事变后，救国会就转向更实际的联络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了。

1939年11月，由救国会联络了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共同发起，在重庆青年会会堂，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同年末，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后形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逐渐为以后民主同盟的建立，做了一些组织准备。

到抗战胜利，救国会于1945年冬在重庆正式召开了一次救国会的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并选出了以沈衡老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又随即在上海重建了上海的救国会组织。

全国解放之际，救国会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迎接解放，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1949年冬，救国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决定宣布解散，我参加了那次宣布的招待会。会议进行中，周恩来同志匆匆赶来，发言表示惋惜。我记得他曾说过救国会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同甘共苦地合作过，今后还有很多

工作需要你们做，你们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嘛！为什么要解散？也没有和我商量一下。现在你们已经宣布了，我来晚了。我希望救国会的朋友们，今后还一样和我们密切合作。

· 政治史料 ·

记盛世才在新疆最后一次的大逮捕及其前因后果

金 绍 先

作者曾任国民党新疆省省委委员，本文通过其亲身经历，介绍盛世才在新疆军阀统治最后一幕的情况及倒台的经过。

1944年8月事变，是盛世才在新疆最后一次的大逮捕，也是结束他自己的血腥统治和以暴易暴地导致蒋介石进驻新疆的决定性事件，也可以说是直接导火线，应当引起史家的深入研究。当时我虽然不在逮捕之列，而那次大逮捕主要是以蒋介石派往新疆的党政人员为对象，我的同僚和朋友多数被捕，亲眼看到他们被捕的现场，并曾设法营救他们出狱，在他们出狱后又谈到了被捕后各式各样传奇式的经过，因此有可能记述那次大逮捕的概况及其前因后果。

翻云覆雨的刽子手

1933年盛世才利用机会夺取新疆政权以后，在1942年以前长期地取得苏联军事、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巩固了政权，在生产建设上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1938年前后并取得中共的援助从延

安派去很多政治、技术人员。当时的新疆，俨然是一个独立国家，联共、中共和它的关系，显然是反帝统一战线的关系。盛世才后曾去过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同志的礼遇，并曾接受过苏联的巨额建设贷款；还派了他的胞弟盛世骐长期在苏联留学。他在新疆组织反帝会，揭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所谓“六大政策”，公开传播马列主义①。据说，他曾强调新疆的特殊情况，暂时不宜以共产党的面貌出现，苏共、中共人员只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同意不在新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实际，他这种作法，只是一种欺骗，只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而实行其法西斯专政之实。

在盛世才专政的十年间，十足地以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的姿态出现，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刽子手。除公开的反帝会组织外，还有一个由他个人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叫“六星社”，实际是一个极严密的特务组织，反复无常，大兴冤狱，在全疆范围内，每隔一定时期必有一次大逮捕。先后被捕押，被杀害达数万人。他曾提出两句口号：“新疆没有共产党，要有就是托派，新疆没有国民党，要有就是汉奸。”因此，不知有多少人在“托派”或“汉奸”的罪名下作为牺牲品，造成极度恐怖局面。就他控制部下的方法来说，省、专、县各级重要干部，特别是与他有旧交的一部份人，一般是轮番入狱，轮番执政，每过一定时期，必有一次大的更替，释放一批逮捕一批。被逮捕的遗缺，一般即以被释放的递补。在我担任新疆日报社长时期的一位副社长。原是盛世才的小同乡（东北籍），和盛同时在日本留学。并同时参加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之类的活动，后来被盛邀请去新疆工作，而在十年内便经过三次逮捕，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实际这位朋友极其忠厚老实，并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当时新

① 在盛世才反苏亲蒋以后，把当时新疆社会流行的马列主义书刊如苏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等全部收集起来，堆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一间房子，并规定只有省级干部可以阅览这些书刊。

疆类似这种遭遇的人是很多的。由此可见，盛世才这种恐怖作法，其目的不仅是诛除异己。

1942年盛世才看到希特勒攻入苏联境内，莫斯科危急，以为苏联不可靠，而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参战，重庆政府的抗日战争很有希望，他便决心反共亲蒋。当时，他的弟弟盛世骐已回到新疆任旅长，由于在苏联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反对盛世才反共亲蒋的决策，被盛世才暗害，并杀掉盛世骐的夫人以灭口，（诬称他的夫人与人通奸，奸夫暗害了盛世骐。）其手段之毒辣残忍，可以想见。接着逮捕中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一百余人，陈、毛、林等旋被枪杀，党外人士杜重远等同时遇害。苏共人员（多系顾问）则逼令全部撤退。以此向国民党表明心迹①。

一股暗流

1942年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陪同宋美龄亲往新疆完成盛世才反共亲蒋的谈判以后，重庆方面便积极进行渗入新疆的工作，先后派去了不少的党、政、科技人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在1943年春天成立的，朱家骅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选派黄如今（留美）为书记长，于振瀛（留日）、童世荃（留德）、张志智、徐观余（留美）等为委员。据说，在当时国民党的省级组织中，这是一个拔尖的班子，由国民党要员梁寒操（被称为三民主义理论家）率领去新，看作一件隆重大事；另一部份委员则由盛世才就地保荐他的警务处长李英奇、新疆日报社长宋念慈、社会服务处长何耿光充任，由蒋介石加委，并以盛世才为主主任委员。1943年冬，由于于振瀛辞职内返，我被派任新疆国民省委委员，补充他的遗缺，1944年3月到达迪化。在我离渝赴新时，朱

① 以上追记我到新疆以前的情况，系根据曾任反帝会负责职务的出狱人员口述，与我们当时各方面了解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

家骅对我强调“一切尊重和依靠盛世才办事”。一般说来，这句话，确实代表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对新工作的方针。省党部的成立，仅仅被看作蒋介石统治权扩张到新疆的一个象征。盛世才警务处爪牙遍及全疆，具有极高权威，重庆为了取得盛世才的信任，答应不派遣特务去新，省党部也不设特务机构——中统室，甚至连一部专用电台也没有，实际不能有所作为。尽管这样，重庆人员与盛世才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也可以说是八月事变以前的一股暗流。

我首先发现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同时牵涉到重庆人员内部矛盾的一件事，即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根据国民党中央给我的任命书，仅为新疆省委委员，但中央日报披露的新闻，却说是委员兼组训处长。由于我系补充于振瀛遗缺，而于原系兼任组训处长。故不以为异。在去新前，曾向朱家骅提出这一问题，朱答以“中央只能决定委员职务，组训处长应由盛主任委员提出。”而在我到达迪化后，黄如今却告诉我盛世才在我到达前几天，已向中央提出林伯雅兼任组训处长，在我看来，林伯雅先到新疆，盛对他，已有了解，提他兼任组训处长，是容易理解的，而黄如今却认为这是他对中央日报消息的一种对抗。非常重视这件事。

其次，在我到迪一星期后，盛世才在“西大楼”亲自主持了一次大宴会，欢迎重庆各方面派去的人员，我也是被欢迎的一个。会场警戒森严，气氛严肃，不但在开始和结束时奏乐，在宴会进行中每进一道菜也都奏乐。给人一种王朝御宴的印象。在盛世才致欢迎词后，被欢迎人员也一一致答，我的答词主要是恭维盛世才治新成绩，表示愿在他的领导下为建设新新疆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原认为这是极平常的措词，而张志智却对我加以讥讽，意味着我在开始走“盛世才路线”。由于重庆派去的五个委员住三处：黄、童、张等同住迪化满城一号委员住宅（我也同住此处），而林、徐则分住在省党部和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内，我发现他们

对盛世才的态度，显然分为两派。林、徐二人对盛世才比较接近，特别是林兼任组训处长，提徐兼任中训团副教育长，都被指责为“盛世才路线”。黄、董、张等和国民党的关系较深，个人英雄主义也比较浓厚，不满盛世才事事控制的局面；张志智在某次会议上反对盛的决定，要求国民党在各县发展党员，先要通过警务处了解，张认为这是“警察国家”的作法，被盛批评“政治性的错误”；于振瀛也因为同盛的意见不合，负气辞职，他们居尝以贯彻中央意图、维护中央威信的姿态出现。所谓重庆人员与盛世才的矛盾或暗流，不过如此。有人认为这是八月事变的导火线，实际不是这样。

阴云密布

先是，在我到迪前的一个月，盛世才开始一反常例不出席省党部和省政府的例会，也不参加其他一般性公共集会，黄如今等已经有了发动事变的预感。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两路）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抗战局面日益艰难；相反，希特勒却被苏联打退了。另一方面，北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的人民力量（解放后才知道其中一部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力量乌斯满等）陆续起来，使盛世才穷于应付，黄如今等耽心盛世才反苏亲蒋的政策有了动摇，又要来一次“苦迭打”。根据他们了解，盛世才每当发动一次大逮捕以前，必有一个较长时期不见客，不在公开集会上露面，因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他密谋布置和制造案情，同时企图使人相信他之所以不见客，正是因为防止“叛乱分子阴谋暴动”或“暗害”，证明案情不是由他制造出来的而是实有其事。事实证明，这是暴风雨到来前阴云密布的一条重要规律。

我和盛世才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开宴会的前几天，他约我和黄如今去“新大楼”吃便饭，他谈到了阿山军事紧急，似乎是对

他不出席会议作解释；他又谈到三区“叛乱”同“老毛子捣鬼”（老毛子是歧视苏联同志的口语）分不开，这是当时新疆反动派的一般看法。根据这次谈话，我们不但不因为盛的解释放下心来，而是给我们的“预感”找到了一个旁证。他已经认识到反共反苏和结果，将使新疆永无宁日，将是他的统治新疆的严重威胁。如果这样，那末他所制造的事变，将不仅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对地方人员下手，而是要牵涉到重庆派来的党政人员——即以我们为对象，因此进一步警惕起来。但除了给重庆写信谈到这些预感以外，“警惕”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不但手无寸铁，就连写信、看朋友也受到暗中监视。我们给国民党中央、甚至给内地普通朋友写信，如果涉及新疆政治情况，就不敢随便投邮，只有托重庆派驻迪化的航空总站长趁便机妥人带走。黄如今几乎是每次飞机都有信带回重庆，据我了解，建议重庆抓紧时机多派军队入新，是一个经常的重要内容。那时国民党唯一的入新部队——预备第七师，已经开到迪化，驻在老满城郊区。有一次，师长李禹祥等为了招待一个自内地去迪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约我去师部吃晚饭，因为多喝了酒，醉的不成样子，在师部住了一宿。这是我也是其他同僚从未有过的事——尽管是极平常的事。次日清晨，却派来了一辆汽车接我回去，我原以为是黄如今派的车子，事后才知道他并没有那样做，显然是盛世才的特务故弄虚玄，制止我们和军方接触。此后，我即埋头写文章，完成《宪政运动的基本认识》一文，先后在新疆杂志和新疆日报发表，并作为省级扩大纪念周讲稿，同时根据有关单位的邀请向新疆学院、中训团、新疆女子学院、公路局、警官学校等机关学校兜售，企图以此突出自己的书生本色，有别于一般“党棍子”，转移盛世才的注意。实际我们当时犹如笼中鸟、俎上肉，任人宰割，逃不出魔掌控制，只有坐待大祸临头。

同年5、6月间盛世才开始了小规模的对地方人员的逮捕，断

断续续地进行着，省党委宋念慈、何耿光、程东白先后失踪^①。从此盛世才根本不和我们见面，书记长电话约见，也借故推托，只在公文上书面批办。一步一步地证实了我们的预感。当时重庆派往新疆的高级人员如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林继庸、军分校副主任龚愚、新疆学院教授徐庄本（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等都是欧美留学生，大家气味相投，处境相同，他们夫妇经常地早晚和假日来我们的住宅见面，一般是打桥牌消磨时光。在互通消息，交换见闻中，大家都感到局势一天严重一天，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横逆之来，迫在眉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暴 风 雨

暴风雨终于到了。8月11日半夜，盛世才派汽车请黄、童、张等去开会。省党部自己有汽车，过去请开会，只用电话通知，这次突然破例，却又不请我，大家知道事情不妙。当童世荃把我叫醒，告诉了原委，我去到院内，黄如今把我向来请的特务介绍，对我们仍然保持一般礼貌，再一次说明没有我。当时我和留下的眷属研究应付事变的办法——实际只有束手待毙。果然，被请的人一去不返，省党委未被“请”的，只有我和徐观余。一向认为“走盛世才路线”的林伯雅，连同他的老婆也一道被“请”去了，重庆人员绝大多数被捕，林继庸、徐庄本在内（包括其他中级干部），共有50多人，同案株连的达数百人，仅迪化市内就在百人以上。第二天上午，盛世才的参谋长汪鸿藻又请我去开会（这也是破例的，过去只有盛世才请开会），我随带简单衣物和毛巾、牙刷等赴会，实际是准备入狱。到会后，重庆的高级人员（如中央银行经理马彦章，邮政总局局长沈养义等）都在座，内容是通知我们关

① 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二期《盛世才简传》一文中说逮捕何耿光、程东白等人为1944年4月。

于昨天晚上大逮捕的事，说他们“阴谋暴动，企图颠覆新疆政权”。

制造假案的三部曲

根据出狱人员所谈审讯情况，特别是后来重庆派去的军法审判团团长余廷襄（和我同乡）向我透露的内幕看来，8月事变，盛世才制造了一套完整的假案情。主要是说重庆人员中暗藏有共产党人，以黄如今、林继庸为首，联合中央、地方人员，串通苏联领事馆，阴谋暴动。在同年1、2月间，开过多次秘密会议，3月以后继续秘密活动，会议地点是苏联领事馆。这一假案的制造，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由盛世才督同警务处编造案情，连同各种原始材料（证人、眼线、密报等）对每一具体细节都准备了有根有据的一套。第二，逮捕次要或协从分子用“指名问供”（例如你们在某日某地开会、某人主席、讨论问题等）“刑讯逼供”（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事后我们看到几十种刑具）方法使多数人屈打成招，取得一致口供。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所谓审判委员会，并以高等法院院长为审判长。所谓院长，自然也是盛世才的特务爪牙，由盛保举经过重庆任命的，但他很少参与实际讯问工作。第三步，逮捕首脑分子，用第二步供词作证据，并用第二步相同方法追取供词。这是盛世才制造假案发动事变的又一重要规律——三部曲。8月事变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同年1、2月间开始的。即他开始不露面时期；接着进行第二部，即断断续续逮捕地方人员时期；8月11日大逮捕是最一步。由于我是1944年3月到迪化，未赶上他们预定阴谋活动的高潮期间，因此未被株连。而在审讯林伯雅夫妇时，还力求“扩大战果”，迫使他们供认我也参加了3月以后的阴谋活动，其原因是他们根据密报侦知我与林伯雅原有私人友谊，到迪后相互接触较多。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结果并没有对我作“补充逮捕”。在审讯中林伯雅夫妇还被认为黄如今集团有计划地安置在盛世才身边刺探机密

的人。在被捕的重庆人员中，特别是省委级，都受尽了各种酷刑，黄如今被打伤腿骨，林继庸被打断指头，终于按图划诺，一一招供，唯一例外，只有张志智坚持不招，被国民党看作“有气节”的“好同志”。这是后话。

自食其果

大逮捕后，盛世才为了表示对国民党之门尚未关闭，把案情报告重庆，并强调及时镇压叛乱的重要性，不及事先请示，而他所逮捕的又都是所谓暗藏在国民党省委中的共产党人或走共产党路线的人，表面上还是和国民党走一条道路——反共的道路。重庆方面当然不会相信这一套，尽管省委级人员品色不一，但无论怎样，决不会嗅出一点点共产党人的气息。而我在事变之后，由于正义感所驱使，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安全，作了如下的判断：盛世才既然认为有必要留下一部份重庆人员，便不致随便扩大打击面，继续逮捕；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足不出户，噤若寒蝉，亦难幸免。事变后的第三天照常出席省党部纪念周，并以暗含对抗情绪的“国家至上”为题作报告；一面慰问林继庸、徐庄本等被捕人的家属（当时新疆有一条戒律：不与罪犯家属往来）；一面写信给重庆呼吁营救（找不到军用机托带，不敢投邮）。旬日后蒋介石派去了朱绍良和徐恩曾，下榻在“东花园”，我曾利用盛世才为他们设宴洗尘应邀作陪之便，冒险找他们密谈。并借用他们的电台致电重庆，提出处理意见，主要是报告事变真相，并认为“如不作武力解决的准备，新疆终非我有”。当时，朱、徐的室内、外都布满了盛世才的密探，表面上说保护，实际上是监视。朱、徐曾招呼我不要多耽搁时间，并且告诉我在盛世才陪同他们审问黄、林等人时，黄、林等仍然不敢翻供。

不久，朱绍良再到新疆，其时重庆已发表吴忠信继任新疆主席，先由朱绍良把盛世才请到重庆作农林部长后再行赴任。而在

朱绍良到达3日后，盛世才才作出最后决定。在这几天中，盛部有两派意见，其中一派还想作垂死挣扎，朱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胡宗南驻在迪化和逼近星星峡的部队，都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盛世才终于在这种军事、政治的双重压力下（这不是说我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被迫于9月中旬悄悄地离开了难割难舍的“新疆王”宝座^①，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黄金5万两向蒋介石作献礼。但是临行前夕，仍然秘密屠杀了狱中重要人员，据说在百人以上，为了此后在蒋介石手下讨生活，不得不灭口图存，心狠手毒，至此已极！

所谓军法审判

同年9月底吴忠信继任盛世才作新疆主席。吴是我在蒙藏委员会工作多年的“老上司”，形势更加对我有利，竭力促请他无条件地全部释放被捕的重庆人员，结果只提前释放了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主要由于第一，盛世才在新疆十多年，根深蒂固，到处布满了他的爪牙，在没有彻底根除旧势力之前，不能采取过急步骤，这也是蒋介石用部长位置给盛世才作为下台过渡的原因；第二，由于同样理由，重庆对盛世才的大逮捕并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式。而是答应经过军法会审后再作公开处理，在中央审判团未到前，吴忠信无权释放被捕人员。因此他一面派我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据说这是国民党中央接到我汇报案情的电报以后作出的决定，却被盛世才留中不发。吴忠信当然乐于顺水推舟。一面又叫我代表他慰问重庆被捕人员，适当改善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待遇。由于盛世才惯于采用隔离监禁的办法，在慰问工作中，几乎跑遍了迪化市内各种各样、公开秘密、大大小小的监狱，在反动统治下苦难深重的新疆，实际“犹如一座大监

① 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二期（盛世才简传）一文中说盛世才于1944年9月11日离开新疆。

狱”的印象，至今难忘。

不久，以军法执行总监部名义，由中将军法官余廷襄率领的审判团到达迪化，其中绝大多数“审判官”是中统特务（其时已有大批的军统、中统陆续进入新疆），首先经过一般审判程序（实际只是走过场），重庆人员于12月底或1月初全部出狱。对所有其他在狱的地方人员，特别是所谓“政治犯”，普遍作了“审查、甄别和争取”工作，实际是卖一番狗皮膏药进行诱骗以后，分别释放和安置。其中真正进步人士，是极个别的。我也曾在工作中和他们起过配合作用，例如我曾代表省党部和那次出狱的包尔汉同志见面，表示慰问，并商谈安排问题；又曾为赵丹等4位同志设宴饯别，送回重庆。自然，在工作中接触更多的还不是这一类人。至于在狱的延安同志，是在三区革命力量日益扩展的压力下，张治中同志奉命去新进行和平谈判以后，根据毛主席和蒋介石双十会谈协议，开始准备释放。记得蒋经国当时去迪化住在吴忠信的“新大楼”里，很忙碌了一阵，据说他的任务是为了对准备释放曾在苏联与他同学的共产党人作争取工作。迟至1946年6月（当时我任迪化市长），终于把全部120多人送回延安。这是和审判团毫无关系的，而我在审判团结束工作时，却在新疆日报写一篇“行将归去的审判团”的社论，对它歌功颂德了一番。

众矢之的

黄如今、林继庸等出狱后，即回重庆，他们以“新疆统一”的功臣自居。1945年5、6月间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①，他们从会内会外向盛世才发动总攻击，目的在向蒋介石诉苦表功，同时对盛世才仍居高位表示愤懑，因此盛世才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表面上

^①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书中记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召开。

替盛世才撑腰，说什么“盛世才纵使有千错万错，但他把完整的新疆归还了国家，立了大功”；另一面，对当时的被捕人员仍然是“论功行赏”。任命黄如今为长春大学校长，张志智任西康教育厅长。据说他们欣赏张志智在被捕时“有气节”，希望张以对抗盛世才的精神对抗刘文辉，却被刘文辉挡驾，不能到任，后来改任立法委员。实际盛世才的垮台，主要是迫于阿、塔、伊三区人民的革命力量，谁也不能贪天之功，新疆不是归还了蒋介石，而是在几年之后，归还了人民，物归原主。至于盛世才，也早已作为历史渣滓被蒋介石扔掉了。

结 束 语

关于盛世才在新疆最后一次大逮捕的情况，就我直接间接所见所闻，略如上述。而他发动事变和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一般看法（包括包尔汉同志对我谈的看法）认为他是错误地把苏共、中共分开，他以为1942年对苏共的背信弃义行为，不像对中共那样过分，有可能通过大逮捕，从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断绝国民党关系的决心，挽回苏联的关系，进一步通过苏联缓和三区革命力量和对抗蒋介石，从而实现自己继续割据新疆的目的，但是怎样转向苏联，则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他离开新疆以前还没有具体作法，其所以仓卒发动事变，只是迫于蒋介石部队入新不可抗拒的形势，不得不作孤注一掷。另一说，在他发动事变以后，已经提出了“投靠”苏联的具体要求，苏联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拒绝了他，因而他的翻云覆雨的手法不能得逞，最后只好乖乖地向重庆投降。有人认为，无论前一说或后一说，有一个共同的难于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制造假案继续贯串着反苏反共的内容？而且牵涉到苏联领事馆？难道他以反苏反共作手段企图达到靠拢苏联的目的？难道他真以为这样大规模的假案，可以绝对保持秘密，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其实，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盛世才这

个反复无常、脸厚心黑的刽子手，远在1937年就曾当面请示斯大林批准加入联共，好把新疆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加盟共和国。”他异想天开，不择手段，任何弥天大谎，都可以编造出来，也说得出口，没有什么奇怪。

美商美亚代理保险公司记略

林豹岑 王新厚

—

美商美亚代理保险公司系一家大代理保险公司，也是美帝在华经济侵略机构之一。创办人史丹(Starr)，1919年来华，挟了一只皮包开设这家公司，初时规模不大。据说，某年上海北苏州路一个堆栈（即仓库）失火，该公司赔款迅速，被灾户深为满意，从此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更因它所代理公司多，承受保额大，业务日有起色。美亚在美国设有机构，在上海中山东路17号四楼的机构，称之为远东总公司。它的内部组织，主其事者不称经理，而称总裁(President)。公司资本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登记数字为规元230余万两。这家公司对保险业务有托拉斯之称，代理世界各国保险公司有四十九家之多，主要的有美国的海龙产物保险公司(Handuer Fire ins.Co.)、福美产物保险公司(Firemen's-ins.Co.)、友宁产物保险公司(Natiomal union Fire ins.Co.)、瑞士的联宁产物保险公司(Federal ins Co.LTD)、业兴产物保险公司(Smiss General ins.Co)以及香港的四海产物保险公司(Interationial Assurance Co.LTD.)等。保险种类有火险、水险、船壳险、火车险、航空险、邮包险、汽车险、玻璃险、公路险等。除它们本身直接承保外，也接受再保险（即接受别家承保的一部）生意。当时华商保险公司林立，但是资本多不雄厚，特别是抗战以后，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除了不动产之外，其他已无

价值可言，所以遇到大额产物保险华商公司是无法承保的。它们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生意，而自己的吃额（保险公司术语即承保的意思）最多百分之五，其余只好双手拱送到洋商公司请其承保。这样美亚就可垂手而得，坐享其成，与华商公司发生关系。美亚为了迎合保户的心理，也签发一种外币保险单，港币、美金、英镑、瑞士法郎，任从客户选择。因此，保户乐于投保。美亚就获利倍蓰。但当时政府的法令，是不许保险公司签发外币保单的，它们就交由香港美亚签发，名义上与上海美亚无关。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欺不了人，可是国民党政府奈何它们不得。

史丹是美亚公司中的大股东，在公司不担任职务，常往来上海纽约间以及世界各国，为发展美亚业务而奔走。上海公司业务，史丹委托朱孔嘉全权主持，并畀以副总裁职。公司财政由朱弟朱孔昭管理。当时美亚内部职员谓“美亚的天下是朱家的天下”。

美亚由于业务发展，每月保费，数字庞大，应缴各代理保险公司的保费，又可延缓二月或三月缴付。它就利用这些现金在原有的业务外，经营其他业务，如友邦银行、信通汽车公司、顺通汽车公司、四海保险公司、《大美晚报》等等，并在泰山保险公司属浙江兴业银行系统投资。

美亚业务在抗日战争曾停顿一时，胜利后，史丹就来上海布置业务，当其来时身着戎装，腰缠红带，俨然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位要员。平时亦常与亲美派孔宋联络。马歇尔到上海，史丹特为设置行辕招待。闻当时美亚公司的一位女秘书是宋子文的妻妹。可见美亚的营业能如此发展，也有它的来由的。1949年解放军节节胜利，美亚的地盘日渐缩小，见前途无望，转向非洲去发展了。同时总公司迁至香港，朱孔嘉亦去香港，仍主持公司事务。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的后一年，美亚被我人民政府接管。

二

美亚汉口分公司于1923年设立，第一任经理高福特(美人)，代理花旗全球、合群、新大陆三家保险公司，花旗全球华经理为康辛潮，合群为闵绍騤，新大陆为施祖赓。华经理无薪给，只按所兜揽的保费提取佣金。1925至1926年间经理为叶高立高夫(白俄)，1928年后为武村斯格(白俄)，1933年后为白尔生(美人)。1936年白离去，始由原任该公司秘书(俗称大写)的华人龚锦文任经理，后由沈仲繁继任，至汉口沦陷时期歇业。1945年抗战胜利的翌年5月间，美亚仍派沈仲繁来汉任分公司经理筹备复业，代理三家保险公司：即海龙、福美、友宁等三家。但公司本身不作业务，只由公司委托代理人经营。沈仲繁那时正在物色代理人，林豹岑适于该时来汉，由沈的关系，代理海龙；其余二家，由林委托胡焕章代理友宁，俄人潘乐夫(L.T.Panoff)代理福美(潘乐夫系白俄，抗战前任汤笙洋行会计师，1948年去英国，福美由朱仲瑜接办)。沈仲繁因为经常在上海不能来汉口，所以将汉口美亚公司的职务委托林豹岑代为执行，但是林与美亚所订合约，名为经理，实未支取薪水，一切费用全赖佣金收入来开支；遇到公司有关事务，又须代为料理，这等于有义务无权利。业务方面，虽然三家公司名称不同，而对外兜揽生意，仍以美亚作幌子。美亚方面有一笔生意，即有一笔收入，没有生意则不负任何开支。三家公司同属美亚系统，但各自为政，时常发生矛盾。当时业务以海龙较大，但海龙业务以水险为主，火险为辅。福美因有潘乐夫的关系，教会产物投保较多。友宁业务不大。这三家生意完全根据合约办理，超越合约的业务，须请示上海总公司应允后方能接受。海龙除经营合约上规定的水火险外，也获得公司的特许，可经营兵险、航空险、船壳险、公路险、再保险、外币险，保险单除船壳险、外币险由总公司签发外，其余则授权代理人在当地签

发。费率水火险按照公会规定收纳，兵险由公司临时议订，最高每千元15%，最低8%，视当时情况而定，但在形势紧张危险无法避免时，公司得拒绝承保。船壳险也由公司估计，要视船壳的材料和年龄而定，铁壳收费较轻，木壳比较高昂。其次美亚给与代理人的限额(Limit)系以美元计算，例如水险方面，一级船限额为4万元美金，木质机帆船为5千元美金，以当时黑市价格折合每1美元约为法币10万元计算，一级船限额即有法币40亿元可以承保，有时且过之。限额之高，为当时汉口各保险公司之冠。但此限额为美亚各代理人之总和，故各代理人所接受每船的保额均须填表送交海龙，由海龙汇总电告上海总公司备案。火险限额与水险不同，由美亚另行分别给与，但亦高出汉口其他各保险公司。美亚再保险的业务也很活跃，由于限额大，各保险公司自身不能承受的保额，纷纷送交美亚承保，所以在那时汉口华商的保险公司也与上海同样不和美亚发生关系是绝无仅有的。保费的收入，每月由美亚向代理人收取，并代为存入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美亚专户，或代为汇交上海。每月净保费收入，初开办时只法币数百万元，以后由于业务日渐发达，保费收入增加，最高曾达10亿法币以上。平时每月平均在五六亿之间。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时，才停止外币保险。1949年5月汉口解放，美亚停业，同年8月申请复业，但只海龙一家，友宁、福美并未复业。

三

汉口自清末开埠为商埠后，保险业务即应运而生，清末民初间，洋商和华商均纷纷设立保险公司，洋商中主要有禅臣、咪咤、礼和、瑞记、泰来、(以上德商)太古、怡和、华昌、信孚(以上英商)、立兴、永兴、良济(以上法商)等；华商中主要有仁济和、华安、先施、永安、联保、联泰、金星、羊城等等。这些公司都是在美亚来汉以前设立。后来，除太古、怡和及少数公司侍

其特殊背景，业务得以维持不坠外，其他华商、洋商多数因亏赔过大或业务不振而歇业或萎缩，唯美亚则后来居上，业务日趋发展，俨然为斯业巨擘，揆厥原因，除代理公司多和承受保额大的有利条件外，约尚有以下数端：

1. 上海苏州北路仓库失火，系美亚系统的新大陆公司所保，保额90余万元，赔款处理迅速，该公司藉以大肆宣传，公司声誉从而增高，便利了业务开展。
2. 1928年间，白俄武林斯格任经理时，适苏联来汉组织协助会经营红茶，所有运输、存栈保险完全交由该公司承保，每年保费收入达10余万两，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赔偿，为公司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渗进华商保险公司，扩大再保险业务。如投资于浙江兴业银行系统的泰山保险公司即其渗透联络之一例。各华商商业银行大都附设保险业务部，由于资本不足，自身吃额微小，所承揽的保险生意，绝大部分划归美亚再保，使得华商银行的保险机构，简直成为美亚的附庸。
4. 美亚业务原系代理行性质，其主要收入是，按所收保金，提取25%的佣金。其后基础渐固，乃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兼营保险业务，既藉发行股票吸收大宗资金，同时利用代理业务的原班人马，费用开支无所增加，业务范围扩大，也助长了资金积累。
5. 在经营方法上，善于适应客观情况，推广营业。当时一般保险行商的营业时间自上午9时迄下午4时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例假不办公。这时间限制于一般保户很不方便，尤其是保水险的，装船报关在在需时，往往难于及时取得保单。该公司有鉴于此，授权华经理在办公时间以外，接受保险业务，只须华经理在投保单上签章后即生效，并可持以向银行办理押汇，次日即签发正式保单，保户无不称便。
6. 在薪金制度上，使用牢笼花招，掩护剥削本质，如对于华经理除给予佣金外，复有分红办法：即每届年终按该华经理全

年所兜揽的保费总额扣除提存40%为赔款基金及25%的公司开支外，再减除该经理本年内所发生的赔款损失数，如尚有余则按此项余数之5%作为红利分给经理（例如该经理全年收到保费总额1万元，扣除提成40%及开支25%计6,500元，下余3,500元，如本年未发生赔偿损失，则按3500元的5%即175元作为红利。如本年赔款损失超过3,500元，则无红利可分），因而该公司的华经理既努力招揽生意，又认真选择保户，这对该公司推广营业、减少赔款损失，起了一定程度的良好作用。其次，对于所属职员及华经理分给优先股票。该公司股票面额每股10两，在市值涨达每股约20余两时，发行一定数量的优先股，限于该公司的职员及华经理，按每股15两认购，先缴款1/5，其余则在年终红利下扣缴。同时所属职员的薪给，既较一般商行较高（大写月薪160两、打字员及登卡员月薪均为60两），年终例有双薪及逐年循资加薪。身后也有一定抚恤。这些小恩小惠，使得该公司的一些职员阶级意识模糊，俯首下心，唯洋人之命是听，有的甚至“认贼作父”，走上“洋奴化”的可耻道路。

解放前外商在津的保险事业

许良灏 戴学熹

许良灏从民国5年（1916）任华商华安保险公司职员起，直到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在保险事业中由一个普通职员，直升到襄理、副经理和外商保险的买办，以后又曾断续地做过法商安全保险公司和其他华商保险公司的津方经理人。前后30余年的时间，对于保险事业在中国北方发展的过程和经营情况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和认识。

戴学熹也在洋行保险行做了6年多的职员，对洋商在津经营保险事业的方式和内幕情况，也从工作的实践中，获得一鳞半爪的认识。现在我们虽然都早已脱离了这项工作，而亲身所历，尚能忆其梗概，尤其感到外商就保险事业中从中国掠夺去的金钱，也决不在其他经济侵略手段所获得者之下。现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掠夺的机构

清末帝国主义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是组织严密，方法万端的。第一：它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出进口机构（洋行）。洋行一方面用极廉的代价向中国内地搜罗土特产，一方面又利用中国工业落后和食品不足的情况向中国输出大宗剩余工业品和副食品，打击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幼苗和广大农村的发展。第二：它们组织专门向殖民地提供周转资金和办理押汇的银行（像汇丰、麦加利、汇理、华比、花

旗、美丰、德华等银行)，给它本国在华商人经营上的种种便利，吸收着大批华人手中的游资，并夺取了中国金融机构在对外贸易方面资金调度的领导权。第三：组织航运（像太古、怡和、大来、三井等）。不独中国的远洋运输由它们一手包办，甚至中国沿海口岸无论中外货物的来往调济，也多半要以它们的运输机构和运输工具是赖，侵夺了中国仅有的航运事业（招商局）。第四：就是我们本篇所要谈的题目——保险事业。

保险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

据我们所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保险事业不独很发达，而且社会上对于保险事业的重视，要超过一般银行或进出口行商之上。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集会或饮宴酬酢，保险公司的代表，都要被让在首席或有优先的发言权，而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中，确实也起着调整金融（兼做信托放款业务）和保障安全的作用。1929年起，天津永丰洋行代理的英国保慎保险公司（Alliance Assurance Co.Ltd.），是一家在欧洲并不算大的保险公司，但除资本外，准备金就有30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我国银洋11元左右，合规元（在上海称呼银两的行话）7两有余。反看同时华商组织的在国内要算最早的第一个保险企业——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它的实备只有规元100万两。所以保险事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地位是可以想象的。

保险事业的种类

任何一种事业创立，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保险事业，当然也不例外。英国产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事业的分工和逐步的专业化，保险事业也就逐渐地从各企业自己的生产事故准备金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另一个专门的企业。最初只有火险和

水险(包括水渍、盗窃、和霉坏等)，以后根据发展和需要，才有了多种多样的保险。如水陆运输险(也包括在途的水火险)、火车险、汽车险、船壳险、盗匪险、玻璃破碎险、兵险等；更就个人专业工作的意外事件，又有了眼睛险、手指险、腿脚险(如职业足球家和舞蹈家)、人身意外险等多种分类。这当然只不过是就我们从事保险事业的过程中所目睹耳闻的一些。至于各国保险业究竟有多少种类，我们未曾作过这类的调查和统计，也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天津保险业概况

天津外商保险业是随着洋行业务的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清末英商怡和、太古等洋行在津设行，它们除经营进出口外，还在码头建立了容积广阔的仓库，同时又经营着中国沿海和远洋航运。这些仓库的存货和船只的运输，都是保险业务的对象，所以它们又代理承办本国在华的水火险业务。以后各国在津设立的洋行，也都兼办保险。它们最初代理保险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进出口业务的方便。因为第一，大宗商品的存放和运输，由自己代理的保险公司承保水火险，不独省掉了很多手续，还可以赚到代理津贴和保险费内的抽成佣金，尤其遇有事故，可以自己直接向保险公司或直接和公证行联系办理赔偿。所以各国在津的进出口洋行，大都代理着一家或几家它们本国或它国保险公司天津的业务。这时中国的商民对于这项新兴的事业还感觉很陌生，对于赔偿的问题也都还存着半信半疑的看法。

1912年袁世凯在津制造兵变(所谓正月十四事件)，给外商保险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当华人眼见由外商保险行承保的财产遭了火灾或抢劫，居然大部分都获得了赔偿，才开始重视了这个行业，纷纷投保。于是外商的保险业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和发展起来。以后黎(元洪)段(祺瑞)的政争和北洋军阀的相互倾

轧，不断地给中国商民随时随地遭有意外的警惕，同时也给外商保险业务以深入和推广的机会。

外商在津的保险事业，初期都是由进出口洋行代理兼办。由于中国政局的不稳，洋商看到了他们发财的机会。所以辛亥年以后，天津又添增了一批专营保险业的行号。就我们所知，第一个是英商华隆洋行(Jippen & Co.Ltd.)专门代理保险业务。随后又有英商保安保险公司(Union Canton Ins Co.Ltd.)，荷商荷兰保险公司(Jaoa Sea Ins Co.of Holland)，美商花旗保险公司(American Ins Co Ltd)等在津开业。再后又有美商美亚保险公司(Ameriean Asiticatic Underwriters)，法商保太和安全保险公司等。而华隆洋行和保安保险公司等数家，为了扩充营业，在天津当地还有分支代理机构(Local agency和SUB agency)。这些专业保险的行号，虽然也做着它们本国或别国工商户的生意，但主要营业对象，已经不是少数的洋商，而是整个天津市和以天津为中心的外埠的华人工商户了。这时洋商保险业有了大幅度的展开。它们以天津为中心，逐渐伸展。所有铁路沿线，离天津已经较远或很远的城市像保定、沧州、石家庄、太原、唐山、张家口、沈阳、锦州、山海关、秦皇岛、济南、郑州、洛阳等地，都有了它们的业务。尤其是这些地方的火险，几为它们所包办，华商同业不敢问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外商保险业的深入和发展时期。步外商保险业的后尘，在1912年前后，由国人创立的保险公司，像上海宁帮的华安、华兴；广帮的先施、福安，和南洋一带广帮华侨设立的广恒、羊城、金星、香安、联保等等保险公司，也都曾来津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但华商保险公司的资本额大都小得可怜，它们一方面想多做生意，一方面又惧怕赔偿，同时又因为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这种保障安全的事业，更难得为商民们所信赖，所以它们的努力，更敌不过同行的外商。就火险方面论，外人在津的工商企业，当然不会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而国人经营的产业、财物，比较数目大的，坐落地点适中

的，所属建筑物比较坚实而不易引火的，也都被外商保险行抢保了去。剩下了那些资本薄弱，地点杂乱，建筑窳陋或经营易燃品的中小型工商户，都是外商剔出的残余，不愿承保的，才能落到国人的保险公司手里。这种中小型工商户的组织和管理既不健全，盈亏又毫无把握，多半属于投机取巧，只顾当时，毫无长远计划或经营方针的。如果赶到了业不抵债或其他不利的情况时，难免心存侥幸，放一把火来解决它们的困难，这就苦了中国的保险公司了。因为，赔偿吧，火灾原因可疑；不赔吧，怕损失了自己的信誉，业务将更无法展开，遑论再去和洋商竞争呢？天津北大关和大胡同一带，所有比较顺眼可看的洋灰门面，十有九家都是投保户自己制造出的火灾或被牵连遭灾而由中国的保险公司赔了款以后，重新修建起来的。至于侯家后、河北关上和其他一些街道狭窄，房屋简陋而又为一般小型铁器制作店和手艺作坊较集中的地方，时常——尤其在冬天生炉取暖和春天多风干燥的季节——要发生火灾。这些保险，都是外商保险公司所放弃不取，而为华商同行“不得已而取之”的。至于专营水险的华商，只有招商局的附属机构仁济和一家。它只能做一点招商局自己的船只来往沿海货运的水险生意，其余所有外商船只运输的水险，都由外商包办。

还有一层，解放前的半个世纪期间，天津外商保险事业所以能够用压倒的势力击败国人同行业的原因，就是有一批被洋商所利用或收买的华人。他们或是买办，或是经理，或是跑合人（经纪人）；为了图谋本身的利益，不惜死心塌地投靠洋商，为他们作宣传工具。他们一面对华人民工商户说：“你们的财产如果向洋行保了险，遇有意外，一定赔偿。中国的保险公司是靠不住的。……如果时局紧张得很的时候，你们的动产更可以预先搬到租界里去，找个妥当的地方保存起来，再向洋行保上火险或兵险，那就万无一失，岂不可以高枕无忧了吗？至于不动产如果向洋行保了火险或兵险，必要时，可以靠洋人的势力来保护……”那时国内政局

确实不稳，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再加上当时惧外、媚外的病态心理正浓，一般富有的资产阶级，也都不得不依靠外人的势力来保护自己。他们独把动产纷纷迁入租界，甚至都在租界里另外抢着购置了住宅或公馆。这些租界里的不动产，又是外国保险业的营业对象。就这样地锦上添花，外商保险业更是蒸蒸日上了。相反地，华商的保险业务，则每况愈下，不能长久支持。所以1915年以后，有不少家华商保险公司因为赔累不堪，不得不下了招牌，撤回沪粤去了。

以上是天津保险事业早期的概况。

1920年起由中国银行界创办的保险公司，如中国实业银行的永宁保险公司，金城银行的太平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的宝丰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上海广帮的先施和永安保险公司，又先后陆续地来天津开设分公司或代理处，承揽水火险业务。从这时起，国人自办的保险事业在天津又有了起色。随着保险公司数量渐多，竞争也日趋激烈。它们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尽量降低保险费的实收数额，也就是多给经手人佣金和投保户的折扣。

辛亥年前后，洋行和外商保险公司给跑合人的佣金，不过是保险费的一成，洋行实收九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竞争的结果，折扣逐渐放大，但一般仍保持到五折左右。以后日本的三菱、三井等洋行的保险也来参加竞争，同时西商的保险公司又逐渐增多了，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也就愈演愈烈。至“七·七”事变前夕，一般火险的险费实收额，竟跌至倒七折左右，其中如美商的美亚公司和德商的安全公司更跌至倒八折，同时水险也跟着大大落价。

在竞争过程中，华商保险业在华北一带一度有一定成绩。主要是由于它们的经理或负责人都有爱祖国、爱事业的志气，在经营上不敢苟且从事，也不敢有伙同投保户或其他有关人员等一起作弊情况。此外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觉悟，情愿

向华商保险。又因这些华商保险公司大多是银行所创设，有银行做它们的后盾，在资金的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而有伸缩力。但无论如何，仍然敌不过外商的同业。例如中外同行都用降低险费实收额来吸引投保户，但华商保险公司所能承保的都是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工商户，保费有限，如果再来个倒七折或八折实收，那实收数就少得可怜，不值得去负担那份危险了。但外商同业却不然，它们把险费尽管降低，由于所承保的多是资金比较雄厚、业务比较可靠的工商户，纵然降低险费，实收还是可观。况且由于降低了险费而营业的范围却扩大了，替它们服务的华人也就更好办事了。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单位险费的收入虽然降低，而每月总的险费收入，反而激增。况且它们的总机构在本国而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全球各个比较落后或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偶然一点一地的赔赚得失，对总公司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就我们从事外商保险工作以来的经过而论，还不曾看到过任何一个外商保险行在天津赔了本钱的，差不多都是在这里白手成家，日益胀大的。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同行，虽然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但总不免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太小的不愿保，太大的不敢保。像金城银行的太平保险公司，虽然也曾邀集数家组织过一个分保集团来分配各家所承保的溢额，但团体内仍然有承保不了的溢额，还是要转到外商手里去承保。这样又使外商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中国人手里获得巨额的险费收入。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时。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外商保险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外商在天津经营保险事业的内幕

1. 对华人的任用方式

前面已经说过，天津外商所做的保险业务，一般以代理的性质居多。如老牌的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它们自己有航运业

务，当然自己要代理几家保险公司。就拿主要专做出口业务的永丰洋行来说，它也代理着两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后来就逐渐有了专业的保险公司和专门代理保险业务的洋行。他们的经营方式各有不同。一般兼做代理保险事业的洋行，对华人的保险，也由进出口买办兼理（如怡和、太古、新泰兴、大来等洋行），或由它们雇用的高级华职员（大写）专办或兼办（如永丰、德隆、隆茂等洋行）。专营保险业务的洋行的对华业务，有的由大写负责，不另设华经理或买办（如华隆洋行和保安保险公司）；有的专设有华经理或买办，雇用的大写，不负责对外营业；有的设有华人买办八九个之多，分负它们所代理不同各家外国保险公司的业务（如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这些华人中，除大写是外商的雇用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外，其余经理或买办，都和外商订有合同，不支薪金。他们的收入来自险费抽成的佣金，另外由洋行每月酌给津贴，那就等于买办们的办公费了。数目多少，是要看买办们承揽业务的多少来决定的。例如许良灏任美亚保险公司买办的时候，每月由外人津贴100元，至于他办公室内用多少人帮忙办公，他们的薪金怎样给，外人一概不再过问。这样的制度自然就督促着买办们尽量去给保险公司扩大业务范围了。这是外商保险行任用华人的一般方式，也正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2. 买办们搞钱的方式

按上述情况，专做保险业务的买办们，似乎不若给洋行做进出口的买办们收入多，生财致富容易。岂不知他们另有各种各样的搞钱方法。

第一，代外商经营保险的买办们，虽然和进出口买办一样，要和洋行签订合同，主要也是靠佣金收入，但不同的是他们对洋行只有信用担保或以少数的有价证券做担保，很少用现金做担保的，可以说是不用本钱的买卖。其次，他们自己（不通过跑合人）找来的保险，那笔跑合人的佣金，自然也就由他们自得，洋行是

不过问的。另外，以火险论，买办对投保户的交易是：以投保户收到保险单的当天或一两天内，洋行方面也就要收到保险费为原则。否则在交费以前，如果出了意外，保险行是不负责的。但事实上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一般凡是通过买办之手所做的保险，洋行方面虽然当天就开出险费收据，但大多都给以60—70天的缓期收费的期限，在这限期内出了意外，保险行仍负赔偿之责。这层内部情况，对投保户是不公开的。这也正是洋商对华营业的灵活手段中的一个。因为投保户既不同洋人直接接触，又不熟悉那文字上精细严密，复杂不堪的保险条文或章则。他们所以投保，完全凭跑合人的介绍或买办自己承揽而来，险费当然也要由他们转交来行，才能入账。如果投保户接到保险单后，当天马上一次交清险费，买办们就可以利用那六七十天的缓期，来做短期放款或其他小规模的投机事业。如险费不能马上交来或不能一次如数交足，恰巧在这期间出了意外，保险行仍然可以赔偿，但投保户因为不知内情，不敢公开要求赔款，只好亲自或托人向买办说情，恳求设法。这时买办们当然要故作为难的样子，然后再答应尽量向外人商量通融。这样一来既卖了人情，又可以搞到一笔意外之财。灾户们花了运动费，还要衷心感德，买办乘机又可以拿这事大作宣传来推广他们的业务。

第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投保数额低于投保实值的。比方货物实值10000元，投保数只有5000元，遭灾后，经过检验盘点，实际损失有7000元，按保险行的立场当然认为该户有自保的货物5000元，所以只能照损失额的半数赔偿3500元，残货并应由保险行占有一半，其余3000元完整的货物，保险行也有要求占有半数的权利。这样一来，灾户当然不能同意。买办们这时候介乎外人与灾户之间，以“和事老”的身份说话，见机行事，既要讨得外人信任，又要卖给灾户一个大人情，同时自己又可以从中捞到一笔意外的收入。第二种是投保数额高于实值的。这种投保户大多是另有企图，或想存心放火的。这种投保户或同邻户串通放火，或

乘邻户的火灾而贿赂消防人员故意制造水残。保险行的外人是不知情的，而买办们却会晓得内中的鬼把戏。灾户自然也是要求赔偿。买办们在当局揭出了灾户的行为之后，就马上又可以同他们暗中讲好条件，携手合作来公分这笔赔款。

第三，华人向外走货，如果是由外商轮船装运，就大部分要由船行（如太古、怡和等）所代理的保险公司承保水险。水险保单上一般都另外注明有“在码头货场或仓库七天候船期限”。也就是这7天的火险，也已经包括在整个水险险费之内，不另收费。7天内如出了火灾事故，保险公司也要赔偿。但华人有不了解内情的，而买办们也决不会把这点向投保户说明。所以，投保水险的华人货物倘若恰巧在码头候船的7天期限内遭了火灾，他们是不敢公开要求赔偿的，只懂得向买办们托情疏通，恳求设法补救损失。买办们又可以趁这机会装着代为斡旋而作弄一番，然后卖一个空人情再暗中伙同报关行（专为进出口商办理向海关报税托运和提货等业务的行业，水险手续一般都由它们代办，由保险行从险费内给予一定比例的佣金，不像火险一样要通过跑合人之手）的人员和投保户讲条件，搞到一笔收入。

第四，跑合人向外商保险行介绍生意，如有不通外语者，只都和买办们接洽。买办们又可以用种种刁难手段向跑合人榨取一部分“油水”，或干脆先扣下一部分跑合人交来的险费纳入自己的腰包后，再把余数交行入账。

以上是买办们几种搞钱的手法，但是在保险行有地位的负责保险业务的“大写”同样亦有搞钱的手法，我们可以看看下面一个事实。

永丰洋行保险部总负责人是英人，但他实际上只负责在保险单上签字，其余一切工作全由三个华职员办理。三个华人中以会计兼业务冯章甫氏为首，跑合人接洽保险，都找冯章甫商谈。投保户的保险费，由跑合人收来交冯，冯收到险费，并不马上交行入账，总要在自己手中周转一二个月不定，外人是绝不过问的。

他经常和跑合人一起打牌、下馆子、逛妓院。所以他们在业务上总是暗中勾结一起。跑合人交来的险费内中总有冯一点油水（冯是由洋行支领薪金的，按例不能再由险费内扣取佣金）叫做“暗扣”。冯有时得了一份和跑合人彼此公开的暗扣之外，还要再瞒着跑合人，同时当然也背着英人，再扣下一部分险费纳入己囊，余下的才交行入账。记得有一次一笔险费数额180元，跑合人按倒六五折（35%）交冯手63元，这63元的险费已经包括着跑合人公开让给冯的5%油水，即冯可以扣下9元，实际应交账54元。但冯在交账时，则扣下18元，而以45元实际收账。

上面举的这个例子，不独永丰如此，一般外商保险行只要是通过华人手做的生意，差不多都有同样情况。

3. 公证行与保险

公证行是专门为保险行和投保户之间，在出了险的时候，代作证人，决定赔款数目或赔偿方式的。当初天津洋商保险业由洋行代理的时候，出了事故，皆由洋行自己办理赔偿。后来出现兼做水火险公证人的，据我们所知有英商保禄洋行，英商鲁意斯摩拍卖行，后又增加英商普来洋行。鲁意斯摩是由上海来津设立分行的。它原是专做水火险灾后残品拍卖业务的。同时又兼办公证行业务。但一般外商进出口家或比较大的华人民工商户，遭有意外，除了和保险行发生争执的以外，大都仍是直接办理赔偿而不必通过公证行来办理。只有凭跑合人的介绍而保了险（大都是火险）的，尤其是中小型工商户，一旦遭有意外，就完全要看它们和各有关方面的联系和应付方法如何来决定赔款数目和赔款方式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情况来看公证行的“公正”程度。

中小型工商户遭了火灾，政府或公安机关的处罚是另一回事，这里不谈。在投保户的立场，当然要求赔偿，但它若直接找保险行办事，是不方便的，所以仍要通过原介绍人（跑合人）先通知保险行，再由保险行会同公证行一齐或直接委托公证行单独

到现场检验灾情，再作决定。这里对灾户赔的数目或方式如何，最起决定作用的是公证行里随同外人到现场检验的那位华人译员。拿保禄洋行为例，灾户和保险行在未谈正题（赔偿）之先，照例先要运动保禄洋行的译员韩文彬，请吃饭、送礼、看戏等等。如果运动得好，这位韩二爷就会在外人面前讲些替灾户帮忙的话，赔款的事也就能解决得快，否则他就会用种种刁难的手法来拖延时间。总而言之，在大家“分吃赔款”的条件未曾讲好之前，赔款的数目是不能决定的。火险如此，水险也是同样。比方一批由外国进口的罐头食品或呢绒，布匹遭了水残，在残品的处理（如拍卖折值等）方面，保禄洋行的华员，甚至该行的外人，和拍卖行方面，总是互相勾结来取得分外之财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4. 保险业的经纪人——跑合人

跑合人是天津过去各行业经纪人的俗称。保险业的跑合人，大多数是破了产的工商业者，或曾在其他行业内服务多年的人。他们熟识的人多，行业情况也熟悉，也有寅缘擅营的一套“本领”，所以这工作决不是外行人所比得上的。他们的收入虽然不固定，但是发财致富的也很不少。他们也是经常和洋行或保险公司的买办大写们在一起胡混——吃、喝、嫖、赌。中国的政局稍有变动，他们就借机造谣言，制空气，骗着国人赶紧向外国洋行保险以策安全。例如军阀时代的直皖、直鲁、直奉等战争，北伐战争，天津事变，卢沟桥事变，长城抗战等等，都是他们借机宣传保险，做生意的好机会。外国保险公司通过他们，从中国赚到了大宗的银钱。至于跑合人与跑合人之间，为了争夺生意，都是明争暗斗，你诈我虞，彼此都没有半句实话。记得当时给永丰洋行奔走火险生意的跑合人有十多个，内中最常见的有邹姓、常姓、呼姓三人。他们有时在行里碰面，都是喜逐颜开，“三爷长，五爷短”地客气得很。但只要有一个转身不见，另一个就马上秽语讥骂，

一言恨入骨。后来常姓忽然得了急病死亡，姓呼的听到这消息，就在永丰洋行当着大家顿足拍手地说：“天老爷真开眼，他若还活着，我就活不下去了！”同是寄生虫的生活，但也可以从这些事例中，看出他们为了抢夺生意，以致彼此利害冲突矛盾的一般了。

解放前天津外商保险业中的典型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为外商保险业服务的人中，交游最广泛，手段最灵活，生活最阔绰的典型人物，有以下几位：

1. **西少舫** 他是天津太古洋行的保险买办。太古洋行是天津最早的外商洋行，又是英商四大洋行（太古、怡和、新泰兴、仁记）之一，作为当时进出口业务的巨擘，自己还有轮船来往远洋和中国沿海各口岸。所以不独华人工商户的火险生意他有机会可以多方张罗，还因为华商多因太古的轮船走货，所以水险业务，也都顺便由他一手包办。数十年间，不独从保险业务范围来讲，他要算得第一位，以每月所得论，也要凌驾任何一个同行。

2. **李连芳** 他在民初本是天津德商瑞记洋行的高级华职员，和德人乐连生（译名）搞得很投契。1914年欧战发生后，德侨纷纷撤退回国。李不独用了很巧妙的手段，隐蔽了乐连生在华的财产，避免没收，并且把乐本人一直隐藏在他自己的家里数年之久，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欧战结束，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乐开始自由露面。马上摇身一变改入了美国国籍，同时当了天津美商美丰洋行的重要职员。乐感李对他有再生之恩，于是把他介绍到美丰洋行当上了保险部的买办。这时中国正是北洋军阀互相倾轧，政局极不稳定的时候。大型工商户和一般富人的财产都希望托庇于外人以策安全，所以也正是外商保险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李连芳正是适逢其会，又有外国人为他撑腰，所以就更好放胆做生意。不久他也就成为保险行业的华人中最露头角的一个。后来通过寅缘联系竟和曹锟的七弟曹瑛结了深交，混入政途，一度曾做

了官。

李本人在保险事业中露头角后，几个弟弟和子侄们，也相继入了本行，成了保险行业的世家。虽然也有中途转入其他行业的，但一直到珍珠港战事发生为止，李氏一家始终和保险行业未脱瓜葛。

3. 王贵山 他原是德商美最时洋行的买办。欧战发生后，德侨回国，他也和李连芳一样，把美最时的产业大部分隐匿起来。战后，美最时在中国复业，王贵山也就“东山再起”，以天津美最时洋行买办的地位，兼办该行的保险业务。数十年间，在天津德商保险业中，他是独出风头的一个。

外商在津经营保险事业的优越手法

前面已经谈过，洋商在天津经营保险，有他们种种客观的方便。第一，中国政局长期不稳；第二，租界是资产阶级的安全保障；第三，一部分华人为了个人利益，情愿作外人的忠实走卒；第四，华商同业资金薄弱，无力和他们竞争；第五，外商船只在中国沿海的航运优势。但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优越条件由他们尽量利用外，在推动业务的过程中还有他们主观方面的优越手法。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几种情况。

1. 特殊作风，不用文字的宣传广告

中国保险公司赔了款，照例要灾户在报纸上醒目的地方大篇幅地登上鸣谢的广告。为了表白公司里办事人员的廉谨守法，广告还要注明赔款的数目。广告费当然要灾户负担。这样一来，明是好事，但实际上对公司的营业方面却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因为第一，灾户虽然获得赔偿，但究竟还是有损失的。如果再要它们出钱登鸣谢广告，当然不心甘情愿。第二，灾户领到赔款，都希望对别人保密，把赔款数目公布出来是最忌讳的事。第三，同行

业或戚友间，或甚至公安机关的人员，都晓得他已获得合理的赔款，自然都有觊觎之心，未免要大宗的应酬费用。这种情况在旧社会里是无从躲避的。再者，倘若火灾是灾户自己故意制造出来而又为邻里或公安人员得知内情的，那么这笔意外之财几乎要全部拿出来作为塞口灭言的应酬费。放火的目的，也等于徒费心机了。所以华商保险公司的这种做法，不独毫无收获，反而大大地影响了业务的推广。反过来再看外商的作风。他们遇到认为应当赔偿的灾户，不声不响地就赔了，买办和中介人等怎样从中渔利，洋人纵然明知也不同。只要他们搞得通，大家都能敷衍下去，就任凭他们去搞。这样的“爽快利落”，使灾户、买办、跑合人等不独皆大欢喜，而他们也就成了保险行的不要代价的活广告了。所以外商保险行只要赔一次款，业务就一定会推进一步。得失相抵，利润不是减低而是又有了增加，和中国保险公司做法的结果，竟成了一个相反的对比。

2. 利用本国在华的威势推进业务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代，租界是失势军阀、政客和富人的护身符之地，能动的财产也都迁入租界，这是人所皆知的事。惟外商保险行竟能用它们的招牌，保护了华人在租界地以外的不动产或不便移动的货物，这一点是国人和外人始料不及的。最初，洋商保险行在天津租界地内承保了较大的厂屋、货栈或高楼巨厦之后，有的就在那项建筑物的大门框的左上角钉上一块“某某保险公司承保火险”字样的铜质或搪瓷的牌子。它们钉牌子的初意不过是：(1)为营业作宣传；(2)投保户一旦遭了火灾，这个牌子等于授意租界内的巡捕防范有趁火抢劫的行为；(3)授意巡捕阻止灾户向外抢运财物。正月十四事变以后，钉牌子的习惯也渐渐推广到华界(天津习称“中国地”)一些较殷实的保了火险的工商户和豪门巨宅。谁知这牌子在“中国地”竟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原因是军阀互争，无论何方胜败，都难免有些散兵游勇要通过天津城厢和

近郊等地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地方治安既不能维持，当地的流氓地痞，也乘机活动，自然难免有骚扰抢劫的事情。但是在那时候，他们和一般市民一样，也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恐外的心理。他们走过钉上了外国保险行的牌子的大门口，不知里面有什么奥妙，不敢贸然大胆闯进，同时一些公安人员，也多认为这个钉上了“有外国字”的牌子的地方，一定是外国人的产业或起码和外国人有关系。所以遇有时局不靖的时候，也就先尽力来保护那个钉有牌子的财产，以免出了意外承担责任。至于投保户就更可以指着牌子吓唬人说，“你们看，这是外国人的产业，可不是惹着玩的，你们千万可不能动一点。”就这样在一般人疑惧交加的情况下，邻近的地方多少有被骚扰或抢劫的，而这钉有保险行牌子的大门，竟有效地阻止了散兵及匪徒的骚扰。以后凡是向外商保了火险的华人产业，都要求在大门上钉上这样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不独表示已向外商保了火险，甚至于几乎等于免费为他们保了兵险。洋商买办和跑合人等面对这样情况，是多么喜出望外！这种推广业务的优越条件，华商同业只有望洋兴叹罢了。后来华商同业虽然也随人之后，给保险户钉上牌子，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政府做后盾，牌子是起不了作用的。

3. 插旗、派兵保护华人财产

兵险是一种冒险性较大的业务。期限虽短，利润虽高（兵险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期满如果需要续保，就要另发保险单或在原单上批注续保期限的字样，同时照章另收险费），但中国的保险公司却是向例不敢做的，因为时局有大的变动时，中国保险公司自身能否存在都不免成了问题，遑论替别人保兵险？所以兵险就成了外商保险行在华的独占事业。中国政局的长期不稳，给外商大力推销兵险业务的机会。当初在天津每逢内战方酣，市内外不安的空气特别浓厚的时候，我们就偶然会看到华界有的高大建筑物上面，竖起了英国或美国的国旗，甚至更有在大门口派有全副武

装的外国兵站岗守护的。当时心里对这些事情，虽有疑惑，但不曾去探询底细。后来服务于外商保险业，才晓得华界那些插了外国国旗和有外国兵站岗的所在，都是已向外商保险行保了兵险的，由有关的保险行通过它们本国的驻津领事发下的它们本国的旗帜，并派来在津驻防的本国士兵为它们（保险行）服务。最使保了兵险的中国人感到满意的是，它们这样做是不向华人索取丝毫代价的。像天津的恒源纱厂和寿丰面粉厂等的民族资产，都曾不止一次地得到外国保险行这种插旗、派兵的“殊遇”。它们所以这样做，是有深远企图的。它们不向投保户索取任何代价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由它们保了兵险，恐遭眼前损失，更不是对华人有什么特殊的恩情，主要是用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手法，摆出一种事实，再利用华人的口，甘心情愿地为它们的业务作宣传，作推进的动力。天津事变（1931年11月8日天津日本军人制造事变，掳走溥仪）以后，华人对兵险有了进一步的兴趣。同时外商的兵险业务也就有了长足的进展，都非偶然。

许良源从事保险事业的经历

我从1916年入天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任职员，四年期间，由于有了一点业务上的经验和成绩，所以到了1920年中国实业银行创办的永宁水火保险公司，来天津开业的时候，就找了我去帮忙。我在永宁工作，由总稽查的名义，一直到襄理、副经理。由于公司前后经理郭啸秋、郭金章、郭任平三位的信任倚重，自己也有创立声誉、发展事业的雄心，所以一直是兢兢业业，丝毫不苟，忠心耿耿地为公司前途而努力的。

到了1935年2、3月间，国民政府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因此永宁保险公司亦同时被接收而我就失业了。直到同年6月我转入天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担任买办的职务，按大致说来，我前后连续在国人经营的保险事业中，服务十八年，这期间，我在旧社

会里要算是一个廉谨奉公，一清二白的人了。

1935年转入天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担任买办职务。这是我从事外商保险事业的开始。美亚保险公司是专门经营保险事业的，主要是水火险。它代理着美国各大保险公司在天津的业务。它和别的代理保险的洋行或外商保险公司在津的分支机构不同的地方是：别的兼做或专做保险的洋行无论业务的多少，对外（主要是对华人）负责业务的华人只有一个，买办或经理，但美亚保险公司却不然，它共有十几位华人买办代它做生意。内部的账务当然是根据所发出各家不同的保险单而分别结算的，对华人投保户所发出的保险单，当然也有十几家保险公司大同小异的格式。但这对于华人来讲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要有美亚保险公司的图章和洋人签了字的一张单子拿到手就可以了。至于这张保险单究竟属于外国哪一个保险公司或美亚所代理的哪一家保险公司的声誉最好，最可靠，他们是没有必要去过的。所以只要买办们揽到了生意，所有美亚所代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出单都可以。今年由甲保险公司出单，明年到期续保，再另换乙保险公司出单，也无可。

美亚对华营业的方式，当然也离不开上面所讲过的那些手段和作风，它所以要采用多数买办制的目的有二：(1)人多，各人有各人的门路，生意可以比较做得多；(2)在同一机构内用同等地位的多数人，各立华账房，为它服务，他们必定有业务上的竞争，在竞争的情况下，各人一定会尽力竭智地去找买卖，揽到生意以谋取洋人的倚重和多得佣金。在美亚的十几个买办中，每月经手交给行内的险费净额最多的是李莲芳，其次是刘锐亭，我要算第三位。每月交行的款由二、三千元到一万余元不等。有时抓到大险户（如纱厂和大货栈），一笔险费净额就有千余元之多。至于买办们各人每月做了多少生意，交给洋行收账的净额有多少，得的佣金和其他方面的收入有多少，各人在宣传业务、搞揽保险方面，有什么新的方法和窍门，都是绝对各守秘密，尤其各人每月

交行的款数，不独彼此之间不公开，就连洋行方面也替各人保密不宣。美亚营业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业务收入根据洋账房华员告我，除掉一切应付的佣金、津贴、雇用人员的薪工和办公费用等外，汇回外国的净数，平均每月都有8万到10万之谱，这数字是由不安的时局而增加的，就这一点也可以推想到帝国主义制造战争来达到经济掠夺的一部分了。

早年我在天津华商永宁保险公司任襄理的时候，有一笔火灾赔款是由鲁意斯摩公证行办理的，事后那公证行的华经理尹贺治背后送我行平银300两，我谢未承领，但后来做了外商的买办，思想和作风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华商太安丰保险公司董汉槎曾商聘我去为它负责业务，我却开口以月薪1200元为先决条件。我明知它是不可能出这样高的薪俸的，但却故意提出高价暗示拒不就罢了。因为这时的我早已不像过去在华商保险公司的时候那样地廉谨奉公和一清二白了，而是为了弄钱，有隙必钻，好汉不赚有数钱的想法了。就这前后两件事对照来看，我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忠实为它服务，可知环境移人之深且巨了。

在美亚7年期间，经常的佣金收入不必多谈，保险户出了事故，也就是搞钱的机会向我招手，我当然不会放弃的。例如某年有客商魏皓卿由山西榆次运来土包棉花，存放天津东货场（铁路局货场之一）。他原在美亚有长年两万元的保险，发生火灾之后，经调查当时存场的货物已不值两万元之数，公证行也发现货值与保险额不符，不同意如数赔偿，但亦不表示应赔数额。最后由我主动向本行洋人和公证行中外负责人疏通，在三方面默契之下，同意由我出面斡旋，结果不独灾户如愿以偿，有关各人也都满其所欲，皆大欢喜。又如河东兴隆街一家百货店，是由我的旧友王少卿介绍到美亚保火险的，险额4000元，邻户杂货店起火，它也就趁机放火，并自向货架上泼水，故意制造波及损失。但不久火即被扑灭，未成巨灾，这家百货店的破绽，也就马上为各方所认

出。但经我从中运用手段，结果也赔了款。当然我不是白帮忙的，有关方面的人，也都分了肥，警察局也不过按失慎起火处理，罚了很少一点款，出一张告示结案了事。生意越做得多，识面的人也就越广，搞钱的门路也就越宽。例如当地警局巡官和税局外勤人员，都是对一般工商户白吃白喝，会敲竹杠的能手，我就为他们出主意向工商户索保火险，介绍到美亚来，结果他们既可以毫无嫌迹地得了意外佣金的收入，我也不费吹毛之力地弄到随意吃喝游乐的钱。这不过是举出一个例而言。在那时候的立场和看法，都算是很成功的窍门和手段。

1941年太平洋战事发生，美侨被拘，美亚保险公司歇业，我闲散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以后七八年的时间又曾断续地代理过法商安全保险公司及其他华商保险公司的业务，生活环境和在美亚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

总的来说，外商保险这个行业，在天津从1911—1941年，在这30年中为了经济上更多地掠夺，又因帝国主义之间互相竞争，除巧立各色各样保险种类迎合投保人选择外，在我国国内时局又在不安之时，随时制造谣言，使得招来更多的投保户，对险费的收入也一再跌扣，在珍珠港事变前由九扣陆续跌至倒八扣（代理行或买办的佣金不包括在内）。买办们把谣言更是添油加醋地说得绘声绘色，使投保户甘心情愿地投入罗网，就增加了更多生意，讨取洋人的欢心，自己也获得了相当的收益。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有些投保户也有利用机会，从中取巧法门。如投保户的邻居失慎起火，即乘机买通消防人员，借口保护为名，造成货物等严重水残后，以便向保险公司理赔，同时公证行受理这一类灾户，破绽是瞒不过他们的，对灾户索赔，当然故意刁难。对处理残货残物通过拍卖，使用巧妙手法，满足他们搞钱的目的。这一系列五花八门手法，决非局外人所能知道的。即以作者来说，也不过指华北方面以天津为中心而言，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也不作细述矣。有人要问，保险公司这样做，岂不要亏本了吗？我回

答是，赔款不过是在千千万万投保人身上的保费收入的一部分。我再述以下一节以资证明。美亚保险公司创办人“司带”子身来华，他由代理美国几个保险公司开始，数年间先后创立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四海水火保险公司、友邦银行和大华印刷所。“司带”本人成了百万的富翁。从此推想，我国人民的财富在保险这一行业里，被帝国主义所掠夺的，为数之巨大是无法计算的了。

结 束 语

解放后，我们得到新的教育和学习的机会，才彻底晓得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真面貌。数十年间，它们在华经营的保险事业也是经济侵略的得意手法之一。现在我们的保险事业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上面所谈的一切，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英商“保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曾 韵 清

英商“保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1835年在香港创设总公司，嗣后在中国各地及各大埠设立分公司和代理店。1935年曾举办百年纪念庆祝会，以纸制金底上圆下方注明1835~1935的纪念章，赠发给各职工及各往来家，以夸耀其公司成立之悠久。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分公司被日本查封。1947年复业，在重新办理登记时，规定各外商在中国登记，须改用华文，因此遂以公司的头一个英文字母“Union”（译音“于仁”）加在前面，改为“于仁保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并未变动。直到1951年12月31日，在中国的各分公司结束营业，共垄断中国保险业达百余年。我于1927年考入该公司天津分公司，先当英文打字员，嗣后担任险验和会计等工作，直到该公司结束后离职。

我在分公司常听到英籍经理宣传他们英国是世界保险行业发达最早的一个国家，英国谚语有：“家拥万贯财富，不保险等于穷汉。”因此英国的大小工商企业或个人，都重视保险。英国政府曾制订保险条例及详细章程，用法律程序固定公布。从此各国保险业也都根据英国的条例，作为保险标准。这就给英商保险业造成垄断条件，并成为英国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分支机构密布

保安保险公司于1835年在中国香港设立。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于英，并签订五口通商条约。该公司即乘机陆续在

中国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设立分公司；在青岛、龙口、烟台、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沿海口岸，承德、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等城市都设有代理店。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尼拉、新加坡、印度、锡兰（斯里兰卡）、非洲、美、法、德、意等国各大城市，亦都设有分公司及代理店。

由于该公司在中国营业获利很大，英国的资本家们都先后在香港设立保险公司。例如：1862年成立的“扬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The Yangtze Assurance Association Ltd.)，1863年成立的“保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North China Assurance Co. Ltd.)，1865年成立的“保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British Iradzer's Assurance Co. Ltd.)，1870年成立的“中国火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The China Fire Assurance Co. Ltd.)，均在中国各地设有分公司，互相竞争。后来各保险公司感到自由竞争，彼此不利，遂协商一致，皆并入“保安保险公司”以内，但对外各公司的原来名称不变，表面上各自独立经营，实际皆属“保安保险公司”。因为我经办年终总帐，在财务报告中看到上列各公司一年的业务收支全汇列入“保安保险公司”总账以内，才明了这项内幕。他们的主要用意是：某一公司亏损时，只就该公司原登记有限股本清偿，不影响整个公司。保安保险公司股本资金，究竟多少，英商一向保密，不令中国职员知道。这次在报告内才看到，股票总数为二十万股（不包括其他公司），每股十磅，共二百万金镑。在协议联合经营后，除扬子保险公司等四家外，还有在英国伦敦1908年成立的“不列太士欧克保险公司”(The British Oak Assurance Co. Ltd.)亦加入“保安保险公司”。此后天津分公司在市内的代理店遍于各行各业。如：怡和、太古、新泰兴、平和、汇克大、安利、普丰、德记、慎昌、礼和等洋行，及先农公司，开滦矿务局等。各代理店的不动产，存放的货物和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全在该分公司保险。即在外埠的动产与不动产也全数投保，例如新泰兴在石家庄的棉花厂，

开滦矿务局在唐山、林西、赵各庄等矿，均由该公司保险。上列各代理店提0.25%的代理费。本店投保照样提取，以资鼓励。

为了发展业务，就利用商人放火以广招徕。民国初年有旧英租界的一家俄商，投保茶叶数万元，存放茶叶室内，只有外层箱内是茶叶，中间全是空箱。失火后，经该分公司报同消防队现场查验，看到存货房内大梁下有一放火机尚未烧燃，四邻住户都损失很大。“中原鞋店”连续火烧三次，每次均保有火险。头次投保几百元，被火烧后，扩大营业，投保三千元；不久又失火，再扩大营业，即投保九千元。因此由一个小鞋店发展为大鞋店。另外还有一家鞋帽店（忘记其名）同样借保险后放火盖起了大楼，扩大了营业。该分公司检验人员觉察到他们有放火行为，建议追究，英籍经理不同意说：“这种小额保险，可以让投保者得点小便宜，树立我们的信用，以广招徕。我们赔几万没有关系。我们干的是保险营业，有失火的才能营业发展呢！若是没有失火的，谁还来保火险呢？”以后对保小额火险者，一经失火，只根据消防队的报告，即行赔偿。真正受损失的，往往是那些“失火者”的四邻。

（二）经济侵略，无孔不入

由于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较早，以故英商保安保险公司在中国是最大的一家专业保险公司。它以保险为钓饵，坐收保费，一本万利；而投保的资本家们又将付出的保费，直接间接地转嫁在中国人民头上。因此它除了未办人寿险外，其他各种保险无孔不入，如：水、火、灾害、汽车、轮船、火车、牲畜、大车、船身、海运、路运、无价保险等都在其保险业务范围之内。可总分为三大类：水渍险，火灾险，灾害及汽车险。

水渍险（也叫海上保险）包括路运、海运两种。路运指火车、大车、汽车等运货，只保平安险，即途中车辆发生意外，或中途失火和受雨水损坏，可得到赔偿。

海运保险：又分平安险和水渍险两种。平安险发货、卸货两

头的码头上各有火险七天，在航海途中则遇全船沉没及失火等，才得赔偿，其他损失概不负责。而保水险者分十余项，即水险、偷盗、交不到、潮湿、发霉、沉船、失火、搁浅、触礁、罢工、兵灾、战争、渗漏、破裂、生虫、淡水、触地雷等险。以上十余项，除水险和码头各七天火险为必保外，其他各项，按货物需要、时势情况来选择投保何项。例如：时局紧张时，必保兵险和战争险；五仁之类（核桃仁、花生仁、桃仁、杏仁、瓜子仁等）必保生虫和发霉险。如若不保此险，运到外国不能售出，而没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海关也不放行，轮船公司也不给装运。若装用瓶桶之类的货物，必须保渗漏或破裂险。至于战争险及偷盗险在解放前成为必保之列。也有保全险者，各项都保（英文名 All Risk）。

还有一种叫作旅行险，也包括在水险之内，即保长途旅行，或行踪不定的旅客所带行李什物、装饰品、金银用具、珍贵物品等。

水险一项也分别某种货物，装在何船，船的构造，船的年限，应载重量，路途远近，有无转口，以及经过地点是否危险地区，船能否直达，或中途换路运等等，而保险率各有不同。

火灾险：火险大致与水险相同，存的货物及建筑物和器材等等，只有受到火灾的损失，才能得到原来投保价值的赔偿。

汽车和灾害险：汽车分自用车、公用车、运输车、出租车，但只限在市内行驶的，有一定保险率，市外另议。灾害险只限于汽车司机和乘客及第三受害者，发生意外，受到损失才在保险负责之内。

上列各项保险费率，都有统一规定，而公司有随时提高之权力。有的按经过地点和时局变化而随之提高，如兵灾险，在时局不稳定时，可以从0.25%提高到1%或3%。因灾害赔偿稀有，绝大多数保险费均为公司所得。即偶有灾害事件，如失火遇险受残等事，公司曾规定有按单赔偿，按受残情况赔偿，斟酌赔偿三

项。而核定受残情况赔偿多寡，权在公司，核定时间有明显的剥削。如客方不同意核定应赔偿的情况，公司即将货物收回，由公司处理，必须俟公司处理完后，始行照保单赔偿。有的客方怕拖延赔偿时间，损失更大，就不能不听从公司核定。有时公司将货物收回处理，值货物涨价，客方看到受损不大，愿按公司核定领款，也难得如愿。例如约在1947年时，天津招商局码头仓库内失火，某商号（忘其名号）在该仓库存有由公司保火险的面粉数千袋，失火后我公司核定残损面粉数量不及四分之一，该投保商户因残损面粉有三分之一，我公司核定赔偿情况过于严苛，坚不同意。适面粉价格高涨，公司即按照他处理残存货物的规定，将全部面粉收归公司，及将残粉和好粉出售后，除赔偿数外，还有余款。

（三）垄断中国进出口货物保险

保安保险公司有秘制专用中国地图和保险图。由英国地舆社制，各分公司都发给一份，对外严守秘密，在公司结束时均已运回香港。我曾看到中国全国图内，详载省、市、大小城镇、乡村、山脉、河流、铁路、车站、沿海口岸等等，无一不详。至于经纬度数、面积尺寸、距离里数，更为详注。各省各地的土特产物、产品、产物种类，都一一详载。此图全用英文，还有火险专用图，系以号代字，更为详细。例如天津某段某地即以在几页Block和Lot号表明即可。总公司尚有一份同样图，以作对照。所以总公司虽在香港，他却能够保证可知某市某地有保险若干。从这种地图上及保险单副页上（因各地各分公司所出的保险单，必须多作一份副张汇寄香港公司）计算，可知每年某市某种货物出进口的数量仓库存放多少，从此可以推计何种货物出口易销，何种货物进口为宜；由保险单上保额的大小，更可知价格高低，质量优劣，并从而作经济统计，知生产的多寡。如开滦矿物局每月煤的产量，都在该公司保险图卡统计之内。

解放前我国关税不能自主，海关由英国人控制，远洋轮航，也均属帝国主义所有。华北地区大部分出口货物，都依赖英商太古 (Batterfield of Stoile)、怡和 (Jarding Matheson of Co. Ltd.) 两大洋行运输，因此天津海关和英商轮船业以及保安保险公司，形成三位一体，如出口货物外运，多先定英商轮船。轮船公司首先问明有无保险，若无保险，则不予登记。及到海关报关，海关根据轮船公司的许可货单和保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抽验一二或不验即可放行（当然商人对海关检验人员，还有一番应酬联系）。因此中外客商经营出口者，势须到保安保险公司投保，成为惯例。所以公司从来不用跑合的（即经纪人）。与中国商人所办的保险业依靠经纪人招揽业务，给以百分之四五十佣金不同。但为了开展业务，也规定凡有中外商号或个人，向该公司投保者，无论有介绍人或自行投保，一律给以百分之二五扣。天津出口货物，买方要求卖方备有按单列规格，质量，途中安全，是否按期到货的保险单，否则不能成交，海关也不能报关；有的货物如五仁、猪鬃、马尾等，必经天津保禄洋行^①出具检验合格单，保安保险公司才能准予投保。至于进口货物，卖方为了避免纠纷，也按合同代为保险，保费由购主交纳。因此导致我国出口货物利润减低，进口货物成本提高。该公司不只在天津各地垄断保险业务，在国外也有它一定的垄断地位，来中国的进口货，大多数亦归其保险。中国商人虽在天津设立平安、太平、大安、肇泰等保险公司，但因资金有限，在国外信用未著，除保一部分运销国内货物的水险外，只能保火险一项，而大多数火险，仍得找保安保险公司分保。但公司还挑剔，地区不好的，拒不接受。同时中国商人，多迷信外商可靠，汇丰、正金、花旗、麦加利等银行，禅

^① 保禄洋行是英商所开，行址在旧英租界海大道（现在的大沽路）和烟台道拐角处。内有专门检验技术人员。该行亦代理保安保险公司保险业务。

臣、西门子、乌利文等洋行，驳船公司、打包公司、仪品公司等各大中外商行企业保险，都由保安保险公司包办。各租界内的一二等建筑物、仓库、库存货物、以及车站码头暂存商品，亦多数在该公司保险。除日租界较少外，即天津城内、河北、河东等地各种保险也全为该公司所包办。

该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所收保费以英镑、港币或美金为单位。应收保费多寡，是根据投保金额而定，年终统计由总公司直接分类汇总办理。根据公司业务情况，估计天津一地，每年货物保险，占华北出口货物的80%上下，进口货物占60%左右，外加本市工商企业、仓库、住户的动产与不动产，保险收费数目更属惊人。据英籍经理说：“保安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处业务，以在中国的营业为最好。”1951年5月24日，曾在香港总公司召开一次1950年全年业务会议，报告中载有：“保费除去退保、外保、和回扣外，总公司水险实际保费收入是2562693金镑，火险收入是2092899金镑。全年账面结余332706金镑。1950年中国大陆已经解放，是该公司业务最不好的一年，还赚钱如此之多，百余年来剥削中国人民的金钱可想而知。

（四）变相的职工卖身契

天津分公司，约在1845年前后设立，起初在汇丰银行二楼办公，1920年迁移到旧英租界中街139号营业。1947年复业时，在现在的解放北路麦加利大楼二楼，后又迁到148号。该公司内部，只有英籍经理一人，自大写以下，全是中国职工。大写一人，等于洋行买办，不同者只是不交纳押金。大写承经理之命，掌握分公司全部业务，其余仅有会计一人，文牍一人，验残验险一人，英文打字员三人，庶务一人，信差二人，车夫一人，汽车司机一人。英籍经理一般是三年一换，也有不到三年的即行他调。英籍经理多数是退伍军人，原来的官职，中国职员无从知道，只看见来到以后，英国领事和英工部局外籍高级职员都先来拜访，毕恭

毕敬，和对一般外商的傲慢态度有天渊之别。由于该公司有英国领事馆和英国工部局的大力支持，消息灵通，非其他保险公司所能比拟。其对内对外的一些工作，都由大写督饬中国职员去作。经理月薪自80英镑起码，有高达200英镑者。此外他住的宿舍，如天津的头等饭店皇宫饭店、陆安大楼等处，都是由公司支付租金。所用厨师、洗衣女工、勤杂工役、汽车司机等等开支，亦皆由公司担负。房内陈设和所用的一切家俱，皆是订购特制品，或从西洋订购运来。职务调动时或带走或拍卖，归为私有。新经理来，再另为购置。工作3年回国后，还可照顾1年薪金。至于中国职员待遇，除大写月薪百余元外，其他每月工资最高不过五六十元，一般都是三四十元。

公司职员都是经过招考而来，录取后，试用期为3年，期满认为合格，才定立合同，成为正式职员。合同内容，主要载明：“必须遵守制度（但未列明什么制度），不得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如有违犯，公司有处理权。”职员每月扣工资5%，留存公司，名为养老储蓄金。每届年终，总公司再按照全年月薪总数加发5%，作为春节双月工资。但只给职工收据一纸，并入5%的养老储蓄金内一并储存总公司，不许预支或预借。待解雇时，才同养老储蓄金本利一次付给。如违犯公司制度，或自动辞职，积存的双月工资不发。因此签定了合同等于签定了卖身契，不能不终身为它服务。

大写孙秋圃（即孙桂元）系天津洋行买办阶级中的著名八怪之一。他自北洋大学毕业后，就到该公司任职，由一个低级职员，取得英籍经理的赏识，不次提拔，升为大写。孙凭借外国人的宠信，在公司作威作福多年。他为巩固自己地位，所有中国籍职员不论什么事，不许直接去见英经理或与交谈，有人违犯，他就借机打击排斥，使你干不下去。但如英籍经理发现事务不合时，他就带着这经办人去受申斥，并从旁给你再说上几句坏话，把错误全推到这一职员身上，显示与他无关。公司规定自动投保商或

由公司职员介绍的投保户另有百分之五的回扣佣金，均为孙所中饱（应为职员谁介绍的就归谁得），但对外国商人自来投保孙不敢吞没。从前同人坐看他吞没应得介绍费还不敢质问，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才分到一半，那一半仍为孙得。保户被灾后，要想顺利地领到赔款，必须先对孙联络好，才能如期照领（因为赔款的多寡，赔款的快慢等，洋人只根据他一报，有时洋人随他同去，但一切情况是他说了算），否则百般刁难，借口拖延。他为了讨好英经理，无论一天来多少工作，皆限令中国职员当天作完。在下班之前他检查每个人尚有多少，走时他必说一句英语“up to day”（就是要当日作完）。每逢月底及年节或你家中有婚丧事时，故意给你多留些工作，使你不能早些回家。所以每年腊月三十晚上前半夜，所有职员很少能回家过节的。他每次核阅文件，如有一个标点符号不合，就从他的办公室内给你全部扔出来，并不告诉你错在何处，让你自己去查对。公司一切稿件都是用英文，中国职员互相问答，亦不准说中国话。孙秋圃对此奉行最力。有时在马路上遇到，如用中国话同他谈话，他就闭口不理。公司内职员和各交易家，都背后呼他为“外国孙”。

附：保险规定和赔偿范围概况说明

1. 水险 (Marine Assurance): 保平安险者，大多数是在中国口岸或不怕水残往来的货物，保费0.06%，保水渍险者，天津、上海、香港、广州等口岸来往货物，保费0.09%，到外国各地则不同。

2. 火险 (Fire Assurance) 因货物种类不同，地区有别，所以价格也不一样，分长期短期二种，长期保险一年为限，到期续保；短期保险是十天半月，数月半年，甚至日入到日出，保险率不同。

3. 偷盗险 (Theft and pillage): 一般是去外国的货物，保费0.25%，货物自发出至到达地点为止，无论在码头、仓库，



及转口等地，丢失或被窃，均在赔偿之列。若件数丢失，轮船应负一部责任，但件数不短，而内中货物短少，由保险公司照价赔偿。

4. 交不到险 (Non-delivery): 保费0.025%，无论任何情况，货物不能交到所保地点，负责赔偿。

5. 潮湿险 (Tide damage): 保费0.025%，货物因潮湿而降低价格或成废品，所有损失，如数赔偿。

6. 发霉险 (Turned moody damage): 保费0.025%，货物在船仓内受热，发生霉烂或变质，负责赔偿。

7. 沉船险和船上失火险 (Sink and Fire Risk 或 Hull Assurance): 此险按船的价格和载货价格，另有详章规定。

8. 搁浅险 (Stockes): 保费0.025%，因船搁浅，使货物不能按期交到及其他损失，负责赔偿。

9. 罢工险 (Strike for wages): 保费0.025%，船上或码头的工人罢工，使货物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受到损失，负责赔偿。

10. 渗漏险 (Leakage Risk): 险费不一，看其用何物包装，如在途中渗漏，消失其重量者，公司才包赔其损失。

11. 破裂险 (Breakage Risk): 货物有怕破裂者，保此险，因破裂而使货物降低价格或成废品者赔偿。

12. 生虫险 (Warm Risk): 保费0.025%，如核桃仁等货物，内部生虫，或有虫卵而变质者，全部赔偿。

13. 淡水险 (Fresh water damage): 保费0.025%，货物在车船途中，因雨水受损者，应赔其损失。

14. 触地雷险 (Torpedo or mine Risk): 保费1%，轮船触雷被炸毁，货物受损，全部赔偿。

15. 兵灾险 (Troops Have Revolted): 货物因兵灾受到任何损失，应赔偿，保费随实际情况而定。

16. 战争险 (War Risk): 保费由0.25%至1%或3%。因

战争使货物受到任何损失，全部赔偿。保费按实际情况而定。

以上保险率和赔款范围，仅是举例说明概况，每种保险都有详细章则一大厚册。

罢工、兵灾和战争等险，虽有保险定率，因局势的变化，总公司可以随时调整价格。在时局紧张之时，每日都接到总公司调整的电报。有时忽然接到电报，调整某地罢工险，调整某处的兵险或某国的战争险，并指定调整的保险价格。但大多数事先调整，以后很久才发现某处某地某国有罢工、兵灾或战争。由此可见该公司与军事政治方面互相配合关系密切。

帝国主义掠夺的又一方式

——记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

刘锡珍 口述

安崇峻 整理

我在1935年，经协和大学同学李颖柔介绍，参加了外商在北京所办的人寿保险行业。初在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936年，转入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一直到1942年四海垮台止。根据我亲身经历，这种所谓保险，完全是个骗局，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又一方式。爰将其内幕，分述于次：

(一) 利用不平等条约为所欲为

英商四海保险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黄浦滩17号，总经理是司米兹 (F. R. Smith)。司米兹初到上海时，挟着个破皮包，一身之外无长物。他利用一些买办流氓，大肆活动。不上两年，已是汽车洋房，样样俱备，并在北京、天津、南京、汉口、广东等地，普遍设立分公司。他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既不和中国政府打招呼，自然更不纳税。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人民有余，干涉外人不足。以为既是英商，又在香港立案，只可相应保护，哪敢随便过问。于是，帝国主义分子司米兹，就在“四海”的幌子下，在全国各大城市，对中国人民大行骗财、掠夺。所用保单，印刷精美。商标备案，是一个外国女人，装扮成天使模

样，双手各按一个地球，隐示东西两半球，均在掌握。上书八个中国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保单，只有这八个中国字，其余全用英文。收据上虽略有几个中国字，但仍注明：“本收据以英文方面为主，中文方面仅为便利保户参考。”显示洋气，便于欺骗。商标两个地球旁，分蹲一狮一虎，寓意不明，抑为西方饿虎，将噬“东方睡狮”？就凭这份漂亮的保单，把中国人民的财富，成千上万地骗到他的荷包里。

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是在1936年设立的。一开始，李颖柔就把我从“友邦”拉到“四海”，参加了筹备工作。起初，在东城甘雨胡同31号，后又迁到史家胡同24号。房子很讲究，灯水卫生设备俱全，每月房租60元。又从拍卖行里买来三张办公桌，一套旧沙发，并一些破旧家俱，门口挂上“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平代表住宅”的牌子，既无资金，也无门市。对于当地中国政府，一概不加理睬。招来经理员，传授“骗法”，便即开业。平津二市代表是广东人凌世德，监督一人，是他兄弟凌世浚，北平经理李颖柔，后换宝广林（字乐山，留英学生，原是北平基督教伦教会的传教士）。会计李世农，验身大夫徐开疆、冯国宝。验身大夫是公司特约的，每验一人价5元。不算公司职员。另外经理员若干人，没有固定工资。揽来保户，第一年所交保险费，经理员可得一半，其余一半，分5年在保户交费时付给。其情如畜鹰犬，叼来猎物，便可得食一口，叼不来活该饿着。我和其他的经理员，便是为了这一口食，作了他们掠夺人民的走卒。保险公司对于揽生意的跑街，既采用了上述付酬方法，自然可以多多赢利了。

（二）传授一套外国“骗术大全”

保险公司既要经理员为它四出拉生意，自然要有一套兜揽方法。于是，由1936年起，先后举办了三期“四海保险公司经理员

“讲习班”，第一班报名入学的50余人，我是学员之一。因为我这个头班“大弟子”，学得不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有成绩，所以，第二期我便成了“讲师”。所传授的一套东西，讲义全由英文翻译过来，地道的外国货。一切设想周密，堪称“骗术大全”，内容约略如下：

本课程论述：保险业经理员业务进行法，第一：作保险经理员的优越性，（1）作保险经理员永不失业，任何地方，都有四海保险公司，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就有保户。不论你的性别、年龄，也不论你到什么地方，都有业务可作。（2）四海保险公司，待遇优厚，每月收入，看你努力如何，一般的可有一百到三百元的报酬。（3）从业务进行中，交游日益广阔。朋友越多，道路越宽，业务也越发展，待遇当然也越优厚，是一项最好最理想的终身职业。第二：人寿保险经理员业务注意事项：（1）衣帽必须整洁，不论中服西服，务要穿著大方，要勤理发，天天刮脸。最好穿着西服，衣扣不缺，熨烫笔挺，领带、衬衫、手帕都要讲究。（2）语言必须简洁流利，回答问题时，必须干脆圆满。（因为保户所提问题，有关业务的大致相同。）（3）态度必须大方而又和蔼，使人乐于与你接近。每见一个保户以后，你必须用方法抓住他，主要的是同情与感情。例如：某保户正需找房，你托朋友替他买到或租到房子，这样，不但可得到一笔分外收入的中费，而且与他建立了感情。他必定投保，成了你的保户，并将大力给你介绍朋友。又如：你知道某夫妇二人，某日要带孩子去郊游或旅行，你可以用公司的汽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这样也可很快地建立感情，得到投保。事情是活的，自己可以见景生情地运用。（4）先求保户太太的同意。人寿保险这宗事，开头不久，就要谈到投保人死亡或残废了的赔款问题。一般妇女是不爱听、不喜欢谈的。比如：你在张宅和张先生、张太太谈保险，谈到赔款问题，切忌说：“假如张先生死了，要赔偿多少”，应该用事实举例，比如说，最近公司赔给了一位姓王的保户多少多少，最好是

少谈保险赔偿，多谈储蓄好处。第三：保险经理员的修养：(1) 须养成热烈的信念，凡事皆由信念而成，信念强烈的成功伟大，信念薄弱的成功稀少。古今成大功的人，哪个不是如此，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别人以为平常的事，在他却能成功大业。缺乏信念的人，良机当前也能错过，保险事业亦然。大家有的是因朋友介绍，来作保险经理员。有的是因失业无聊，暂作保险，以为过渡，现在骑马找马，将来另谋他业。这样的朋友们，你赶快去找别的出路吧，保险事业里，你决不能成功。朋友们，你愿意作很高的业务记录吗？首先要多读些英美关于保险的刊物，并将一些紧要的理论，溶化在你个人的理解之内。记些紧要词句，可以出口成章，俗话说，诚于中形于外，这样，你拜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言词必然流利，热情自然感人，理论也必能服人。因为你自己信念热烈，兴趣浓厚，作到了至诚感人，对方也就容易被你感动，顺利投保了。(2) 须写日记，你每天出去见到的人，晚间须写日记，记明今天见过谁，讲些什么话。如某人说：明年1月我来投保，其实，在他是一句无意说出的敷衍话，在你却应牢记，明年1月上旬，就可以再去找他，他也就不好再推诿了。另外，在写日记时，要回想今天你对每个人谈的话，哪些话恰当，哪些话不很恰当，研究下次再见面时，或遇到同类问题时，如何用言词简单，意思圆满的话来回答，使得对方满意，情愿投保。第四：成交的时机，每年3月中旬至5月底，8月中旬至10月底，这两段时间内，特别是4、9两月最为宝贵，气候宜人，不冷不热，人们精神愉快，最易投保。经理员要能掌握成交的时刻，必须恰到好处，到了该结束谈话的时候，必须立即结束，否则就谈“老”了。“老”了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主人去接电话，或有客人来了，不能和你再谈，这笔交易就不好恢复了，因为你下次再去找他，所谈的不过仍是那一套，不新鲜了，对方也就不愿再听，更谈不到让他投保了。结束谈话的用语是：(1) 您的身体很好，我相信您投保寿险，准能及格，明天我给您把验

身大夫定好，用汽车来接您好吗？（2）当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稍稍节约一点零钱，买个保险单，以防意外，兼可储蓄，是一举两得的好事。（3）您现在身体很好，快上公司去检验身体吧。第五：招揽时机：有的交易，一次几句话就成熟了，有的经年累月不能成交。这主要是时机问题，比如：探听某人高升，或有特别进款的时候，一谈便成。某人生日，你去贺寿，某人家中婚丧嫁娶，你尽可能地前去参加，并代主人张罗一切，这样不仅可以和主人建立感情，更可多结识朋友，开辟新路子。春节期间，要多请几桌春酒，通过熟人介绍，拉拢一些新交，但客人们的姓名、职业、住址，必须问清记清，以便前去拜访。第六：紧要关头，投保人验完身体之后，大夫必说他的身体很好。经理员要立刻向投保人道喜，祝贺他身体健康，可以投保。投保人自然心里高兴，经理员要抓紧时机，请会计核算该人应交多少保费，并乘他高兴，立刻就问：我明天什么时候，到您府上去取款合适？此时，投保人不能不说出明天的时间。注意，经理员绝对不能失信，必须准时前往取款。过了时候，投保人心情一淡，就算失败了。如是云云，就是讲习班的主要讲习内容。另行说明，公司备有汽车一辆，经理员可以借用“摆阔”，但要自己付出汽油费，公司不管。

（三）所谓人寿保险

尽管讲习班这套外国推销术，说得天花乱坠，作起来却行之维艰。凭一张嘴，凭一纸洋文保单，就要人家掏腰包，自非易事。加以经理员并无固定工资，50多个毕业学员，纷纷散去，只剩下我、马育才、王厚斋等几个人，为公司拉磨，继续干这无本生涯。所谓人寿保险，分储蓄保险，纯保险两种。储蓄保险又分10年、20年、30年和终生保险4种。一般人都愿投保20年储蓄保险。这是利用当时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一般家庭妇女，在社会

上没有地位，没有工作，全靠男人挣钱，维持家庭生活。一旦男人死亡，家庭顿失倚靠。投保人寿保险，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公司按照投保额，照数赔偿，可作死者身后的家庭生活补助。例如：投保人30岁，投保1万元人寿保险，每年交纳保费约550元（可分成二期或四期交纳），交费期限为20年，期满还本1万元。假如投保人上半年投保交费后，下半年在任何情况下死亡（自杀除外），公司照赔1万元，以后不再交费。此外，还有残废保险，职业保险（如歌唱家投保噪音等），则属所谓纯保险，只管交费，并不还本，并只能附属于储蓄保险合同以内，不能单独投保。表面看来，这些办法对于保户，没有什么不好，并且遇有死亡，真的照数赔偿，毫不留难。以表公司“信用”，而广招徕。也正因如此，才有不少人受骗上钩。殊不知帝国主义分子，另有一套十分稳妥的如意算盘，大肆掠夺。

（四）算一笔总帐数字惊人

投保人寿保险，第一关是检验身体。公司特约大夫检查，要求极为严格。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失眠症等患者，当然不保，就是伤风、痔疮、肺痨不合标准等，也一概不及格，不予投保。这样做法，不是保险公司保投保人的险，而是投保人替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费标准，是按照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卫生，和死亡率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按照四海的验身标准，当时中国各大城市30岁的人，死亡率是8‰。公司把1千个30岁验身及格的人，编成一个“30岁小组”。这个小组按每人投保1万元20年储蓄保险计算，每人每年交费550元，全组共交费55万元。而当时银行定期存款的最低利息是2分5至3分。这个小组每年所交保费的利息，不包括复利，即达16万元左右。假定按死亡率8‰，赔偿8个投保人，计8万元。那末，单按保费利息计算，公司可获利8万元，其他不还本的纯保险保费收入，尚未计算在内。四海所收保

费，逐日交存汇丰银行，但并不肯呆滞在银行中生息。据我所知，四海在南洋群岛，经营有广大的橡胶园，同时也作其他投机生意。其获利之丰厚，绝不止上述存息的比例。北京四海开业6年，承保的储蓄保险已超过1000万元。上海等地开业较早，规模更大，其承保额当远远超出此数。四海的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各大城市。以同样方式，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积年所得，数字惊人。这些游资，一入帝国主义分子之手，即通过他们的银行运营，再用它扩大对中国人民的榨取。百年前，英国人把鸦片偷偷运进中国，本来已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这堂乎其皇的保险生意，更是“无本万利”。

我在四海保险公司，由它开业到垮台，一直干了7年，按照上面所说一套“骗术大全”，努力以赴，居然骗得不少人上钩投保。起初，每月只能作到二三千元投保额，后来，每月可以平均作到1万余元。为了拉拢生意，终日花天酒地，打牌应酬。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延续了6年。1941年12月，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在1942年初，对英美金融冻结。一天，日寇宪兵队突派人来到史家胡同“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北平代表住宅”，由一个头目率领宪兵数人及翻译一名，进门后，将我们驱于一室，立将金库与帐簿查封，声称：从现在起，勒令停止营业。并将经理宝广林，带去宪兵团回话。宝广林回来，告诉大家，四海保险公司，因系英商财产，已为日方冻结，北京公司由日本宪兵队接收代管。大家只好就此散伙。这些一向不把中国政府放在心上的英国流氓，却奈何不得日本强盗，偃旗息鼓地溜回本国。但像北京公司那样，日寇接收到手的，不过是一套旧沙发，三张办公桌，一堆烂帐，几百元现金，汽车房子，都是租赁而来。真正吃亏的还是中国人投保户，向宝广林等查问，推说已被日本宪兵队接收，当时谁敢上这阎王殿上讨帐？守着一纸印刷精美的保单，徒呼负负。

西安八旗小史

李 纪 仁

一、防地位置

西安八旗驻防集住点，位于陕西省垣东北隅，占全城面积二分之一强，以省城明代建筑物钟楼为中心点，沿着楼的东北角从南向北直伸，达到省垣北大城墙安远门东首为止，筑有土城墙一道，中间开辟二门：一曰西华门，一曰新城门。再从钟楼东南角从西向东直伸，达到东大街马厂子口为止，筑有土城墙一道，再向东至省垣东大城墙长乐门南首为止，为普通民宅后院墙（即今东西头道巷），作为隔离满城与汉城的界线，中辟二门：一曰端履门，一曰大差市门（原名通化门），再连钟楼门洞算上，称为五小门。五小门以内为满城；五小门以外为汉城（东大城墙根与满城交通尚开小门一所）。由钟楼迄北迄东的两道土墙与现在新城的土墙一般高厚。辛亥年革命后拆除。名曰满城是为了别于占城地二分之一弱的汉城而言。

省垣实测周围二十四平方里又三分，东起长乐门，西至安定门，东西距离七里六分，南起永宁门，北至安远门，南北距离四里五分。满城实测周围为十四平方里又六分，东起长乐门，西止钟楼，东西相距为四里一分，南起钟楼，北至安远门，南北相距为三里二分，满城中共有大街七条，小巷九十四条。

二、沿革

清初年入山海关后定都北京，一切沿袭明朝旧制，带进关外的满族兵丁约二十余万，除留驻北京一小部分外，其余大多数尽行分配在各省首要地方驻防，有防范镇慑的意思。陕西省西安府乃周、秦、汉、唐建都之地，称为关中重镇，有“百二雄藩”、“控制西陲”的形势，为当时西北方面行政的核心，八省交通的孔道。因其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所以在清朝顺治初年，就极重视争取这个地方。

曾先后两次（第一次顺治年，第二次乾隆年）派来五千名马甲（骑兵），随带家眷，驻防西安。当时由北京到西安要经过山西省全境，路程约为一千八百华里，分为十八驿站。若按驿站行军每日百里计算，须行十八天。为了行军迅速以争取据点，换马不换人，计约行五日许，即可由北京到达西安。家眷随后陆续迁来，在满城安家，称之为“一下车”。满城所占房屋多是明朝的民宅；现在的新城，就是明朝的秦王府，清时变为西安驻防旗兵操演的教场。

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陕西起义民军，由张凤翔（翔初）领导的复汉军，张云山领导的洪汉军，联合陕西省咨议局高级知识分子郭希仁、杨开甲等，于辛亥年九月初一起义响应。西安八旗驻防旗人遂遭到了灭顶之灾。满城经过空前的大破坏以后，全城变为瓦砾滩，旗民死亡殆尽。历代古建筑都化为灰烬。

三、编制官阶

西安驻防军是军伍编制，在初创时期，它的组织很严密，纪律性也很强。满族家庭中的男丁都要当兵，接受军事训练。主要科目是跑马射箭，兼习炮火攻击术。八旗分为正白旗、镶白旗、

正红旗、镶红旗、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镶蓝旗。每旗设协领（满名古赛达，俗称大老）一人，为武职三品官，率兵六百二十五人；每旗由五“甲”组成，每甲各设佐领（满名牛录章京）一人，为武职四品官，率兵一百二十五人；佐领以下设有防御（满名遮尔几章京，俗称巴老，“巴”为巴图录之简称，汉意“勇”的意思）一人，为武职五品官；骁骑校（满名分德卜书，俗称三老）一人，为武职六品官。防御、骁骑校是辅助佐领的。再以下有委前锋、前锋、转达、四旗委官等若干，有职无权。设领催六名（满名卜什库），千总一名，每领催区录下管兵二十一名，这是基层组织。合计每甲编制马甲为一百二十五名，五甲为一旗，计马甲六百二十五名，八旗共计马甲五千名。

马甲以下还有步甲、小甲、炮手、无米养余兵等等。此外，还有“苏拉”等后备组织，可以循序补升：苏拉到小甲、步甲、马甲、前锋、领催、骁骑校、防御、佐领、协领。佐领、协领这两个职位，在八个旗中可以互相升迁调补。另外还有恩特尉、云骑尉、骑督尉、轻车督尉。轻车督尉为虚职官，每月仅关俸银，缺马甲，可以补升实官。办理这些升迁调补事宜的机构原名叫作“圈”，后来改为公所。每一个圈内尚有分管银钱粮饷的，户口名册的。圈内应用文件满汉文字兼用，写汉文雇用汉人，名曰“书班”；写满文的叫“外郎”。喂养马匹、备办麸料的人名叫“马夫子”，传达公文的人名叫“莫几戈”。每一甲有一个圈，是满营骑兵的基本组织。

高级统率大员设一名，曰将军，为武职一品官；左翼都统设一名（俗称北大人），为武职二品官；右翼都统一名（俗称南大人），为武职二品官。俱由京城部里奉旨简派，三年一任。

四、人口生活

西安驻防军基本上是由五千马甲编成的，马甲一名作为一

户。这五千人是正额，按月由陕西藩库领饷银，西仓东仓领仓库米，所谓“关银子”“关米”。他们是完全脱离直接生产的，可以说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不耕而食，不织而裳”。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只知道当兵当差出操练习，无事时游手好闲。清王朝统治者对于各省驻防旗民，又定下许多禁例，最重要的是严禁经营商业，意在不与商民争利；严禁离开防地。这二项禁条就把驻防旗民束缚得紧紧的，只能依赖“关银子”“关米”为度生养命之源，其他一切生产事业，因为禁令所限，谁也不敢违令参加。

有人说派遣八旗兵丁官长，驻防各省重要地点这一政策，是洪承畴降清后给摄政王多尔衮上条陈时所建议的，意在化整为零分散清军的兵力。禁止经商和离开防地这二条禁例也是洪承畴定的，使旗兵坐吃享受二百年后，个个变成腐化无用的废物。这种说法正确不正确，尚待参证。

不过二百多年以来，西安驻防军人口繁衍，有时超过三万，有时一减就是几千。如太平天国时，西安驻防军一次出过两千兵，参加南京“沙漫洲”地方作战，全军覆没。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战祸延长数载，省城被围，交通阻隔。西安驻防旗人长时期无粮无饷，生活陷于绝境，靠拆房屋卖材料勉强度日，死亡甚众。到了清末，鸦片流入中国，西安驻防军十家就有九家吸食鸦片，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辛亥九月初一的炮声，使三万多人死亡殆尽；事后调查逃出性命，尚能挣扎生活的仅三千人左右。

民国十年，冯玉祥督陕时取消了这个机关，从此西安满族遗民因无领导，散居各区，更因为大汉族主义从中作祟，歧视旗人，旗人大都隐瞒民族成份，许多人改称汉族。所以现在西安的满族人已寥若晨星了。

五、政治经济

过去有句俗语，“满称奴才汉称臣”。这是由于清入关前是奴隶社会，统治者被称为“主子”，归他统辖的满族人民，就都是他的家奴（满语卜衣），自称“奴才”。这种奴隶社会的遗风，一直到满族入关，进入封建社会后仍长期存在。给主子服务的“作官”对主子要称奴才，作官的管辖的兵对官称为“当差使”（满语戈什哈），又是奴下奴的身份。在清朝，虽然官已经升到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甚至戴上了红顶花翎一品顶戴，若是给皇帝上奏折或是密呈，下款还是称奴才××跪叩。等而下之，普通的旗兵就更无政治地位可言了。

谈到经济问题，西安驻防旗人男女老少三万余人，每月养命之源就依赖的是“一关银子二关米”，每月由西安驻防将军出具领结，向陕西省藩台藩库领饷银以及马干折色，约三万两库平纹银，每月又于东仓（敬禄仓、预备仓）或西仓（永丰仓）领老仓米（入仓后经过十年——廿年的储藏），每马甲一名领京斗米一石，折合市斗约五斗，作官的另有俸米（白米）。

每月二十八日“关银子”，每名马甲有三匹半马，人马两项合在一起亦仅能领到四两多银子。还要扣去年钱、灯钱、房价、红事、白事、帮贴等七、八宗会银。扣完之后，实发银不到几钱。除少数作官的每月俸银关得多点，其他一般旗民经济的支绌，可以想见。

每月十八日“关米”，这倒确实是一条根本养命之源。每月每名马甲都可领到老仓米五斗（每斗十五市斤），以六口之家计算，粗米淡饭可以充饥了。若是人口众多，收入太少，不能维持最低生活者，还有“交官家”一法，就是不要所关的银米，请求由公家维持生活的意思。生活困难的旗兵，挪借典物度命的比比皆是，许多人向回民借高利贷。

光绪二十九年，陕西巡抚升允（吉甫）目睹西安旗民的困苦情形，思谋一救济办法，定出“旗屯”的计划，就是抽调西安驻防旗兵壮丁组织旗屯队，在渭河南岸草滩镇开辟荒地，从事农耕生产。奏明清政府批准后，派草滩旗屯营长成安为统领，率兵三百七十余人，分为中哨、左哨、右哨，每哨一百十五人，外有营部二十人。屯兵除每月在本甲领饷银外，尚能得到屯银一两余。这就叫做“双粮双饷”，每月亦由藩库具领屯饷银五百两，计每年领六千两。旗屯每年收获的粮食作物，售价约为三千两，以六千两的屯饷银易得三千两的粮价，收支相矛盾。但为提倡旗民劳动，使知稼穑之艰难，年代长久或者可以得大利益。

此外尚有武功、郿县等县马场地，是初到西安驻防时拨予旗兵放养马匹的草场地。嗣后熟地租给汉民耕种，生地任其荒芜，每年设人经管。少有收入，归将军内库掌握，作为备用金，救济旗下鳏寡孤独无力活命的人。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八百里秦川二十余县都被波及，省会与各县交通断绝很长一个时期。满城几个月没有关到粮饷。富有的尚可维持过活，一般专靠月饷生活的，每月领不到银米，只有拆房出卖砖瓦木料度日。

自道光年间迄光绪年间，因为吸食鸦片户渐多的原因，西安旗民经济生活更濒于危机。

六、文化教育

满族最初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嗣后采用蒙文字母，加以补充变化，又增添上圈、点、阴阳尾巴等，作为表音符号，创制了“十二字头”，用其拼音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形成了满族文字。

满族自从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便大量翻译汉族文献书籍。所有汉族古籍如十三经、诸子百家、史记、纲鉴等以及古典文学著作，都有满文译本。较早译成满文的是《三国演义》。满族旗营官

长差不多人手一册，视为兵书，钻研熟读后给旗兵当作军事故事讲。

满族入关后才开始学习汉语。举凡上谕、奏折都是满汉文并用。

西安驻防军是顺治初年派去的。第一批到的旗兵就学着说西安当地方言。乾隆年间又从北京续派第二批驻防兵来西安，他们说话都带着北京腔调。

西安驻防军中，男丁出生满九岁时，必须上学。每旗每甲都设有官学，另外还有私学。官学满文汉文兼教，私学中有专攻满文的，亦有专攻汉文的，以今后出路作为选择标准。学满文可以应满文考试，有满秀才、满举人、满进士、满翰林等。学汉文可以应汉文科举考试，也可中举人、进士、翰林等，升官发财。

习武的十多岁开始练功，下弓房、站档、吊膀、数弓字、打靶子、进一步跑马射箭。学成之后，可以应习武园的“武举”考试。弓、刀、石件件都要求能掌握，马上三箭更是考中武举的主要科目。全省武举考试取中名额是有一定数目的，满族与汉族以人口比例，每科武举不能多中。此外读书文人还有将军衙门举行“月考”一事，亦是鼓励文士学子学习满汉文的一个好方法。每月月课一次命题作文，考中的还有少许“膏火银”的奖励，以是读书人多愿应考，延续了一百多年之久。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停科举兴办学堂后，文武士子上进的出路，就有所改变，不同从前，文科创办八旗中学，学额三十名，左右翼各设小学一所，名额各二十人，中小学共为七十名；由陕西巡抚升允亲自主持入学考试。开办后二年名额扩充到一百名，当时聘请充任教员的多为知名之士，如萧鍾秀（雨亭）、康毅如、惠春波、惠甘亭、米荣林、张信复、康炳勋（寄遐）等，他们循循善诱，为西安八旗培养许多青年学子。武科有西关武备学堂，优秀生毕业后送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先后在内学习的，满族有霍色里、炳炎、固琳、恩厚等，汉族有张凤翔、席子厚、刘述吾、

刘凤梧等。

宣统元年，省垣创办的巡警学堂，西关创办的甲种农业学校，习武园万寿宫办的法政学堂，以及北京的财政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本省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测绘学堂，存古学堂，都有西安八旗子弟参加学习。当时办学有一歌谣录之如下，亦可反映当时的情况：“老师范，少高等，不老不少住巡警，要吃好饭住满城”（指八旗中学）。辛亥革命后西安残留的满族文武人士中，尚有些事情做的武人中有培杰（张亚东）、恩厚（李益民）、关厚甫等等，文人中有培成（绎如商县县长）、邢益堂、桂璋等。总之，西安驻防旗人中有文化受过教育的，比较起来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亦有突出的一二人，如恩特亨（次元）就是一个思想前进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曾充当过高等学堂的历史教员。

七、风俗崇拜

西安旗人二百多年来聚居在满城内，与汉族不通婚姻，各旗子女互为婚配，所以好像一家人，谁与谁都有亲戚的关系。

西安旗人婚姻的习惯礼仪与汉族大不相同。旗人女子平时闺范很严，不能随便会见生人，到二十岁上下，必须出头露面。满洲风俗每年每月按季节都有庙会娱乐，旗人大姑娘梳洗打扮，由母亲长辈带领逛庙会看大戏。如正月十五日灯节，二月初二日龙抬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演戏，四月初八日开福寺露天大戏，五月初五日端阳节，六月初四日白旗戏楼天棚戏，七月十五日地藏庵，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十月初十日在“皇城”（现新城）“夹着枕头逛皇会”（西太后慈禧生日）。

每逢过会的日子是青年女子争艳斗丽的时候，也是一般青年男子寻觅佳偶的季节。在庙会上彼此暗地认识好，但不能交谈。然后男方请媒人作伐，向女方求婚，女方家长如认为“大属相合门当户对”，就可以过小帖（帖上开明女方八字），由媒人恭送男

家。男家接到后，在灶神板上要压三天三夜，在这几天里如果男方家庭顺遂无事故发生，就认为大吉，通知媒人给女家道喜。女方接受男方的“表记”就表示订婚，名曰“过礼”。嗣后双方选择吉日，就可举行结婚大礼，名曰“娶媳妇”。婚礼季节多以男女属相为准则，多在二、八月，时间多取半夜子、丑、寅三个时辰。举行婚礼这一天，先要“过嫁妆”，由女家将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有全套嫁妆、半套嫁妆、一角嫁妆之分，顶少也须四扣箱子。男家还要“亮轿”行亲迎礼，到夜间灯火辉煌、鼓乐吹打，娶亲太太坐上喜轿向女家抬亲。返回时花喜轿抬到男家门口，送亲太太先进去，新娘坐在轿内，关上大门要关门。对准时间由娶亲太太先扶新娘抱瓶下轿，进大门经过马鞍子、大火盆、给炽热的火盆上还要泼一杯烧酒。入洞房后，新郎给新妇挑去盖头，新妇头梳抓髻，身穿大红婚服。这时由三个“全活人”（有男有女有丈夫）给新妇开脸，用线绳绞去新妇额际鬓角上的毫毛，显出一块方式鬓角，再换上新妇礼服，由三位太太扶新妇从炕上下地，同新郎双双拜祖先、拜父母、拜亲戚朋友。当天晚上夫妇第一次入洞房，对坐吃“交杯盏”、“子孙饽饽”，窗外有人问“生不生”？还得答应“生”。婚后三日不论辈数大小都可以来闹房，要求新妇装烟等。到第三天回娘家名曰“回门”，当天就得又回婆家，认大小长幼亲戚关系。婚后一个月再回娘家名曰“住对月”（不一定住一个月）。女子未出阁时，在娘家称为姑奶奶，有无上的威权，可以过问娘家一切家务事。一出嫁便成为一只绵羊，做活在先，吃饭在后。公婆吃饭时还得站在旁边伺候，送茶倒水，连小姑娘小叔子也得要照顾周到。有首歌谣说，“白菜叶，铺地黄，我妈要我不气长，小着吃娘奶，大了扶持人家娘，人家吃面我喝汤，人家养猪我拌糠，人家杀猪我拖腿，人家吃肉我混嘴，棍棍打在我身上，句句骂的我亲娘。”女子在婆家要一直熬到生儿养女当老太太，地位才有所改变。但是她们对于娘家兄弟仍然保持着特权，可以干涉娘家的家务事。

西安驻防军旗人的丧礼是这样的：人一倒头停尸床上，必须头朝西脚朝东，头朝西有魂灵往生西方之意，脚朝东有身体走回东北老家之意。首先要请和尚念一场倒头经，全家聚哀，入殓后三天为“接三”，亲戚朋友都来吊奠，“装烟”（这是满族的一种礼节）。办丧事时除吹鼓手吹打悲乐外，富有人家还要念道士经、喇嘛经、和尚经；“接三”晚上要烧焚纸马纸车以及亡人的旧衣旧物若干件，名曰“送三”。停灵五日或七日，就要“送灵”，出殡时抬上杠架，棺材大头必须在前。清初驻防军中死人举行火葬，骨灰装布袋内，准备带回东三省，嗣后奉上谕准在省城五里以内土葬。埋灵后三天为“原坟”，六十天为“烧船”（魂过浑河可得渡之意），一百天“脱孝”。在这百日内孝子穿白，带孝，蓄发，隔房，不饮酒，不吃肉，不坐高座。作文官的还要“丁忧”三年，武官因随时调遣可以不“丁忧”。清王朝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所以对于父母的丧仪，特别重视。以致有人不惜负债办丧事，亡人安葬以后，因此家道中落的很多。

旗人在每年二、八月间，举行祭祀祖宗的礼仪，多在深夜举行。蒙族旗人祭礼有屠宰整羊整猪献祭的，祭后煮食猪羊肉，无论已亲厚友、街坊邻居，都可参加吃肉。但有禁忌：（一）入屋脱鞋，（二）不得谈话，（三）自带咸盐主食。满族旗人祭祀时，做江米面蒸糕，外裹黄豆面，再加白糖。祭祀后多将祭品分赠亲友同街邻居，食之者，必与之道喜。旗人祖先骨灰袋多放在大屋西墙上，单独设板存放。祖宗板上必须严密覆盖黄布，下垂白纸剪花吊帘及黄白飘带。板上存放骨灰布袋，放置在西边墙上是表示亡人死后魂归西方的意思。另外祭祀时还要祭“祖宗杆子”，它建在上房大屋院中二门以内偏东南方向，杆座多为石墩，杆尖为铁制，可以插上肉类食品。祭祀时，屋内西墙上“祖宗板子”须用红色长绳一条，与“祖宗杆子”拴连在一起，在长绳上还要一条跟一条不断的挂上许多红布“缰绳”。这种缰绳一名“锁子”，每家的男丁，从出生起就在脖项中间带一条线锁，过一年在线绳上

多加一层红布，长到十三岁或到结婚前，才能取掉，名曰“开锁”。满族祭祀时，还要请出“佛头妈妈”，供奉在屋中央全家礼拜。相传“佛头妈妈”就是满族始祖。

八、古迹寺庙

西安满城旗人户口达三万以上，有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他们敬奉土地、龙王、灶爷、天地、马王、财神。八旗四十个甲，每甲以二个庙宇计算，有八十座寺庙。庙宇、庵、观、寺、院、宫都供有各种神像。军营中下级领兵官员，多能熟读满文《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人手一册。因此，也很崇拜正气凛然忠心保主的关羽。

旗人称寺庙为“家佛堂”，每月初一、十五必须进庙烧香供佛，逢年过会更是热闹。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诞辰，在满城中如老爷庙、协天宫、大铁旗杆庙、小铁旗杆庙、汤房庙、三圣庙、三圣宫、五圣宫、五福堂、保安堂、忠圣宫、永安宫等十九处祀奉关羽的庙，其他寺庙亦多有祀关羽的。这许多庙在关羽诞辰，一定要开庙过会祀神会亲友，大吃全羊。

关帝庙有正白旗关帝庙，正黄旗关帝庙，正蓝旗关帝庙等。大小铁旗杆庙亦名关帝庙。大铁旗杆庙是属于镶蓝二甲的关帝庙，亦是他们的“家佛堂”，位于省城东大街大差市迤东路北。明朝时为“武庙”，建筑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山门前立一对大铁旗杆，高五丈余，上有连升三级铁斗铁旗，旗杆后边有两个大石狮子，浮雕精湛。进山门院内东西两边建有大钟鼓楼各一处，大铁钟重千余斤，每逢日月蚀时必聚齐击打。二门东西两边各塑神马一匹，东首赤兔胭脂马，西首黄骠马，各塑马童牵马姿势。两匹神马虽系泥塑，但生动活跃，望之令人赞叹泥塑艺术之高超。进了二门，院内古柏参天，约二百余株，二人合抱不过来。东西两廊满布国画，画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故事，结构宏伟，布局精

密，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看见过如此宏伟的长幅壁画。西边画廊北端立石碑一座，上刻关羽读《春秋》坐像，像上边刻有竹叶撇字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竹淡，终久不雕零。”竹诗上边刻有“汉寿亭侯印”一颗，三寸见方。在正面正中大殿上供奉关羽塑像，望之栩栩如生，威风凛凛。左塑周仓持刀，右塑关平抱印，神气生动。大殿后边为寝宫，再向东为三义殿，庙内最后部分建筑为老母殿，后院内东西还有配殿。再西院设有旗下义学及住持寮房。再东首为演武厅广场。大铁旗杆庙据说确为明朝建筑物。这里又是考秀才的考场，是满城内最宏大的一座古庙。比起现存的古东岳庙，还要大一倍多。在清朝兴盛时期，大铁旗杆庙有龙灯古会，最为著名。至同治、光绪年间，已衰微了。辛亥时，此庙毁于战火。

此外，尚有东岳古庙、二龙寺、马氏庙、望灯庵、武庙、华藏寺、开福寺、弥陀庵、岳武庙、园楼楼、狮子林庙、善庆庵、三元庵、琉璃庙、双庙等。

“香火会”也是满城寺庙的盛大集会。每年六月间，按民间风俗，都要为观世音菩萨、关羽、马王举行诞辰盛大纪念会。因此，各庙如弥陀庵、菩萨庙、汤房庙、狮子林庙一定要举办庆祝式的“香火会”。这个会不用打击鼓乐为主体，与汉人的乐器社有所不同，仅采用两个大铜锣，一引锣作“啗，啗”之声，一应锣作“嘡，嘡”之声，循环唱和，引应前进。会长手捧香盘，逢庙进香。最突出的特点是：制备各色各样长柄大伞，排列队伍，鱼贯而行。持伞游行的人多是少年英俊，臂力强健，有的头上梳着大辫子，还有的头上留着孩儿发，身上衣裤必须上下一色，足蹬抓地虎靴子，所持的伞颜色不一，红、黄、蓝、紫、绿都有，为丝织品绸缎料做成，五花八门光彩悦目，排行街头万人争看。持伞青年神气十足，身上横披着一条褡裢，褡裢下端拴着皮制放伞把的圆皮筒一个，因为伞大分量甚重，一人手举行走颇费气力，所以才有这样的设备。这样的“香火会”，已失传多年了。

九、西安旗人的风俗

民间文艺活动

西安驻防旗人民间文艺十分丰富多彩。首先谈谈正月十五和二月二的玩龙灯。龙灯古会第一要算铁旗杆庙的最早最好，哪家都赛不过它。另外善庆庵、碌碌巷每月正、二月都有狮子龙灯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如：大头和尚戏柳翠、耍云彩、排七巧图、跑竹马、耍狮子、耍鱼灯、鳌鱼灯、小红鱼灯、大龙灯（九节）、跑汉船等。

礼 节

西安旗人有许多礼节与汉人不同：（甲）请安礼：分男子请安礼、女子请安礼两种，是各省满族极普遍通行的一种礼节。下对上，兵对官，晚辈对长辈，亲戚朋友等，无论在何处相遇，都要相互请安问好。请安亦名“打千”，行礼的动作姿势是左腿稍屈，右腿向后伸，上身微向前倾，右臂向下直垂，这是各地一致的习惯姿势。女子行请安礼的姿势与男子不同，先用左右两只手平放在大腿根前部，然后全身向下一坐，叫做请“京蹲”安。（乙）叩头礼：男子叩头礼与汉人大致相同，多是一跪三叩首，或三跪九叩首，前者多行于婚丧礼节，后者多行于祭祀文武圣人国丧时用之。女子行叩头礼时，下跪弯腰屈身都与男子一样，唯用右手中、食二指合并一起在右鬓角处上下摸，这样一上一下要摸三次，名曰“摸鬓礼”。（丙）举哀礼：凡遇国丧之类大不幸事，必须集合文武官员八旗子弟兵丁，在皇城教场演武厅上齐声嚎啕痛哭名曰“举哀礼”。

习 武

西安驻防军的五千马甲兵丁，按祖制规定，每日早起必须下操场练操，练习骑马射箭和列阵冲锋。因为满族始祖是以武功取天下的，严督后辈习武亦是不可忘本的意思。每月上、中、下三旬，都要集体操演。现在西安市的新城就是过去旗兵操演的教场，中筑演武厅高台一座，居高临下。东西两边靠近城墙，各筑大房四座，两翼分开，这样的建筑与沈阳故宫东首八旗演武厅完全一样。操演时，司令台就设在演武厅上。“马上三枪”及“马上三箭”是比较有特色的，操练项目，“马上三枪”是兵骑在马上在马趟子里飞跑，用土枪装火药，按末子、点火捻、瞄准，种种动作必须在几分钟内一气作完，连放三枪。“马上三箭”比较容易，兵骑马在趟子里飞跑，左手执弓，右手搭箭，腰中尚插二箭，一定要连中三个箭墩，箭不虚发方称能手。

服 裳

旗人男子在春夏季节戴“委帽”，一名凉帽，质料系采用细草（台湾草之类）编成。在秋冬季节，无论官兵都要戴暖帽，平时戴的帽子叫做“小帽”，老年人出外御寒多带“风帽”。女子结婚时所戴的帽子称为“钿子”。

男官服有长袍、短褂、板带、靴子等，官服长袍多取蓝色米黄色，短褂多为褐色，制作材料多用丝织品，袍子袖口作马蹄式。板带多为丝织品，带扣各式各样，以景泰蓝的最为讲究。靴子分为朝靴、官靴等，兵丁多穿名叫“抓地虎”的靴子。

女子平时所梳的头叫做“如意头”（俗叫两辨头），所穿的衣裳多为长衫长袍，大镶大摆，富丽堂皇。足下常登木制高底鞋，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饮食：西安旗民养命之源，百分之百全靠“仓米”，仓米是东西各仓内储藏过多年的小米，或是带谷壳的小米。西安驻防旗兵

每月定于十八日“关米”，所领的“仓米”，就是三万多旗民养命的主食。官宦人家还有俸米（白稻米），那是一般当兵的人家不易吃到的。

除“仓米饭”以外，面食亦算主要主食之一，制作方法各式各样，常吃的有汤面、拌面，饺子吃的次数少些。挂面，在过新年时节偶而一食。

旗人还用各种蔬菜、花瓣掺拌白面蒸食，名曰“麦饭”。如苜蓿芽、芹菜、江豆、茄子、槐花、榆英等，都可做成麦饭，最突出的是香苜蓿麦饭（俗名薰葵菜），香馥适口，营养丰富。

过新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些年菜，如猪、牛、羊肉、炖鸡、野味、辣白菜等。正月十五吃元宵；正月二十日和二月二吃薄卷饼；三月二十八在东岳庙吃窝窝凉糕等；五月初五端阳节吃粽子，喝雄黄酒；六月——七月入伏以后，“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八月十五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九重阳节吃花糕；十月到腊月可以吃爆羊肉、烤羊肉、涮羊肉等。每年六月二十三日马王会，二十四日关帝会，各甲庙里圈里多有大吃“全羊”的盛会，从羊头吃到羊尾，多的有一百多件，少的也有三、四十件。仅就羊肚而言，即可有爆、炒、过油、烩、凉拌等食法。首先吃烩羊头，最后吃炸羊尾，佐以白糖，这就叫做大吃全羊。此外，旗人还有吃兔肉的习惯。

游 戏

西安旗人春、夏、秋、冬都有各样游戏，春天放风筝，夏天钓鱼，秋天养蛐蛐（蟋蟀）、养蝈蝈、养蚂蚱。冬天踢毽子、打毛旦（那时没有皮球）、跳绳、滑冰。一年四季迟早都能玩要的有养鸽子、养鸟、养金鱼、打嘎嘎、踢蛋蛋、打弹弓、打猎等等。若是庆祝某个大典，还放盒子灯、放花杆、斗子等各种焰火。这种焰火是省城以北火烧碑村，专业技术工人承袭祖辈数百年相传下来的绑扎配药绝技的精制成品。